



## Copyright Undertaking

This thesis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By reading and using the thesis, the reader understands and agrees to the following terms:**

1. The reader will abide by the rules and legal ordinances governing copyright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thesis.
2. The reader will use the thesis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nly and not for distribu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 or any other purpose.
3. The reader agrees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University harmless from and against any loss, damage, cost, liability or expenses arising from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r unauthorized usage.

### IMPORTANT

If you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any materials in this thesis are deemed not suitable to be distributed in this form, or a copyright owner having difficulty with the material being included in our database, please contact [lbsys@polyu.edu.hk](mailto:lbsys@polyu.edu.hk) providing details. The Library will look into your claim and consider taking remedial action upon receipt of the written requests.

宗藩体系下李鸿章的朝鲜策略（1870—1895 年）

党思敏

哲学硕士

香港理工大学

2022 年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化学系

宗藩体系下李鸿章的朝鲜策略（1870—1895 年）

党思敏

此论文为哲学硕士学位课程之部分要求

2021 年 9 月

## 原著声明

我谨此声明此论文为我个人的研究所得，而且就我所知，除文里特别注明引用的出处外，我并没有抄袭任何已发表或刊出的资料或抄袭任何其他已获准颁授学位或文凭所得的资料。

\_\_\_\_\_ (签名)

\_\_\_\_\_ 党思敏 \_\_\_\_\_ (学生姓名)

(本声明中文译本如与英文本之文意有任何歧义，概以英文本为准。)

# 目 录

介 绍.....	1
文献综述.....	4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鸿章属国策略的调整.....	22
(一) 日本对宗藩关系的首次试探.....	24
1.1 《中日修好条规》与李鸿章的对策.....	24
1.2 日本在台湾的先行.....	28
1.3 日本试探中琉宗藩关系.....	32
(二) 日本再探中朝宗藩关系.....	38
(三) 传统对朝策略的调整.....	44
3.1 何如璋之朝鲜通商策.....	47
3.2 李鸿章之朝鲜通商策.....	51
3.3 开化思潮影响下的朝鲜官员.....	54
3.4 李鸿章与其他官员之属国观.....	56
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朝鲜策略的变化.....	58
(一) 李鸿章针对壬午兵变的策略.....	59
(二) 李鸿章针对甲申政变的策略.....	68
2.1 甲申政变的发生与李鸿章的应对之策.....	69
2.2 李鸿章对日妥协的原因.....	74
2.3 英国的干预与李鸿章的抉择.....	77
(三) 八十年代后半期李鸿章的对朝策略.....	79
3.1 巨文岛事件的发生与李鸿章的应对之策.....	80
3.1.1 李鸿章的对英态度.....	81
3.1.2 英国占据巨文岛的图谋.....	85
3.2 化解俄国威胁的朝鲜策略.....	88
3.2.1 日本的朝鲜策略.....	88
3.2.2 李鸿章应对俄国威胁之策.....	91
3.3 李鸿章强化对朝干预之策.....	97
3.4 李鸿章与袁世凯应对俄朝二次密约之策.....	101

3.5 巨文岛事件的解决及影响 .....	112
3.6 俄国因素的对华影响.....	119
3.6.1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 .....	120
3.6.2 清廷官员对俄罗斯长期恐惧的原因 .....	123
3.6.3 由对俄恐惧引出的几个问题 .....	127
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李鸿章朝鲜策略的连锁反应.....	132
四、甲午战败引发的一些思考.....	138
（一）新疆危机的化解 .....	140
（二）越南危机的无解.....	144
（三）反思.....	150
结    论.....	154
参考文献.....	162

## 介 绍

中国的封建王朝在「康乾盛世」时期再度攀上高峰，万国来朝虽是夸张之语，但充分说明了那时中国的朝贡国数量之多。在众多的朝贡国中，朝贡名目最为繁多和朝贡贡期最为密集的当属朝鲜。<sup>1</sup>所以，无论从制度还是实质上看这一时期的中朝间朝贡关系具备了最完整的制度与机能。<sup>2</sup>然而，在这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中国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其近代化发展，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共同影响下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sup>3</sup>西方诸国一面加入朝贡网络，一面则试图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sup>4</sup>而日本的近代化则可以看成是日本试图取代中国而占据中华理念的主导地位的过程。<sup>5</sup>由此，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并做出一系列的调整。清政府试图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但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施行，朝鲜这个在中国诸多的藩属国中最为恪守宗藩体制的国家也开始不断地主动尝试脱离宗藩关系。如若作为中国东部屏障的朝鲜落入日本、俄国、英国或法国等国

---

<sup>1</sup> 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页 110-111。

<sup>2</sup> （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 185。

<sup>3</sup> 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好曾说：「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或者说是这一结果引导出的后果，对此我们应给予大致的承认。」引自（日）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页 256。

<sup>4</sup>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 44。

<sup>5</sup>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页 46。

之手，将会对中国的安全和声誉造成重大的威胁。<sup>6</sup>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末的外交事务中常常作为全权大臣总揽一切，他的态度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清廷的外交政策。<sup>7</sup>然而，李鸿章二十多年来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调整并未使其延续，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被迫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中朝宗藩关系随之结束。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藩属国，朝鲜的独立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彻底瓦解。<sup>8</sup>

---

<sup>6</sup> Kirk W. 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1.

<sup>7</sup> 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全权负责有关对外贸易和畿辅海防等事务。（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衔被取消后，李鸿章的兼职被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自此，李鸿章掌握了自强新政的领导权，李鸿章甚至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引自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收入（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 561-562。）

但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对政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总理衙门支持了他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同上，页 564。）

本文关注了李鸿章在不同时期的权力范围的变化，例如 1876 年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时他的建议就没有被清廷采纳（下文将具体叙述）。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笔者观照了李鸿章、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同一事件的态度。但是，总的来说从 19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开始李鸿章对于朝鲜的策略代表了清廷对朝鲜的态度。

<sup>8</sup> 1. 鸦片战争前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规定的。（参考自 Fairbank, John 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关于清晚期政治策略的分析与理解：

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制度与欧洲的完全不同，这使得用西方分析范畴来分析中国帝制晚期的国家活动变得非常困难。（引自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5.）

我们对西方活动的重视，都远远超过我们在研究日本时对中国影响的重视。这些受情感支配的看法，都加强了从欧洲中心论出发的对西方影响的重视……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解释那些源于西方的活动，是如何得以逐渐中国化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探索那些不能从西方活动中得到的中国的政治统治策略，是如何持续下来的。（*Ibid.*, p. 72.）

3. 清晚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东亚秩序的变化：

本文中笔者将观照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国际关系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俄国、法国等国的关系，以一系列历史事件为依托，探析从 1870 年至 1895 年间李鸿章在宗藩体系下对朝事务的具体举措及其变化，进而分析其决策的原因及对传统东亚秩序的持续影响。同时，笔者将李鸿章与其他官员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进行对比，着重分析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对李鸿章朝鲜策略的影响以及在此种影响下李鸿章对于朝鲜事务做出的判断与决策。最后，笔者总结出在李鸿章的策略指导下中朝宗藩关系瓦解的原因与反思。

---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开始发生动摇。（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 5。）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进贡体制从鸦片战争时期逐渐解体，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宣告结束。（同上，页 17。）

## 文献综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中朝宗藩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颇多成果，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中朝关系相较于之前的传统宗藩关系发生了变化。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朝关系进行了考察。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朝关系仍旧属于宗藩关系，因为十九世纪中期之后近代世界体系的闯入，清政府对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做出调整，进而导致维系中朝关系的具体方式方法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在此种情况下中国仍旧是朝鲜的宗主国，宗主国对朝鲜藩属负有相应的责任。韩国、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也普遍认同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朝关系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学者认为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下运行，但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在实质上已经不属于宗藩关系，而变为中国对朝鲜实行一种所谓的晚清帝国主义。他们认为晚清帝国主义在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名义下实行，即清政府利用宗藩关系对朝鲜事务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行为实际上属于帝国主义的行径。此外，他们认为表面上这种帝国主义与西方政权施行的帝国主义有一些区别，但符合帝国主义的本质。关于晚清帝国主义，Lee Yur-Bok 在其 1988 年出版的《West goes East :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Kirk W. Larsen 在其 2008 年出版的《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一书中提出过此观点，之后也有中国学者就此观点进行反驳，例如王元崇在 2018 年出版的《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一书。

Kirk W. Larsen 在《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一书中表示一些西方学者不认为中国是帝国或者不认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是帝国的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把殖民行为假定为欧洲殖民者对非欧洲人的行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此外，中国传统的与其他政权互动的方式建立在儒家的朝贡体系下并且很少考虑商业因素。但 Kirk 将中国自战国、秦汉时期的统一战争认定为帝国行为中的领土扩张，并认为这种扩张行为在清朝攀升至巅峰。<sup>9</sup> Kirk 认为清帝国主义是东亚和西方机制与机构的混合体，朝鲜在十九世纪末期成为了相互竞争的帝国的竞技场。日本在 1876-1882 年试图在朝鲜实现单边但非正式的帝国统治，因此清帝国在 1882 年严重干预朝鲜事务后诱使外国政权对朝鲜感兴趣并参与，进而将多边帝国主义引入朝鲜，朝鲜从此不再仅仅向日本开放，而开始向所有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开放。<sup>10</sup> Kirk 表示清帝国在朝鲜的行动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该地区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行动。<sup>11</sup> 但矛盾的是清帝国向朝鲜引入了多边帝国主义，而清帝国也试图在传统宗藩关系的基础上在朝鲜保持一些表面上的特权。<sup>12</sup> 西方国家和日本被认为一直在寻找与朝鲜建立关系的新模式，

---

<sup>9</sup> Kirk W. 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 pp. 3-6.

<sup>10</sup> *Ibid.*, p. 17.

强加于东亚的非正式帝国通常被称为「多边帝国主义」( *Ibid.*, pp. 14-15.) 而非正式帝国( *Informal Empire* )，也可以说是半殖民主义( *semi-colonialism* )。( *Ibid.*, p. 12.)

<sup>11</sup> *Ibid.*, p. 10.

<sup>12</sup> *Ibid.*, p. 17.

而清朝统治者因为受到传统关系模式的激励和制约，所以清帝国则是维持原有的模式，或者是重申旧的政策。<sup>13</sup>

Kirk 还认为清朝引入朝鲜的多边帝国主义不但抵抗了日本试图重新确立的排他的和单方面的特权，而且中国的军官、商人和移民在这种多边但非正式的帝国体系中享有许多特权，这种体系持续至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sup>14</sup> 他在书中试图从政治、商业等方面进行论证。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国对朝鲜事务进一步干涉而不同于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并且商业利益使得中国商人在朝鲜生意兴隆且中国利用条约和国际法保护了在朝鲜的商业利益，西方帝国主义者强加在中国的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和最具进攻性的缺乏关税自主权的问题被清王朝用来对待朝鲜以谋求不平等特权。<sup>15</sup> 而这些行为都是在宗藩关系的名义下进行，但实际上主要动机是地缘政治和商业。<sup>16</sup>

关于商业利益，学者王元崇有很详细的说明。王元崇认为 1882 年中朝签署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并不是中国为了加强宗主权以牺牲朝鲜的主权和独立为代价而单方面强加于朝鲜的。相反，每一方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种关系。<sup>17</sup> 根据条例的第四条，朝鲜可以在中国港口开放自己的定居点。1885 年朝鲜派遣了与在朝鲜的陈树棠相对应的朝鲜商务专员赴天津。如果朝鲜商人在天

---

<sup>13</sup> Ibid., pp. 9-10.

<sup>14</sup> Ibid., p. 17.

<sup>15</sup> Ibid., pp. 13-14.

<sup>16</sup> Ibid., p. 16.

<sup>17</sup> Yuanc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52.

津、上海或其他港口形成一个强大而规模可观的社区，就像中国人在仁川和釜山所做的那样，朝鲜可以通过与北京谈判在这些中国港口建立定居点。只是由于朝鲜有限的海外商业活动，才使这种情况无法实现。<sup>18</sup>

关于治外法权，王元崇认为在强调中国在朝鲜的治外法权时，应该记住在清朝通商口岸外进行非法贸易的朝鲜人一直享有治外法权。朝鲜商人非法到甘肃和四川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sup>19</sup> 在中国根据《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要求向朝鲜人开放通商口岸后，在没有朝鲜专员和中国地方官员签发的护照的情况下，前往甘肃和四川销售人参的朝鲜人数急剧增加。不过，北京特别指示地方官员要善待违规者以作为爱护朝鲜的一种方式，朝鲜也用宗藩术语来形容中国的仁慈。礼部、总理衙门和北洋总督最终指示地方官员将朝鲜违规者送往中国通商口岸的朝鲜商务专员处，违法者会被驱逐到朝鲜接受惩罚。在这些案件中，中国方面认为韩国违反者所犯的罪行可由其本国法律予以惩处，因此这些朝鲜公民或「罪犯」不受中国的管辖。在两国关于此类案件的双边交流中，没有提及朝鲜或中国的主权或国际法。<sup>20</sup>王元崇表示如果治外法权意味着帝国主义，人们将不得不得出结论，清朝和朝鲜对彼此实行帝国主义。<sup>21</sup>

王元崇在《*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一书中讲述到满清作为中原王国的崛起，其政权的政治和文化资源很大程度上

---

<sup>18</sup> Ibid., p. 174.

<sup>19</sup> Ibid., p. 174.

<sup>20</sup> Ibid., pp. 174-175.

<sup>21</sup> Ibid., p. 175.

来自于与朝鲜的关系，这证实并加强了满清王朝在新建立的多国家等级制度中作为中央王国的地位。<sup>22</sup> 但是，日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挑战宗藩关系，中国则改变了与朝鲜传统的联系以挽救宗藩秩序。<sup>23</sup> 中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转变政治和外交规范，将国际法的概念融入自身的宪法和制度体系。然而，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并未因此而瓦解，这就形成了两种要素并存的二元体系。

24

在谈到晚清帝国主义和非正式帝国的概念时，王元崇表示中国和东亚的学者普遍把帝国主义与西方或日本等同起来，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和日本对其他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侵略性的政治、经济或外交政策为基础的制度。但是，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有两派学者对这一公认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复杂化。第一种是「康乾盛世时期的帝国主义（High Qing imperialism）」，第二种是「晚清帝国主义（Late Qing imperialism）」。<sup>25</sup> 晚清帝国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虽然是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中国通过强权政治和经济扩张的强制手段也对较弱的国家实行帝国主义。这些学者认为朝鲜通常是晚清帝国主义唯一确定的受害者。「非正式帝国」的概念最初是用来指 19 世纪大英帝国强大的经济扩张，它为这个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sup>26</sup> 王元崇认为晚清帝国主义将中国视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史

---

<sup>22</sup> Ibid., p. 21.

<sup>23</sup> Ibid., p. 176.

<sup>24</sup> Ibid., pp. 121-122.

<sup>25</sup> Ibid., p. 16.

<sup>26</sup> Ibid., p. 17.

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和强大捕食者，这些学者将清朝与西方帝国主义比较，通过强加参照西方历史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而不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当地的环境中考察。事实上，清朝在朝鲜的活动不是帝国主义的表现，而是宗藩经验主义的表现。<sup>27</sup>

张礼恒在其〈从平行到交叉——「国际公法」与「宗藩体制」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西方的「国际公法」与东方的「宗藩体制」最初都不具有世界性，从其辐射的地区，施行的范围来讲，二者仅具有区域性，前者只能称为欧洲洲际公法，后者也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sup>28</sup> 但是，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的进程，欧洲洲际公法从欧洲走向全球，最终突破了洲际公法的藩篱，升级为世界国际公法。<sup>29</sup> 欧美列强作为国际公法的制定者挥舞着「强权即公理」的大棒，肆意践踏亚非拉美国家的权力。所以，国家实力才是维系国际公法的柱石。<sup>30</sup> 当公理匍匐于强权之下，长存于东方世界的宗藩体制在做了顽强的抵抗后，最后只能向欧洲国际公法低下了高傲的头颅。<sup>31</sup>

王元崇认为中国与朝鲜之间形成了一对共存、相互关联的双重外交网络。通过内外双重网络，中国和朝鲜对彼此的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修正。<sup>32</sup> 北京最

---

<sup>27</sup> Ibid., p. 17.

<sup>28</sup> 张礼恒，〈从平行到交叉——「国际公法」与「宗藩体制」的比较研究〉，《东岳论丛》，卷 39 期 9(2018 年 9 月)，页 31。

<sup>29</sup> 同上，页 33。

<sup>30</sup> 同上，页 39-40。

<sup>31</sup> 同上，页 41。

<sup>32</sup> Yuanch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pp. 144-145.

终采取了一种中间政策：协助朝鲜管理外交和商业事务，并在汉城派驻中国居民。但是，这种举措在西方国家看来只是以宗藩关系为借口而行干预朝鲜事务之实。此外，尽管中国认为它在履行保护朝鲜的承诺，但由于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和韩国民族主义在朝鲜内的影响，此政策加剧了北京和汉城之间的紧张局势。<sup>33</sup>

权赫秀也认为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无法继续与英国等欧美国家按照传统的朝贡惯例与原则进行外交，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为传统的朝贡关系，<sup>34</sup>他将此称为「一个外交两种体制」。与此同时，东亚传统朝贡体系中的周边朝贡国家也在这一时期被迫与欧美等国建立近代条约关系。<sup>35</sup>其中，朝鲜在 1884 年至 1895 年间的对外外交在所谓「两截体制」的双重国际关系框架下展开。所以中国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与朝鲜「两截体制」互为表里。<sup>36</sup>同时，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朝鲜对华外交中，一方面继续维持传统朝贡关系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又部分有所变通地接受近代条约关系原则与惯例的外交形态。<sup>37</sup>权赫秀认为朝鲜的天津驻劄督理通商事务衙门正是为了满足朝鲜的新型对华外交需要而设立的驻华外交通商机构。<sup>38</sup>

---

<sup>33</sup> Ibid., p. 177.

<sup>34</sup> 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卷 19 期 4（2009 年 12 月），页 72。

<sup>35</sup> 同上，页 73。

<sup>36</sup> 权赫秀，〈「两截体制」下的朝鲜驻天津督理通商事务衙门——兼谈 19 世纪后期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及其文化背景〉，《社会科学辑刊》，期 1（2015 年 1 月），页 121。

<sup>37</sup> 同上，页 123。

<sup>38</sup> 同上，页 126。

1. 天津衙门专门处理外交通商等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关系事务，其大体按照近代外交关系原则与惯例（西例）来制定，并被看作是驻劄天津乃至中国的领事（名目虽异，体制相同）。（同上，页 126。）
2. 天津驻劄大员与清政府南北洋通商大臣以及驻劄各口岸官员与当地清政府官员，以相互对等资格进行交涉与处理。（同上，页 123。）

Lee Yur-Bok 在《*West goes East :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一书中以穆麟德在朝鲜任职期间朝鲜的外交政策和他到任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依据，研究了十九世纪末朝鲜对外国入侵的反应，以及朝鲜在面对十九世纪末的东亚秩序时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寻求。<sup>39</sup> Lee Yur-Bok 表示虽然在研究中他的语气似乎是恐华的，但实际上他并不反华。不过，他认为一个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国家在不考虑弱国的财富和利益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技术上和政治上软弱的国家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更何况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落，彼时的中国再将意志强加于朝鲜这样一个正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小国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毕竟彼时的中国已经自顾不暇。他认为中国对朝鲜事务的干涉只给朝鲜和中国自己带来了灾难，所以他无法赞扬中国在 1882 年以后在朝鲜半岛施行的新帝国主义（China's new imperialism）。<sup>40</sup>

Lee Yur-Bok 表示朝鲜越是试图远离中国，中国越是以宗藩关系的名义严格控制朝鲜，而实际上中国使用的是帝国主义的方式。至于高宗，中国越是要控制他和朝鲜，他越是试图疏远中国。<sup>41</sup> 他认为中国是在 1882 年壬午兵变发生时第一次干预朝鲜事务，<sup>42</sup> 此时中国对朝鲜的姿态和政策已经变得相当干涉主义，甚

---

<sup>39</sup> Yur-Bok Lee, *West goes East :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1.

<sup>40</sup> *Ibid.*, p. 7.

<sup>41</sup> *Ibid.*, p. 32.

<sup>42</sup> *Ibid.*, p. 34.

至是帝国主义。<sup>43</sup> 中国开始了与朝鲜的新关系且这种关系甚至比西方对中国的关系更加不公平。<sup>44</sup> 在 1882 年及之后，中国从不干涉和仅提供建议的政策转变为直接干涉和侵略政策，清政府试图以宗藩关系的名义来为其干涉行为辩护从而让其干涉行为具有历史正统性。Lee Yur-Bok 还认为李鸿章假装坚称朝鲜仍然是中国的附属国是为中国在新帝国主义营造历史正统性和创造外交政策支持新帝国主义。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 1895 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被驱逐出朝鲜半岛。<sup>45</sup> Lee Yur-Bok 还在其专书论文〈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中表示李鸿章和满清领导者不应该以宗藩关系的名义阻止高宗的改革努力和政策，因为一个政治稳定、军事和经济强大的朝鲜无疑会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强大的缓冲地带，因此可能会阻止中日战争。<sup>46</sup>

笔者认为不应该将十九世纪末的中朝宗藩关系与新帝国主义划等号，上文中王元崇的观点已经很好地论证。至于朝鲜如果脱离中国的控制是否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一个政治稳定、军事和经济强大的国家，观照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朝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笔者认为这是非常难实现的。Lee Yur-Bok 认为高宗只想与中国维持松散的关系，使朝鲜更独立于中国的影响和控制，因为中国不再能为朝鲜

---

<sup>43</sup> Ibid., p. 32.

<sup>44</sup> Ibid., p. 40.

<sup>45</sup> Ibid., p. 33.

<sup>46</sup> Yur-Bok Lee,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 in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 17.

重生提供给朝鲜需要的东西。<sup>47</sup> 高宗完全掌权后，尤其是 1882 年后坚持寻求美国的援助，试图解决朝鲜的问题。<sup>48</sup> 高宗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是他坚定而持久的亲美取向的重要因素，<sup>49</sup> 高宗和他的追随者将朝美条约视为让朝鲜摆脱中国控制的工具。<sup>50</sup> 高宗认为在朝美 1882 年签订条约后无论朝鲜发生了什么，都将是这个条约的结果，因此美国对朝鲜负有道义上的责任。<sup>51</sup> Wayne Patterson 和 Hilary Conroy 在其合著论文〈Duality and Dominance: An Over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中认为朝鲜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依赖中国，可以说在朝鲜的外交政策中依赖外部力量并非不自然的反应，所以朝鲜过于依赖条约的条文，希望美国的顾问和外交保护能够帮助朝鲜。<sup>52</sup> 高宗这样的依赖心理很难让人相信朝鲜如若脱离中国的控制将会成为一个政治稳定、军事和经济强大的国家，至于强大的朝鲜甚至可以成为中日缓冲带进而避免中日战争的观点就更让人觉得脱离了十九世纪末的国际背景和朝鲜的实际情况。

上文提到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朝关系虽然有所调整，但仍旧在宗藩体制下展开。其中，权赫秀提出了中国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与朝鲜的「两截体制」互为表里，即中朝两国的交往仍旧在宗藩体制下展开，而中国或

---

<sup>47</sup> Ibid., p. 19.

<sup>48</sup> Ibid., p. 12.

<sup>49</sup> Ibid., p. 13.

<sup>50</sup> Ibid., p. 17.

<sup>51</sup> Ibid., p. 15.

<sup>52</sup> Wayne Patterson and Hilary Conroy, "Duality and Dominance: An Over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in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2.

者朝鲜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在近代世界秩序下展开。此外，朝鲜也在对华外交中部分地变通地接受了近代条约关系约束下的外交活动。张礼恒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及之后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仍旧在宗藩体制的框架下运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并未将朝鲜看作东方宗藩体制下的藩属国，而是将其认定为欧洲洲际公法意义上的藩属国。<sup>53</sup> 到了七十年代，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发生微调，开始有限度、有选择的介入欧美国家事关朝鲜的事务之中。<sup>54</sup> 八十年代清政府为应对欧美国家和日本的侵扰，维持宗藩体制的存在，确保东北的国防安全，清政府调整了传统的外交体制。<sup>55</sup> 但是七十年代的微调和八十年代的调整并不改变宗藩关系的原则，变通的仅仅是手段，这种变通方式成为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处理朝鲜事务的基本方针。<sup>56</sup> 1882年至1895年间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具体体现为李鸿章在1882年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此原则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藩篱，明确回应了东西方列强的挑战与质疑。<sup>57</sup> 「不沾不脱」原则是在保有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清政府绝不主动介入朝鲜事务，从而维护宗藩体制的权威性。此原则也是对中朝宗藩两国相处之道的约束与两国责任的划分，受朝鲜亲日开化思想的影响，清政府意在告诫朝鲜不要在「自主」与「事大」之间左右摇摆，要信守中朝宗藩关系，否则清政府将介入朝鲜事务，即「沾」。<sup>58</sup>

---

<sup>53</sup> 张礼恒，〈变与不变之间——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的博弈〉，《东疆学刊》，卷36期2（2019年4月），页92。

<sup>54</sup> 同上，页94-95。

<sup>55</sup> 张礼恒，〈李鸿章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原因探析〉，《江苏社会科学》，期5（2015年10月），页221。

<sup>56</sup> 张礼恒，〈变与不变之间——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的博弈〉，页91、93。

<sup>57</sup> 张礼恒，〈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卷32期2，（2017年3月），页97-98。

<sup>58</sup> 同上，页100-101。

中国的许多学者还将十九世纪晚期宗藩体制下中朝关系的变化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归纳出每一阶段中朝关系的特征，在研究的过程中诸位学者的观点也在不断地完善与细致化。同时，诸多学者对于某一事件或者某一具体时间段内的中朝关系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例如：《江华条约》签订前清廷有无干预朝鲜的外交。虽然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清廷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对朝政策较之前有所调整，清廷对朝鲜的内政外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具体从何时开始以及干预的程度如何，不同学者的观点则不尽相同。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笔者都颇有启发，让笔者对清末中朝宗藩关系、中国对朝策略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和更宏观的把握。笔者试图借助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与日本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等在具体事件中的交涉来分析李鸿章在当时处理朝鲜事务时所面对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在此种情况下他做出相应举措的原因及其举措对中国、朝鲜和中朝宗藩关系带来的影响，以至于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层面对整个东亚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

张礼恒在 2008 年发表的〈论清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及评价〉一文中将清王朝对朝政策分为两个阶段：1644 年至 1882 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清廷固守朝贡体制传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放任，「向不过问」，1882 年至 1894 年为第二阶段，清王朝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由过去的干涉变为渐趋严密的掌控。此期的中朝关系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宗藩关系。<sup>59</sup>而在张礼恒 2012 年出版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一书中，将清末中朝宗藩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宗藩体制的典范时期（1626~1860 年）；由骑墙观望到开始干预（1860~

---

<sup>59</sup> 张礼恒，〈论清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及评价〉，《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2009 年 8 月），页 241。

1882年)；全面干预朝鲜内政外交(1882~1894年)，由此可见其观点在不断完善。他不再以1882年作为清廷开始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分界点，注意到在1882年以前清廷已经开始调整对朝策略，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

台湾学者林明德的〈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 1882-1894年〉一文重点探讨了甲午战前十年中李鸿章的对朝策略及中国对朝政策由放任到积极干预的外部国际环境原因，以及此策略对朝鲜的影响和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在壬午兵变前直至甲午战前放弃了对朝鲜的放任政策而转为积极干预政策，这个策略是由李鸿章制定，袁世凯执行。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和俄罗斯南下的威胁引发了清政府的危机感，进而使其改变原有的政策态度。他总结到李鸿章的对朝策略「在于通过模棱摇摆的姿态和适当结集力量防止中朝传统的封贡关系受到任何威胁以充分利用牵制的策略。」李鸿章派遣袁世凯赴朝干预的策略集中体现了对朝干预政策落后过时。<sup>60</sup>

此外，还有学者就七十年代朝鲜江华岛事件后清廷和李鸿章有无影响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的历史细节展开讨论。王如绘在其1997年发表的〈《江华条约》与清政府〉一文中指出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并不是因为清政府的劝说。李鸿章虽然在给朝鲜大臣李裕元的复函中暗示朝鲜既应对日本有所防备，也应建立正常邦交，但是这封信是在《江华条约》签订一个多月后送达朝鲜的，所以此信的内容与《江华条约》的签订无关。在王如绘1999年出版的《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

---

<sup>60</sup> 林明德，〈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 1882-1894年〉，《韩国研究论丛》（第一辑），（1995年3月），页100。

问题》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中，他再次提到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是清政府劝说的结果的说法不能成立，且认为条约的签订与李鸿章有关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但是权赫秀在 2007 年发表的〈《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问题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一文中提出「直接的劝告只是判断有无关系或影响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其必要条件，没有直接劝告未必就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sup>61</sup>他的理由为「清政府通过第一次转咨、册封敕使志和一行以及李鸿章复李裕元函等三个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传达了清政府并不反对朝鲜与日本国签订《江华条约》以建立外交通商关系的立场，实际上成为影响朝鲜王国高宗政府开国外交方针的唯一国际因素。所以王如绘关于《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劝告』无关的主张不符合历史事实。」<sup>62</sup>之后王如绘在 2011 年发表的文章〈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中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重点回应了权赫秀指出的清政府通过「册封敕使志和一行」影响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一说。首先强调李鸿章的复函在条约签订后才送达朝鲜，不能作为清廷劝说朝鲜的例证。王先生也不认为清廷在传统不干涉政策背景下意在提醒朝鲜早做防日准备的咨文是清廷主动释放「不反对甚至希望朝鲜与日本『修好』的信号」。<sup>63</sup>

---

<sup>61</sup> 权赫秀，〈《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问题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史学集刊》，期 4（2007 年 7 月），页 21。

<sup>62</sup> 同上，页 20。

<sup>63</sup> 王如绘，〈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东岳论丛》，卷 32 期 6（2011 年 6 月），页 60。

在韩国被公认为韩国近代史权威的李瑄根在其《韩国近代史》一书中从朝鲜的角度讲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文中他常将日本和中国的举措进行对比和评价。作者在讲述 1884 年发生的甲申政变及其后的条约签订时不止一次指出中国只是虚张声势，对朝鲜的干涉也是空有其名，而从签订的条约来看日本最终占有了实质的权益。<sup>64</sup>他在书中虽然批评了中国对朝鲜的高压控制，但是他指出中国对于朝鲜领土没有侵夺之心，只是希望朝鲜成为中国东部的屏障，而日本的侵略野心则是确定的。他在评价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朝鲜的内政改革时表示：「日帝所强要、所承包之内政改革的重要施設，和他们的豪言壮谈完全是一种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sup>65</sup>

日本学者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一书主要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朝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根据，从朝鲜、中国和欧美三个维度探讨了中朝宗藩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作者提出了中朝关系处于「属国与自主之间」的概念，通过论证表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在十九世纪末期不是单纯的宗属关系，而是处于「属国」和「自主」二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最后，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结束了这种关系，迫使朝鲜走向「自主」。

权赫秀在 2013 年发表的〈东亚史视角新诠释——读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一文中除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外还指出此书虽过多关注「自主」概念及其相关问题，但是冈本隆司没有将中西对「属国」内涵的不同理解及其相关

---

<sup>64</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页一四三。

<sup>65</sup> 同上，页六二六。

背景进行深入探讨。所以，直接将清政府公私文献中所称的「属邦」与近代国家秩序中的「属国」概念直接对应从文本和历史语境层面上来说都是不妥的。<sup>66</sup> 权先生还指出书中有关李鸿章、马建忠等的研究结论也有待进一步商榷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sup>67</sup> 例如：他认为李鸿章与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动态的，并非从一开始就已经制定了清晰明确的策略，而是根据具体的事情做出相应的反应。<sup>68</sup>此外，他认为此书未从日本的角度对中朝关系进行讨论甚是遗憾。张礼恒在〈寻常与超越——评冈本隆司所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一文

---

<sup>66</sup> 权赫秀，〈东亚史视角新诠释——读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46期5（2013年10月），页50。

学术界已经有多位学者就中西方对于「藩属」概念的不同定义展开讨论并且将中国与西方的宗藩概念进行厘清。例如：

1.汪晖曾在其专书中阐述到在19-20世纪亚洲的殖民历史中，英国和其他列强通过缔结各种不同的条约，用 *suzerainty*（宗主权）翻译和界定亚洲区域的复杂的朝贡/宗主关系，并迫使清王朝放弃对于周边王朝的宗主关系，进而将这些王朝纳入列强控制的范围之内。（引自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页39。）（欧洲）宗主关系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或者说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宗主关系……与此相对照，亚洲地区的朝贡网络通常并不要求这一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宗主国的经济也并不依赖于藩属或藩地的贡品。帝国主义的宗主关系与亚洲地区的朝贡网络及其藩属关系有着重要的差别，两者之间并不是同质的。（同上，页40。）

2.宋念申在谈到「宗藩」一词的英文用词时表示他更喜欢使用「*zongfan hierarchy*（宗藩）」而不是「*tributary system*（宗藩）」来表示前现代东亚的世界秩序。「*zongfan*」一词是一个本土表达，它揭示了政治安排的社会学、哲学和宇宙学根源，而「*tributary*」一词借用了罗马帝国的历史背景，其根源在于财富的交换。（引自 Nianshen Song, "'Tributary' from a Multilateral and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April, 2012), pp.156-157.）

3.王元崇也表示他使用中文术语「宗藩」（*Zongfan*），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英文短语「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而通常不采用英文翻译「朝贡」（*tributary*）来指晚清与其属国（包括朝鲜）之间等级关系的本质……宗藩制度是建立中国及其属国政治正统合法性的中心。政治正统合法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指一个政治实体在中国世界等级体系中合法地位背后的普遍的思想、道德、文化和社会基本原理。（引自 Yuanch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p. 3.）

<sup>67</sup> 权赫秀，〈东亚史视角新诠释——读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页51。

<sup>68</sup> 学者宋念申也认为「东亚传统的国家间秩序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引自 Nianshen Song, "'Tributary' from a Multilateral and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p.156.）

中同样提到了日本作为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中东亚局势中的重要一极，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了日本对于「属国」与「自主」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且他对于冈本隆司在书中提到一旦这种关系被打破，东亚局势就会随之变得紧张，所以这便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关键因素的观点表示不赞同。<sup>69</sup> 张礼恒在 2017 年的论文中提到此书突出强调了朝鲜的「属国自主」，否认了中朝宗藩关系的客观存在。<sup>70</sup> 关于甲午战争的爆发，林明德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了侵略而发动的，不能说成是李鸿章的对朝策略所造成。<sup>71</sup>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与日本的侵略野心、李鸿章的朝鲜策略和属国与自主之间平衡的打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某一个原因，我们应该厘清这些引发战争的原因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而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综上，在宗藩体系下研究十九世纪末中朝关系的学者们较多涉及某一时间段的中国对朝策略，例如从 1884 年朝鲜甲申政变后直至甲午战前，此为李鸿章派遣袁世凯赴朝鲜干预其内政外交时期。不过，此类研究只是李鸿章对朝策略的一部分，我们无法通过某一部分了解到整个过程的动态变化。笔者认为将整个过程中几个重要时间段的具体策略相互联系、对比，从而分析出制定策略的前因后果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甲午战前的朝鲜

---

<sup>69</sup> 张礼恒，〈寻常与超越——评冈本隆司所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当代韩国》，期 3（2013 年 9 月），页 123。

<sup>70</sup> 张礼恒，〈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页 99。

<sup>71</sup> 林明德，〈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 1882-1894 年〉，页 118。

策略，但通常未将清廷与李鸿章的态度进行区分。事实上，并非每一时期李鸿章的态度都与清廷的态度完全一致，尤其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李鸿章在清末时期的涉外事务中常作为全权大臣处理各项事宜，其朝鲜策略的动态变化对于研究清末时期的中朝宗藩关系至关重要。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以李鸿章的朝鲜策略为中心探析十九世纪末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过程。此外，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清廷或者李鸿章的对朝策略时没有提及其他重要人物的观点，例如驻外公使、驻边官员、在国外直接处理交涉事务的官员和驻扎朝鲜的将领等，由于不同官员的立场不同，所以对于同一事件的处理态度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其他官员的对朝态度与李鸿章的态度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分析出李鸿章在每一时间段具体的对朝策略背后的多层考虑和复杂原因。综合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观看到在朝鲜变为所谓的独立国家前的二十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动态变化，以及此过程中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最终了解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是如何在无法平衡各方势力的过程中走向瓦解并对于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以及对朝鲜独立后的大韩帝国和日据时期的朝鲜产生的深远影响。

## 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鸿章属国策略的调整

清政府在 1860 年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清廷发生了辛酉政变。为了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清廷对西洋开始采取协调路线。这时的中国是册封进贡体制与条约体制并存的二重体制，<sup>72</sup>即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使用近代国际秩序（以《万国公法》<sup>73</sup>为原则），与东亚宗藩体系内的国家交往时仍旧沿用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不过，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宗藩体系逐渐动摇，其中的导火索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被日本侵占。清政府没能很好地解决琉球一案，伴随而来的是日本愈发露骨地染指朝鲜半岛，与此同时越南、缅甸和暹罗这些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的国家陆续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1868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西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日本的改革不同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仅涉及器物层面，而是改变了政治制度，<sup>74</sup>进而

---

<sup>72</sup> （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页 18。

<sup>73</sup> 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于 1836 年出版《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 1827-1916）将其著作翻译为中文，名为《万国公法》并于 1864 年出版发行。翌年，《万国公法》被日本引入并掀起了一场诠释和讨论「万国公法中华世界秩序」的热潮，这直接影响了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关系、中日关系以及日朝关系。引自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页 147-148。

19 世纪以来的变化不仅仅是由于中日两国在本地区支配地位的变化，而且是由于一般国际规则的剧烈变化……这一新秩序以欧洲国际法为基本概念框架。（引自 Hui Wang, "Okinawa and Two Dramatic Changes to the Regional Order (Yongle Zhang, Trans.)," in Theodore Hutters ed.,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0.)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国内国家形成的轴心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西方国家提供了其他国家模仿(或有意识地拒绝)的模式。（引自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p. 153.）

<sup>74</sup>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页 525。

逐渐在思想上脱离亚洲，确立了「大陆政策」并采取「避西进东」的策略以图侵占其它亚洲国家领土，挑战东亚世界的传统秩序。<sup>75</sup>日本因为对马岛事件意识到对马岛和琉球的重要战略地位，从而决定侵占琉球，日本先将琉球国降为日本的藩，进而废藩置县将其变为日本的冲绳县。在琉球一案的处理过程中李鸿章始终没有坚持争取琉球，首先他认为清政府没有必要耗费大的气力争取偏远的琉球，其次他在权衡形势后没有信心帮助琉球争取回全部国土。日本通过琉球一案了解到李鸿章以及清政府对于藩属国问题的处理态度后愈发野心勃勃，紧接着将目光又落在了中国的藩属国朝鲜上。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意识到日本的野心及其对中国的威胁，他认为「日人诡譎而能自强，实乃东方异日隐患」，<sup>76</sup>「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阈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sup>77</sup>「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sup>78</sup>所以李鸿章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心头大患，严防日本要比防范西洋国家更为重要。七十年代日本试图侵占台湾、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将琉球废藩置县这一系列的行动让李鸿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处理中日外交以及朝鲜事务时对日本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李鸿章在各种情况下总是主张用「和议」的

---

<sup>75</sup> 日本向中国、朝鲜、琉球等国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引自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页131。）

<sup>76</sup>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共10册）》（册10，卷98）（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0。

<sup>77</sup>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二十四，民国影金陵原刊本，页832-833。

<sup>78</sup>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十七，页590。

方式解决问题，避免开战成为了他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李鸿章的此种倾向导致他在外交交涉中的妥协态度。

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常任全权大臣，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他并非仅处理单独的事件，而是还要考虑同一时间段内其他外交事务引发的连带影响，这种情况要求他要使用更为宏观的视角分析判断问题并确认最终的解决方案，但这不能完全成为他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持妥协态度的绝对理由。在态度强硬或软弱以外往往还存在多种折衷方法，但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李鸿章的外交态度往往较为软弱。所以，无论是朝堂之上的「清流」<sup>79</sup>、或是驻日的外交官员，还是带兵打仗的将领，在具体外交事务的处理态度方面时常与李鸿章的想法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 （一）日本对宗藩关系的首次试探

### 1.1 《中日修好条规》与李鸿章的对策

基于俄国的势力在远东地区日渐增强，日本明治政府向清政府提出希望通过条约与中国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总理衙门因为担心日本在订约时援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以《礼记·学记》中「大信不约」为由拒绝与日本订约，但李鸿章认为日本不是中国藩属国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若不与日本缔约日本将联合西方国家一同对抗中国，所以中国可与日本联合共同对抗西洋。两江总督曾国藩

---

<sup>79</sup> 属于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激进分子，对权势人物（尤其是曾同法国交涉议和的李鸿章）的妥协外交痛加抨击，并尖刻地将之讽刺为卖国及以权谋私。（引自（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页 109。）

亦认为日本「其理甚顺其意无他」，如果中方「拒之太甚」日本有可能「转求西国介绍」会更加麻烦并且会「疑我中国交际之道」。<sup>80</sup>况且日本不同于朝鲜越南琉球等臣属之国并且「欲仿泰西英法诸国之例」，所以中国应该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以免日本与中国「积疑生隙」，但是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通例办理尤不可载恩施利益一体均霑等语」。<sup>81</sup>

1870年10月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前往天津谈判，日本最初提出参照中方与西方国家已经签定的条约缔结中日条约。李鸿章参照曾国藩的意见对日本的提议予以驳斥，李鸿章为了区别中日关系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特意用「条规」替换「条约」二字，日方提出的「一体均沾」最惠国待遇和内地通商权也被拒绝。1871年7月直隶总督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办理日本通商事务与日方代表伊达宗成等往复商论一个多月最终定成「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国日本海关税则」。<sup>82</sup>此条约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间唯一的对等条约，清政府在条规中写入了「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sup>83</sup>条规还规定两国共同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等。条规中的「所属邦土」即指朝鲜，李鸿章认为「不可稍有侵

---

<sup>80</sup> 日本国志 40 卷，卷六邻交志上三，清光绪刻本，页 90。

<sup>81</sup> 同上，页 90-91。

<sup>82</sup> 同上，页 90。

明治政府对于伊达宗成所签订的条约并不满意，将伊达宗成撤职并于 1872 年 5 月派遣柳原前光赴中国商议改约，但遭到李鸿章的拒绝。日本政府见难以改约，遂于 1873 年 3 月派遣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华换约。

<sup>83</sup>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页 317。

越」一语可以预先杜绝日本侵犯朝鲜的意图，<sup>84</sup>可见李鸿章对于日本觊觎朝鲜早有警惕之心。然而，因为明治政府从未打算真正地与中国修好，所以修好条规自然不能约束日本的侵略政策。明治政府一直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在与中国缔约后便开始实行其「大陆政策」，修好条规只是在为日本侵占朝鲜做铺垫而已：签订修好条规即说明中、日两国为平等国家，那么日本的地位就会高于中国的藩属国朝鲜。<sup>85</sup>日方认为在「平等」的关系化方面中国作出了让步，进而日本明确地显示出以此为基础进而改变东亚国际关系结构的意图。<sup>86</sup>李鸿章虽然了解日本的野心，但是却高估了条规对日本的约束力且低估了日本为达到侵略目的灵活利用近代国际秩序打破传统东亚秩序的能力。<sup>87</sup>

在修好条规谈判前的 1870 年 7 月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写道：「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鞞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sup>88</sup>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和教

---

<sup>84</sup> 李鸿章，〈同治十二年〉〈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六月十五日）〉，收入孔昭明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9、160），李文忠公选集（上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页 13。

<sup>85</sup> 王金林，〈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理念及其明治时代的对华政策〉，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页 8。

《日清修好条规》并不表明明治政府的睦邻外交，而是表明了它为达到进一步侵略邻国目的的一个步骤。（同上，页 8。）

<sup>86</sup>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页 50。

<sup>87</sup> 自明治以来日本兼用「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与「西洋近代国际法原理」以实力进出「中华世界帝国」。（张啟雄，〈「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一〉，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18。）

<sup>88</sup> （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 2 卷（日文版）（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36-1963），页 7。（转引自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131 页。）

教育家福泽谕吉主张「安内竟外」、扩张国权，<sup>89</sup>并认为「振奋一国民心，感动全体的方便之法，莫如对外战争」。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福泽认为外战的首要目标为朝鲜，因为英、法、俄等国不可敌，南美诸国路途遥远而不可取，泰越等国不次于日本。<sup>90</sup> 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鼓吹日本要进行海外扩张，<sup>91</sup>由于当时日本的国力有限，所以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覲，一如内地诸侯。且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割北满之地，收南台、吕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sup>92</sup>由此可见日本政界官员与日本文人之野心，日本认为朝鲜对其大陆政策的实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方面甚至认为朝鲜是日本未来侵略中

---

<sup>89</sup> 宋成有，《东北亚史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页 248。

福泽谕吉（1835-1901 年）的文明论和对华观灵敏地反映当时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影响极其深远。19 世纪 60-90 年代，日本社会的对华观变化剧烈，经历了从和平友好到轻蔑敌视的转化过程。（同上，页 244。）

福泽谕吉认为「战争是伸向国家独立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战争论和贸易论的结合，构成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近代日本基本国策。（同上，页 251。）

在对中国的国家定位上，福泽断然否认了「中国乃礼义之邦」的传统观念。（同上，页 248。）

<sup>90</sup> 同上，页 251-252。

<sup>91</sup> 吉田松阴由于思想激烈，曾数度入狱。他在狱中写下《幽囚录》。书中提到日本要铸造舰艇，制作兵器进而向外扩张以立于不败之地最终称雄世界。吉田出狱后创办了松下村塾。在不到三年中给学生们传授了他全套的扩张理论，并灌输了一套忠君爱国，和侵占邻邦的帝国主义思想。（引自朱永德，〈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329。）

他的这批学生很多都参加了维新倒幕运动而成为了明治政府中身居要职的官员，其中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木户孝允等。他的「皇国史观」对于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深远。

<sup>92</sup>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页 7；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 1938 年版，页 7-8。（转引自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页 17。）

国的跳板。实际上，日本对于中国藩属国朝鲜的征服计划已经表明了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与威胁。

李鸿章深知朝鲜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盖日本陆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体之患；倭侵高丽，则为辽京根本之忧。」<sup>93</sup> 1873年副岛种臣赴天津，李鸿章告诉副岛「朝鲜乃圣贤之裔，礼义之邦，天之所兴，不可废也」。<sup>94</sup> 副岛种臣表示日本已经派遣使节赴朝鲜，但是朝鲜不理睬。李鸿章告诉副岛因为明朝时期日本丰臣秀吉大军对于朝鲜的蹂躏过重，朝鲜人对于日本的「深耻切恨」，如果日本以释前嫌欲修好为词或发展与朝鲜友好和睦的关系而不逼迫朝鲜进贡「亦未可知」。但是如果日本用武力逼迫朝鲜，那么断然没有「和好之理」。<sup>95</sup> 可见李鸿章认为中、日、朝三国的修好关系对于朝鲜的安全至关重要，他也相信这种关系约束日本的有效性。

## 1.2 日本在台湾的先行

因为朝鲜拒绝与日本建立邦交关系，日本的武士一直逼迫政府进行征伐。明治政府考虑到当时的国力不足以征服朝鲜，遂决定将目标先转向台湾以代替征伐

---

<sup>93</sup> 李鸿章，（同治十二年）〈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六月十五日）〉，收入孔昭明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9、160），李文忠公选集（上册）》，页13。

<sup>94</sup> 同上，页13。

<sup>95</sup> 同上，页13。

朝鲜。<sup>96</sup> 日本在获知「琉球难民事件」后，<sup>97</sup>外务卿副岛种臣分析「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能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所以「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因此，明治政府密令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应利用此番机会，切断琉球两属之根源，打开朝鲜自新之门户」，明治政府认为「此乃朝廷微意之深秘大计也」。<sup>98</sup> 此「深秘大计」为日本打算通过琉球事件达到侵占台湾、吞并琉球、破坏宗藩体系、令朝鲜开国的多重目的。

1874年2月6日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完成了《关于处理台湾蕃地要略》，提出了侵略台湾的详细计划。<sup>99</sup>同年日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在没有知会清政府的情况下突然出兵进犯台湾。日本中将西乡从道还表示日本的行为系正义之举：「无论琉球虽弱，尽可自鸣不平。」<sup>100</sup> 对于日本突然出兵台湾，李鸿章表示各国出兵都会提前用文函告知因何起兵，台湾生番一事并未提前商量如何处

---

<sup>96</sup> (美) 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宓亨利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页 318。

<sup>97</sup> 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的纳贡船漂流到台湾，船上的琉球岛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欲借此事扩大影响以侵略台湾领土。1873年4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借去北京换约(《中日修好条规》)之机试探清政府对于台湾的态度。他派遣随从人员柳原前光和翻译官郑永宁询问：「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不过问？」「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引自《清史稿》(底本：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 4620。)

日本将清政府所说的台湾原住民为「化外之民」解释为台湾为「无主之地」，并根据《万国公法》中提到的无主之地先占论来为其侵略台湾寻找合法性。

<sup>98</sup> 王金林，〈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理念及其明治时代的对华政策〉，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8。

<sup>99</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32。

<sup>100</sup> 《清史稿》(底本：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 4621。

理，怎能突然出兵。此外，李鸿章当时已经听说美国人李让礼带领陆军且雇佣美国水师官员带领兵船想要占领台湾。李鸿章认为：「此事如果属实，不独日本悖义失好，即美人帮助带兵，雇与商船装载弁兵军装，均属违背万国公法，且与美约第一款相助调处之意不符……若美国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不准应雇装载弁兵……此为第一要义。」<sup>101</sup>

在日本出兵台湾后的北京谈判中，柳原前光表示：「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sup>102</sup> 日方借万国公法坚称台湾为无主之地，将日本出兵台湾称为「保民之义举」，<sup>103</sup>其中的「民」则是指琉球人。清政府强烈抗议并表示日本此举违反了《中日修好条规》中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一条。<sup>104</sup> 但由于清廷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开战，清政府最终在 1874 年 10 月 31 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条约中写到：「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即琉球人——笔者注）妄为加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sup>105</sup> 据此，日本获得了吞并琉球的明文条例依据。<sup>106</sup>此外，清政府付

---

<sup>101</sup> 李鸿章，（同治十三年）「论日本图攻台湾（三月二十五日）」，收入孔昭明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9、160）李文忠公选集（上册）》，页一七。

<sup>102</sup> 《清史稿》（底本：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 4624。

<sup>103</sup> （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页 29。

<sup>104</sup>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致力于不平等条约改正的外交官薛福成在《盛世危言·公法》中表示：「公法乃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强盛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引自（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页 36、37。）

<sup>105</sup>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 343。

<sup>106</sup> 1875 年 6 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引自谢必震、胡新，《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页 133。）

给日本抚恤银十万（琉球被害船员家属的抚恤银），中方愿意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所建房屋，付给日本价银四十万两。此条约的签订既让日本体面地撤军，又使日本获得了经济与外交上的双重利益。此后，明治政府对其扩张政策信心大增，「征韩论」、「征清论」在日本甚嚣尘上。<sup>107</sup>

对于清政府的举措时任英国驻日本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es）感叹到：「幸运降临于日本（他们并不值得拥有这份幸运）。古老的中国竟向年轻的日本让步，道理明明在他们一边，对此我不禁感伤。」<sup>108</sup> 他还表示：「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sup>109</sup> 在日本计划和部署出兵台湾时，巴夏礼在写给同窗好友罗伯逊的信中表示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个好机会，在中国各地的兵工厂里静静地躺着的船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巴夏礼认为日本将面对残酷的失败，因为「日本人离开他们的自己的国家去作战，自然受限颇多。他们的战舰早已破烂不堪……他们所有的完好船

---

日本对琉球的统治不是在旧的关系下发生的，而是在一种新的关系下，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关系下发生的。（Hui Wang, "Okinawa and Two Dramatic Changes to the Regional Order (Yongle Zhang, Trans.)," p. 230.）

<sup>107</sup> 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页 132。

在岩仓具视于 1873 年归国前朝鲜拒绝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态度在东京的一些主要部长中产生了日益增加的敌意情绪。（引自 Gordon Daniels, *Sir Harry Parkes: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Japan 1865-1883* (Richmond: Japan Library, 1996), p.141.）岩仓具视归国后反对征韩，认为应该先发展日本的内政。但是 1874 年的《中日北京专条》无疑给日本那些支持征韩和之前持观望态度的政客们大大增强了成功征韩的信心。

<sup>108</sup>（英）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英）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 334。

<sup>109</sup>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收入（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 108。

只加起来不超过 6 艘，与中国在福州和上海新造的船相比，装备也显得十分落后。」

<sup>110</sup> 他还「真诚地相信中国人不至于愚蠢到用金钱去收买日本人」。<sup>111</sup> 然而李鸿章和清政府不能像巴夏礼一样掌握更多的关于日本的信息，此外李鸿章高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对于打败日本没有信心，且担心更多的国家卷入这场纷争中。最终，清政府妥协的条款为日本之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张打下了基础。

### 1.3 日本试探中琉宗藩关系

琉球自 1372 年（明洪武五年）就成为中国的藩属国，<sup>112</sup>日本明治政府于 1872 年废琉球国设置琉球藩，欲将琉球置于日本主权下。为了断绝琉球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明治政府于 1872 年剥夺了琉球藩的外交权，派外务省官员进驻琉球，将琉球由鹿儿岛管辖变为由外务省管辖。<sup>113</sup>此举是为之后的废藩置县做准备。1879 年日本废琉球藩设冲绳县，强行吞并琉球。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被日本强行吞

---

<sup>110</sup>（英）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英）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Frederick Victor Dickens）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页 331-332。

<sup>111</sup> 同上，页 332-333。

<sup>112</sup> 1.明清两代琉球在请求中国政府册封的藩属国行列中（引自谢必震、胡新，《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页 124。）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的册封共 23 次，（同上，页 78。）清廷册封琉球国共 8 次。（同上，页 83。）

2.不过，从 1609 年（日本庆长十五年）琉球便遭到了萨摩（岛津氏）军队的进攻，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被日本（萨摩藩、江户幕府）强有力地控制，江户幕府和萨摩藩把琉球纳入日本式华夷秩序（幕府体制）之中。自此，琉球一国两属的状态维持了大约 270 年。（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中译本前言，页 1。）

<sup>113</sup> 同上，页 262。

并中国不能坐视不管，而且琉球国王也遣使向清政府求援。<sup>114</sup>因此，中日之间展开了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对于琉球一案，清政府与明治政府进行了谈判。清政府内部对此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及其使团成员们与李鸿章都认为解决琉球问题要从日清友好、合作的角度出发，但李鸿章在具体的交涉过程中对日态度软弱，而何如璋及其使团成员的的对日态度坚决而强硬。

何如璋在 1878 年 5 月上旬写信给总署和李鸿章，他认为当时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以战胜中国且没有能力立刻发起战争，<sup>115</sup> 他主张力争琉球并提出了琉球三策。<sup>116</sup> 他认为中国要在日本国势尚未牢固时「先发制人」，若是「隐忍容之」将「养虎坐大」，进而形势变化，最终中国将「为人所制」，<sup>117</sup>更何况「让之一时

---

<sup>114</sup> 何如璋初到日本时路过神户，琉球使者马兼才（亦称与那原良杰、与那原亲方）带琉球国王尚泰密敕，伏地痛哭，恳请公使出手救琉球。（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前言页 16。）

<sup>115</sup> 1. 「日本今日之势固万万不能胜我」（（清）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十二，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一二三。）

2. 「日本废藩以前各藩未铸银钱惟通行纸币……废藩后由朝廷收而易之自明治四年至六年搜括全国金银共铸金银铜三货……西乡之乱复凭虚增造纸币……而自六年以后金银货皆不能复铸全国上下惟以纸币流行而已……若军事既兴枪礮购之于外不复能用纸币其势不敢妄动。」（同上（卷二，页十三），页一二四。）

3. 「……自日本通商之局其情形迥不相同矣今统计日本兵船粗足以自守而管驾兵官尚不足于用……」（同上（卷二，页十三），页一二四。）

4. 主张攻打朝鲜的西乡隆盛在日本西南战争中战死「即此一端可知东人之不敢轻易生衅」（（清）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琉球事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一九。）

<sup>116</sup> 琉球三策：「为今之计一面辩论一面遣兵舶责问琉球征其贡使阴示日本以必争则东人气慑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据理与争止之不听约球人以必救使抗东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师应之内外夹攻破日必矣东人受创和议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评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侥幸图存此下策也……」（同上（卷二，页三~四），页一一九。）

<sup>117</sup> （清）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琉球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一九。

未必能忍之他日也」。<sup>118</sup>此外，如果中国不援助琉球，琉球将怨恨中国最后心甘情愿地帮助日本侵略中国。<sup>119</sup>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灭琉球后将会侵略朝鲜，如果中国失去东部的屏障，日本将危及中国。<sup>120</sup> 在 1879 年 1 月 7 日何如璋与日本幕末高崎藩藩主大河内辉生（1871 年废藩离任，后为华族）的笔谈中，何如璋指出「按旧章办理」，即维持琉球的现状才是「交邻之善法」，并警告日本，琉球问题如何解决与日本利害攸关。<sup>121</sup>

1879 年 3 月 2 日，驻日使团中的黄遵宪、沈文荧与宫岛诚一郎笔谈，<sup>122</sup>沈文荧表示：因为日本「必欲郡县琉球」，所以使团要回国复命且表示琉球「朝贡已久」，中国政府「必不能漠然视之」。<sup>123</sup> 黄遵宪认为日本无视《中日修好条规》中的「两国所属邦土，务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一条，黄遵宪还表示：「吾

---

<sup>118</sup>（清）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十四，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四。

<sup>119</sup>「(琉球)今日争之其患犹纾今日弃之其患更亟也」(（清）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一九。)

<sup>120</sup>「日本今日灭球矣明日且及朝鲜欲必未厌也其势且将及我」(（清）何如璋，〈与总署总办论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十二，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三。)

<sup>121</sup>（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日琉关系史研究（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 497。

<sup>122</sup> 宫岛利用与公使馆员的笔谈暗中为明治政府高官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提供有关琉球归属交涉等方面的情报。（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前言页 11。）

大久保利通告诉公岛诚一郎：「闲谈之际，反而可谓政府谋求利益」，并要求宫岛「今后只管注意两国之协和，致力于两国和平」。（同上，前言页 15-16。）

<sup>123</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页 473-474。

辈且归，至于后事，未可知。或万一，当执鞭弭与君周旋也。」沈文荧说：「今贵邦政府贪其地，而不顾理之是非，将来用兵而致祸患，仆甚不解其惑也。」<sup>124</sup>此外，黄遵宪还曾写信给李鸿章，分析到琉球事件因日本侵台而起，日本欲先吞并琉球，再侵占朝鲜，最后占领中国。黄遵宪建议李鸿章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并且加强军备建设以防止日本侵略。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于 1879 年 4 月 16 日致信李鸿章，郭嵩焘试图通过举办中、日参加的国际会议，用国际社会的压力来迫使日本承认琉球的独立。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对于郭嵩焘的提议大加赞许，但是不久后，由于朝廷内部守旧派的批判以及外部势力的变化，李鸿章否决了这一提议。

<sup>125</sup>

日本提出与中国分琉球，虽然在正式的上奏中表示反对分岛改约案，但是李鸿章、总理衙门已经做好了接受分岛改约案的准备。<sup>126</sup> 两江总督沈葆楨表达了对琉球三分案<sup>127</sup>的不赞同，坚持将分割土地归还琉球以显示中国绝无覬覦琉球土

---

<sup>124</sup> 同上，页 474。

<sup>125</sup> (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日琉关系史研究(下册)》，页 618。

<sup>126</sup> (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页 332。

<sup>127</sup> 1879 年 5 月 27 日，何如璋致函李鸿章，主张专请美国调处。(俞政，〈何如璋简谱〉，收入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梅州文史 第六辑：何如璋专辑》(梅州：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页 201。)

1879 年 6 月，李鸿章委托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中调停。(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前言页 17。)

美国驻日公使宾哈姆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商量后向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提出的分割琉球的办法：在琉球中部(冲绳岛)复辟琉球王国，把南部(宫古、八重山)割让给清国，把北部(奄美诸岛)割让给日本。(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页 315。)

地之心。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认为清廷应该有一个确定的解决琉球问题的路线，或刚或柔都应该想好下一步的对策。朝中还有坚决反对琉球割地主张以武力复琉球国的王先谦。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反对其观点，认为要在中日修好条规的范围内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琉球问题。张之洞认为无论是琉球二分案<sup>128</sup>还是三分案都需要满足「复君」这一条件。<sup>129</sup>李鸿章基本上接受了薛福成的见解。在 1879 年日本宣布将琉球废藩置县，正式划归日本后，李鸿章先是想到了行文告知各国不要与日本领事来往，但当他试探了德国驻天津总领事和驻华大使、意大利驻华大使等各国领事后，发现这些国家只打算袖手旁观。此策无果后，李鸿章打算加强台防，派遣能打仗，有威信谋略之人赴台任职保护台湾，因为一旦琉球被日本吞并，台湾的安危将受到极大威胁，更何况此时距签订中日《北京专条》之时仅仅过去五年。可见，李鸿章已经做好了失去琉球这个藩属国的心理准备。清政府与明治政府于 1880 年 10 月达成一致准备签署《琉球分割条约》（将二分琉球、修订《中日修好条规》合二为一的琉球拟稿），但由于此条约草案遭到琉球人的坚决反对，复国运动接二连三发生，清政府暂缓签字，此条约遂被搁置。<sup>130</sup>

李鸿章主张和平解决琉球事件，接受二分琉球方案的外部原因是：受到同时期发生的沙俄强占新疆伊犁事件的影响，<sup>131</sup>清政府始终担忧日本和俄罗斯建立合

---

<sup>128</sup> 把琉球列岛一分为二，中岛（冲绳岛）以北归属日本，南岛（宫古、八重山）归属清国。（同上，页 298-299。）

<sup>129</sup> 同上，页 337。

<sup>130</sup> 同上，中译本前言页 3、页 383。

<sup>131</sup> 1853-1856 年俄罗斯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进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和远东地区。

作来对抗中国。中俄关系因崇厚在 1879 年 5 月缔结的《里瓦几亚条约》更加恶化。中国国内开战的气氛日益高涨，日本也越来越关注中俄关系的新动向。<sup>132</sup>

1880 年李鸿章认为由于日本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侵略态度，局势更复杂了。他曾告诉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日本是受到了俄国的煽动，中国将要两面作战。<sup>133</sup> 甚至当时的中国媒体也呼吁要警惕俄国利用琉球问题离间日清关系，并对日俄提携有可能给未来的日清关系带来危险提出警告。<sup>134</sup>

李鸿章试图通过《中日修好条规》约束日本，但近代世界秩序背后的本质是公平往往属于强者，条约的约束力极为有限。且根据中国之前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来看，条约体系的矛盾之处在于其前提假定是主权平等，但不平等条约又否

---

为了掌控中东局势，沙皇俄国与英国对新疆展开了激烈争夺。（引自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页 128。）在浩罕汗国将军阿古柏的势力延伸到天山北路后，1871 年 7 月沙俄以帮助清廷「防乱」和安定边疆秩序为借口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声明在中国恢复该地区秩序前将维持军事占领。（引自（日）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页 66。）清政府与沙俄展开交涉，但是沙俄拒不退兵。清政府于 1875 年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7 年阿古柏被清军击溃，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英国和沙俄希望利用阿古柏而吞并新疆的野心化为乌有。1878 年清政府「命吏部左侍郎崇厚使俄，议还伊犁及交白彦虎诸事」。（引自《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三，志一百二十八，邦交一，俄罗斯，页 4494。）崇厚在与沙俄交涉收复伊犁事宜时与沙俄签订了割让中国大片领土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清政府得知条约内容后拒绝批准条约，沙俄则在中国西部和沿海地区集结军队试图通过武力威胁清政府。1880 年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之子、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改议条约」。（引自《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二十三，本纪二十三，德宗 载活 一，光绪六年，页 865。）通过谈判，清政府与沙俄于 1881 年「改订新约成」，（同上，光绪七年，页 869。）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又名《彼得堡条约》），以准许俄国在华贸易特权为交换条件，收回了伊犁地区与中国准噶尔地区。（引自（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页 52。）「寻命伊犁将军金顺、参赞大臣升泰接收伊犁。八年二月（1882 年—笔者注），接收讫。」（引自《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三，志一百二十八，邦交一，俄罗斯，页 4499。）

<sup>132</sup>（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下册）》，页 637。

<sup>133</sup> 季南（E.V.G. Kiernan）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 46-47。

<sup>134</sup>（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下册）》，页 656。

定了主权平等。<sup>135</sup>所以，日本在与中国订立条约时也没打算未来将受制于条约。日本在订约前就已经周密计划，其目的与中国订约的目的大为不同。因此，日本要想实施其「大陆政策」便不可能被条约约束。日本通过侵台事件从中得利，意识到清政府对于藩属国的态度后，其侵占中国藩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在琉球事件的交涉过程中李鸿章态度软弱，因害怕日、俄联合挑起战争进而打算和平解决「球案」，先是寄希望于西方国家能够约束日本的行为，无果后接受了二分琉球的方案，进一步向日本暴露了其妥协的态度，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决心，同时也为日本成功染指朝鲜埋下了伏笔。

## （二）日本再探中朝宗藩关系

朝鲜与琉球是清朝的两个最重要的藩属国，对构成清朝的朝贡体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up>136</sup>日本在侵占琉球的过程中也对朝鲜采取了行动。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乘机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答以：「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sup>137</sup>日本通过试探了解到清政府的对朝态度。这样的回答在清政府的官员看来没有问题，完全符合华夷秩序下宗主国对于藩属国的管理方法。但是在以万国公法体制为标准的近代国际秩序中这样的

---

<sup>135</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页214。

<sup>136</sup> 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页118。

<sup>137</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597。

回答却是授人以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企图利用万国公法来攻击传统的华夷秩序，所以当日本了解到清廷对于藩属国朝鲜的态度后便找到了侵占朝鲜的突破口，即坚称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清廷官员对于万国公法的生疏导致他们不能游刃有余地在对外交涉中与西方国家及日本周旋，即使是李鸿章，对于近代世界秩序的规则也不能操纵自如。

1875年5月日本军舰云扬号驶入了朝鲜江华岛海峡并炸毁炮台，烧掉永宗城，杀害朝鲜士兵并抢夺朝鲜士兵的武器。清廷总理衙门的官员对于江华岛事件的处理态度为朝鲜事务由朝鲜自主解决，而李鸿章则认为清政府此时应该主动过问朝鲜事务。因为总理衙门虽然可以凭借《中日修好条规》中的「不可侵越属邦领土」一条责问日本，但由于在江华岛事件之前日本多次寻求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清政府都「推诿不管」，也难怪日本侵越朝鲜。因为日本违背了《中日修好条规》以致于没有条约可以制止日本之后的行动。如果再不过问朝鲜事务，朝鲜也会感到失望，日本也会认为中国「薄待属国交邻」，「显示天下以不广」。此外，更令人担忧的是朝鲜若被日本逼迫或侵占，中国的东三省将失去屏障，「有唇亡齿寒之忧，后患尤不胜言」。<sup>138</sup>

日本于1875年11月命外务少辅森有礼为全权公使来华试探清政府的态度，森有礼向李鸿章表示日本急于与朝鲜建立通好关系，李鸿章让他对此事不要着急。朝鲜刚刚受到「炮台攻毁之辱」，所以「不肯平和接待」是意料之中的事，若「两

---

<sup>138</sup> 李鸿章，〈致总署 论倭派使入朝鲜〉（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卷：信函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336。

相怨怒，衅端已肇，则兵端易开」。<sup>139</sup> 一旦日、朝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军事实力与日本相差甚远的朝鲜势必会求助中国，基于宗藩关系中国需要抽调兵力援助朝鲜，但是当时清政府要处理的不仅仅是朝鲜问题：因沙俄强占伊犁左宗棠正带兵在新疆与俄国开战，1875 年马嘉理事件的善后事宜以及 1876 年 9 月《烟台条约》缔约前的交涉事宜。<sup>140</sup> 李鸿章担心因为滇案在云南开辟新的战场，<sup>141</sup> 一旦如此，若朝、日失和清廷将不能提供充足的兵力以保护朝鲜，甚至有可能招致日本与其他国家联合从而引发更大的危机。所以李鸿章的对朝态度是劝服朝鲜与日本和平解决江华岛事件并接受日本的通商修好要求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

李鸿章建议总署致书朝鲜劝告其对日本以礼相待，或者派遣使节赴日本说明朝鲜向日本船舰开炮的原因「以释疑怨」，从而「息事宁人」，总署随即派遣「办

---

<sup>139</sup> 同上，页 336。

<sup>140</sup> 1. 马嘉理事件：已经占领下缅甸的英国在 1874 年派柏郎上校率领着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勘测队从缅甸出发北上云南，目的是探测两地之间的陆路交通以为修一条从缅甸仰光通往云南思茅的铁路做准备。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被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遣南下接应柏郎一队，1875 年初马嘉理与柏郎在缅甸八莫会合后北上云南。他们并没有事先告知中国政府他们所要在云南进行的活动内容，到达云南后马嘉理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开枪激怒了当地民众，遂被打死。

2. 虽然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冒险置身于危险之地，所在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英国政府却执拗地要中国方面负责，并指令威妥玛向中国索取赔偿。（引自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页 103。）威妥玛借马嘉理事件给清政府施压，扬言如果清政府不能妥善解决此事，将「调印度兵由缅甸图滇而结俄兵由伊犁进以牵制西师」（引自《左文襄公年谱（10 卷）》卷七，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页 228。），而且还增加军舰助威，以中英两国断交相威胁。此时清廷已经命左宗棠收复新疆，清廷内部议论纷纷，担心英俄联合谋划。李鸿章认为马嘉理被杀影响到了中英两国和睦，遂将涉事官员革职下狱，于 1876 年 9 月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

<sup>141</sup> 李鸿章没有从另一方面判断此事：中国西征本就与英、俄两国没有关系，英国想要越过缅甸在云南边境开市销售鸦片，英国此举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此外，由缅甸到云南一带不适宜作战，中国「以主制客不为利诱则地险心固」（同上，页 228。），中国未必不能保护自己的边陲。

理大臣往问朝鲜政府」。<sup>142</sup> 朝鲜右议政朴珪寿根据《中日修好条规》中不可侵犯属国一条判断日本的遣使行为是为修好，而不欲挑起战争。基于条约，如果朝鲜先不发兵，日本虽然用兵船恐吓，但也不会违背条约而发兵。所以，朴珪寿「倡议调停复修旧好国受平和之福」。<sup>143</sup> 与此同时，朝鲜朝廷中在大院君的授意下有一部分大臣仍旧「以为不必交邻……不必将武……闭境自守」。<sup>144</sup> 但是李鸿章认为朝鲜有必要接受日本的通商要求，他认为朝鲜之前之所以能够拒绝西洋国家的外交要求是特殊情况，因为「法、美皆志不在此」。<sup>145</sup> 但日本则「急求与高丽通好」，<sup>146</sup>李鸿章认为日本有可能会用武力让深闭固拒的朝鲜开国。

森有礼赴中国后向清政府提出与中国官员共同赴朝鲜的提议，但是遭到了奕訢等拒绝。总理衙门与李鸿章意见不同，总理衙门仍旧坚持应该由朝鲜自行与日本交涉。1876年1月，日本派遣陆军中将兼参议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副大使赴朝鲜议约。1876年2月11日，朝鲜代表和日方代表开始谈判。黑田清隆以发动战争威胁朝鲜并在2月12日要求朝鲜政府书面致歉并签署《通商修好条约》13条，朝鲜承诺十日后答复日本。朝鲜大院君力促申

---

<sup>142</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4625。

<sup>143</sup> 《云养集》卷之十一，书牍（三十四）：〈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辛巳冬在保定府时）〉。收录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集部，第三十五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页一六四。

<sup>144</sup> 同上，页一六四。

<sup>145</sup> 李鸿章，〈致总署 述副岛商论外交〉（同治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卷：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513。

<sup>146</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4626。

穗、尹滋承拒绝日本的要求，大儒崔益铉也上疏反对签约。爱国军民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表示要坚决击退「倭贼」。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及参判闵奎镐等虽欲妥协，但慑于大院君的威势而不敢表态。右议政朴珪寿及清语译官吴庆锡力主接受日本的要求，但领敦宁府事金炳学、判中枢府事洪淳穆等坚持反对议和。<sup>147</sup> 最终闵妃怂恿国王李熙下谕同意，李最应遂在 2 月 19 日宣布正式授予朝鲜谈判代表以协商权。<sup>148</sup> 最终「定约十二条，大要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埠通商，及日舰得测量朝鲜海岸诸事。」<sup>149</sup> 日本迫使朝鲜在 1876 年 2 月签订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又称《朝日修好条规》、《丙子修好条约》），<sup>150</sup> 这意味着日本的势力正式登陆朝鲜半岛，朝鲜被迫开国。该条约使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无关税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权益，日本不仅在朝鲜攫取政治利益，还将开始攫取经济利益。其中朝鲜是「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一条实际是明文宣称朝鲜为独立国家而不是中国的藩属国，<sup>151</sup>《江华条约》将朝鲜拽到殖民

---

<sup>147</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42。

<sup>148</sup> 同上，页 42-43。

<sup>149</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 14597。

日本在 1853 年被美国将领佩里强行开港，时隔 23 年，日本已经变为逼迫朝鲜开港。可见日本之野心和国力发展速度，日本要把它在西洋失去的从东亚弥补回来。

<sup>150</sup> 1876 年 8 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通商章程》中规定无关税。自 1876 年至 1882 年，日本控制着朝鲜的对外贸易。

<sup>151</sup> 《高宗实录》（原本：册 17 卷 13 章 15，A 面）（韩国国编影印本：册 1，520 面），高宗 13 年 2 月 3 日。

帝国体系和天下体系之间，<sup>152</sup> 这是日本继 1874 年《中日北京专条》后再一次用条约的形式动摇东亚政治秩序。1876 年 8 月 24 日日本与朝鲜签署了《修好条规附款》和《准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各港贸易规则》，这两项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进一步地控制了朝鲜的政治与经济。

此后日本常常在中、日和朝、日外交中表明朝鲜为独立国家的立场，宣称「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总理衙门的回应是：「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则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sup>153</sup> 总理衙门这时显然仍旧打算让朝鲜内政自主，而江华岛事件后李鸿章则倾向于引导朝鲜的内政外交决策，之后《江华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愈发感到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李鸿章深知朝鲜「所据形势，实为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sup>154</sup> 如若中国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不加干预，朝鲜将会被日本及西方国家操控，那样的话朝鲜将危在旦夕，中国进而也失去了东部的保障。

倘若森有礼来华请中国官员一同前往朝鲜时，总理衙门同意此事。那么，《江华条约》的内容恐怕就不会那么地不利于朝鲜，至少有了中方的参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日本。声称欲与朝鲜修好不得才使用军事力量的日本也很有可能因此借口以及中方的参与使条约内容更接近于《中日修好条规》。朝鲜没有缔约经验，中国则可佐之，例如，《江华条约》中规定日本可以进行无关税自由贸易，如若

---

<sup>152</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页 217。

<sup>153</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 14597-14598。

<sup>154</sup> 同上，页 14598。

有中国的帮助，朝鲜至少可以收得部分关税而不至于朝鲜大多数官员甚至不知关税为何物。李鸿章深知清政府若直接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势必将引来他国，尤其是日本的非议，同时朝鲜内部的不同势力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间接引导朝鲜的内政外交，从而替代了七十年代前期「属国自主」的对朝策略。

### （三）传统对朝策略的调整

为了牵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以避免琉球亡国的经历在朝鲜重演以及俄国势力南下带来的危机，在碍于「属国自主」不便直接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前提下，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通过私人关系于1876年至1879年间三次致函朝鲜相国李裕元以劝导朝鲜接受与西方各国缔结通商条约。虽然李鸿章这种间接劝说的方式看似没有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事实上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朝鲜「联美之计。为日俄各国所不愿。」<sup>155</sup>，所以李鸿章欲利用朝鲜让各国相互牵制从而避免与日本、俄国发生军事冲突以及牵制日俄势力在中国和朝鲜的蔓延：「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事关大局……各国曾欲与朝鲜通商，儆

---

<sup>155</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四十，光绪七年十二月四日，1 번째 기사 1881년。

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sup>156</sup> 朝鲜「如与美国订约。则他国不致肆意要求。于大局实有关系。」<sup>157</sup>

李鸿章了解俄国的实力与野心，尤其在清政府拒绝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后，中俄关系恶化，李鸿章亟需想办法牵制俄国势力南下至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同时，李鸿章担心万一日本因琉球问题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日俄很有可能联合，<sup>158</sup>俄国也有可能趁中日交战之际染指朝鲜。若如此，不仅新疆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而且朝鲜也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1881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分析俄国打算进攻朝鲜，<sup>159</sup>他认为如果中国失去朝鲜，在政治上是严重的。为此李鸿章曾请求过英国同朝鲜缔结一个条约，<sup>160</sup>但威妥玛认为如果只有英国干预此事，将会让俄国加速实现进攻。所以，保住朝鲜的唯一方法是让许多国家在那里拥有既得利益，这样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它独吞，<sup>161</sup>李鸿章受到了英国方面的鼓励，亟欲设法置朝鲜于中国的控制之下。<sup>162</sup>威妥玛要求总理衙门宣布朝鲜对各有约国开放，总理衙门在

---

<sup>156</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598。

<sup>157</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四十，光绪七年十二月四日，1 번째 기사 1881년。

<sup>158</sup> 在讨论琉球分岛方案时，时值中俄关系极为紧张，俄舰十五艘集中长崎威逼中国沿海。（引自谢必震、胡新，《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页137。）

<sup>159</sup> 威妥玛电，1881年2月（据正文上下文语气，此处似应为1月。——译者）27日，文17.833号。（转引自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72。）

<sup>160</sup> 威妥玛文一七，密件，1882年5月12日，文17.895号。（同上，页81。）

<sup>161</sup> 同上，页78。

<sup>162</sup> （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虞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页371。

1881年2月「非常热烈地」同意了。<sup>163</sup>至此，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对朝策略已经趋于一致。

事实上，说服朝鲜与美国及其它欧洲国家成功订立条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参与此过程的清廷官员也不仅是李鸿章一人，中国的驻边、驻外官员可以掌握更为全面和及时的他国形势信息，朝鲜赴日本和中国的使节也通过与外界交流而率先认可朝鲜开化政策。他们在此过程中都为朝鲜与西方国家的订约做出了努力。早在日本侵台后期就盛传日本将移师朝鲜，<sup>164</sup> 1874年7月办理台湾等处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楨函告总理衙门，表示朝鲜因为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与法、美两国已有前隙，如果日军进犯朝鲜，法、美两国必定会助力日本而朝鲜的军事力量又不足以抵抗此三国。所以，如果中国能让朝鲜与法、美立约通商，日本势孤，将不敢发兵，朝鲜将得以保全。奕訢据此上奏说：总理衙门之前委婉阻止了朝鲜与法、美立约通商，如今日本有可能进犯朝鲜，应该让礼部秘密询问朝鲜国王的意思，预先筹划办理。1874年8月朝鲜政府收到清政府的咨文，信中建议朝鲜国王通过商议条约的方式向法国和美国的要求让步。信中分析了日本在进犯台湾后有可能攻打朝鲜，如果不满足法国和美国的要求，它们有可能联合日本攻打朝鲜，那样

---

<sup>163</sup> 威妥玛电一〇，1881年2月9日，文17.859号。（转引自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81。）

<sup>164</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33。

的话对于朝鲜来说将是灾难性的。<sup>165</sup> 此密信使朝鲜满朝惊惧，对于朝鲜与法、美立约通商，新任领议政李裕元表示无法接受。<sup>166</sup>

### 3.1 何如璋之朝鲜通商策

时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也对说服朝鲜与欧美国家通商贡献颇多。何如璋在1878年4月就写信给总署，认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sup>167</sup> 1878年夏，何如璋建议李鸿章大力主持朝鲜与各国通商之事，<sup>168</sup> 他认为朝鲜「与越南之疏远缅甸之偏僻相去万万」，<sup>169</sup> 「俄罗斯之视朝鲜直犹外府一旦事起吾欲救之则恐力不敌不救则朝鲜既灭患在肘腋」。<sup>170</sup> 要想化解朝鲜被俄国吞噬的危机，不得不借其他国家之力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泰西诸国无不忌俄正可借各国之势暂相牵制」，<sup>171</sup> 将俄罗斯本想在朝鲜专占的利益为各国均分之以牵制俄国的势力。

---

<sup>165</sup> Yur-Bok Lee, *West goes East :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 pp.18-19.

<sup>166</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33。

<sup>167</sup> 俞政，〈何如璋简谱〉，收入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梅州文史 第六辑：何如璋专辑》，页200。

<sup>168</sup> 同上，页201。

<sup>169</sup> （清）何如璋，〈主持朝鲜外交议〉，《何少詹文钞》卷一，页十二，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六。

<sup>170</sup> （清）何如璋，〈上李伯相论主持朝鲜与各国通商书〉，《何少詹文钞》卷三，页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九。

<sup>171</sup> 同上，页一二九。

他认为通商将有利于朝鲜，与外国「倾心结好可不陷安南之覆辙」。<sup>172</sup> 在之后的信函中他还建议让朝鲜主动开国，「与英法美德结约通商」，<sup>173</sup> 因为「天下万国无论强弱无能闭关之势」，<sup>174</sup> 朝鲜的形势必须开港，「万不能闭关也」。<sup>175</sup> 何如璋还分析到不能让朝鲜自主与其它国家缔约，若如此其他国家便会认为朝鲜是独立国家而不是中国属国，那样的话将遗患无穷。1880年11月底何如璋致函总署，建议「谕旨飭令朝鲜国王与他国结约并飭其条约开端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某国结约云云则大义既明屏藩自固」，<sup>176</sup> 朝鲜开港后「应飭令彼国袭用中国龙旗或围绕以云微示区别以崇体制」。<sup>177</sup> 何如璋总结道：「总之今日时移事变中国之待朝鲜总须稍变旧章方能补救」。<sup>178</sup>

何如璋为了让朝鲜同意通商，1880年8月在朝鲜第二任修信使金宏集赴日本谈判通商事宜时，主动让参赞黄遵宪与翻译杨枢前往金宏集下榻的浅草本愿寺表达急于会晤的意愿。从1880年8月23日的笔谈直至9月初金宏集出发归朝，何如璋给金宏集讲解了西洋各国的均势之法：「若一国与强国邻，惧有后患，则

---

<sup>172</sup> 同上，页一二九。

<sup>173</sup> （清）何如璋，〈再上李伯相论朝鲜通商书〉，《何少詹文钞》卷三，页四，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九。

<sup>174</sup> 同上，页一二九。

<sup>175</sup> （清）何如璋，〈主持朝鲜外交议〉，《何少詹文钞》卷一，页十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一七。

<sup>176</sup> 同上，页一一七。

<sup>177</sup> 同上，页一一七。

<sup>178</sup> 同上，页一一七。

联各国以图牵制，此亦自前不得已应接之一法」，<sup>179</sup> 以及俄国对朝鲜的威胁：「现西人竞言功利，而俄又横暴，如战国虎狼之秦。闻其近年于图们江口一带，极意经营，且本年又增设水师于东海，此事大为可虑，迟则变生」。<sup>180</sup> 最重要的是向金宏集提出速速与美国缔约的重要性：「愚见俄事颇急，现海内各国，惟美系民主之国，又国势富实，其与列国通好，尚讲信义，不甚图占便宜。此时彼来善求通商，若能仿此间议改之约稿，与之缔立条规，彼必欣愿。如此，则他国欲来通商者，亦必照美国之约，不能独卖，则一切通商之权利均操在我，虽与万国交涉，亦有益无损之事，此万世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若必欲深闭固拒，致他日别生波澜，事急时所结条规，必受亏损无类……」。<sup>181</sup>

由于金宏集归期将近，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在驻日公使何如璋的授意下写出了《朝鲜策略》。金宏集在赴日考察时与黄遵宪见面并将《朝鲜策略》带回交给朝鲜国王。《朝鲜策略》中最为关键的一策是为防止俄国南下给朝鲜带来的危机，朝鲜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sup>182</sup> 临别时黄遵宪还对金宏集说：「今日尚

---

<sup>179</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页 705。

<sup>180</sup> 同上，页 706。

<sup>181</sup> 同上，页 707。

金宏集回答何如璋：「……日昨伊藤博文亦言：与一国立善约，则他国皆遵之，交万国与一国无异云……」（同上，页 707。）

日本政府在 1879 年秋便表示了欲通过让朝鲜与他国立约来牵制俄国的意向。（季南 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77。）

<sup>182</sup> （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11 卷，卷七，民国铅印本，页 53。

《朝鲜策略》中论述了提出此策略的具体理由，「联美国」的原因是：当今世界上无论大小国家没有能闭关绝人的，朝鲜千万不能闭关自守，万一俄国挥师而来，英、法、德、意将群起而争，

欲闭关，可谓不达时务之甚，仆策中既详及之，请归而与当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倾，是在君子。」<sup>183</sup> 金宏集通过笔谈认识到朝鲜面临诸多需要改革的问题，他后来对朝鲜的开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sup>184</sup> 归国后他将《朝鲜策略》呈给国王李熙。1880年12月30日，何如璋收到金宏集10月19日的来信。建议总署寄书朝鲜，劝令外交。<sup>185</sup>

朝鲜国王李熙令臣民传阅〈朝鲜策略〉，1880年11月3日擢升金宏集为吏曹参议。1881年2月，朝鲜仿照中国的总理衙门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其模仿的是清廷在过去几十年采取政府改革，<sup>186</sup>金宏集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经理。朝鲜的儒生传抄传阅《朝鲜策略》后，以李万孙为首的万人在野儒学者在1881年3月上国王书「岭南万人疏」，批判了俄罗斯威胁论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政策，认为是无根之说。<sup>187</sup> 朝鲜王室一开始试图说服这种批评，但是随着反对的人数增多和强度升级，朝鲜政府采取了激烈的措施，流放了几位官员并且

---

朝鲜恐怕将灭亡。为防止此事，联美一事变得非常紧迫。如果朝鲜与美国立一公平之约，则可作为与其他国家结约的参考，各国均势朝鲜将不被一国吞并。

<sup>183</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页710。

<sup>184</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前言页19。

<sup>185</sup> 俞政，〈何如璋简谱〉，收入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梅州文史 第六辑：何如璋专辑》，页204。

<sup>186</sup> Kyung Moon Hwang, *Beyond birth: social status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Korea*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2-53.

<sup>187</sup> (日)平野健一郎、張啟雄，《近代初头在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三种文化交错：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组, 2002)，页32-33。

将一位政府中最著名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斩首。<sup>188</sup> 之后朝鲜国内的反对声音被压下，但朝鲜国内仍旧存在着反对金宏集、黄遵宪，甚至于反对中国的声音。吴长庆的幕僚周家禄也认为朝鲜不同于三十年前可以闭关，而今「外」夷环伺风气大开非人力所能挽回一二」，那些见识狭隘的人不顾朝鲜国势面临的危险而闭关谢客「亦多见其不知量已」。<sup>189</sup>

### 3.2 李鸿章之朝鲜通商策

光绪六年（1880年）「据朝鲜国王咨称。该国讲究武备。恳为转奏请旨。俾该国匠工。学造器械于天津厂等语。」<sup>190</sup>「李鸿章遵筹朝鲜请派匠工学造器械一摺。」<sup>191</sup>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专为学习武备来京，并且索取了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带回朝鲜作为参照。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李鸿章上奏时表示要在朝鲜国内对于联络外国还存在争议之时劝导朝鲜让朝鲜破除之前的固有成见从而可以稳固中国的藩篱。由于朝鲜没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经验且与日本通商五年都没有收取关税，如果朝鲜与西洋国家缔结条约，必然会被欺压进而对中国有害无益。所以为防止损失，李鸿章让在西洋学习过的马建忠和郑藻如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东西洋的通

---

<sup>188</sup> Kirk W. Larsen,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 1850-1910*, p.71.

<sup>189</sup> (清)周家禄，〈守旧党〉，《寿恺堂集》十，页十五，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六二）》，页八八。

<sup>190</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十八，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九日，3 번째기사 1880년。

<sup>191</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十九，光绪六年九月六日，3 번째기사 1880년。

行条例代朝鲜拟与各国通商章程的底稿，让李容肃带回朝鲜以作为遇到问题时的参考依据。据此表明，李鸿章已经通过较为直接的手段介入朝鲜的外交。

光绪七年（1881年）朝鲜国内开始商量与美国订立条约的事宜并请中国代为主持。同年朝鲜派遣领选使金允植赴保定见李鸿章，希望中方可以代为主持与美国使者商议。金允植作为朝鲜在朴珪寿门下接受其主张开化的思想，他被朝鲜高宗派到中国以学习洋务的名义暗中商讨与美国缔约的相关事宜。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金允植提到俄罗斯对朝鲜的威胁：「俄罗斯扩其领土至于海蔘崴屯兵开港与我国边境只隔一水如虎豹之在傍」<sup>192</sup>他清楚地知道朝鲜不同于安南、缅甸和琉球三国，朝鲜与中国东三省相接，「藩蔽清国视同内服」。基于朝鲜的重要性，北洋大臣李鸿章「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陈利害劝与各国修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其策有联美亲清国二者为最要美国比欧洲诸国最为公平」。<sup>193</sup>

天津关道郑藻如以李鸿章之意致书朝鲜，其中讲述了联合美国的七个好处，并为朝鲜分析到：朝鲜已经同意与日本通商，那么其他国家也将要求与朝鲜通商。如果朝鲜等其他国家都来要求通商再同意，倒不如在一众国家中主动选择与一国率先缔约。所以，朝鲜应该借派遣学生赴天津一事迅速选择晓事大员到天津商办此事。朝鲜方面遵循李鸿章的安排，遂派遣金允植等到天津商议与西方国家通商

---

<sup>192</sup> 《云养集》卷之十四，杂著（四）：〈天津奉使缘起（壬辰）〉。收录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集部，第三十五册，页三七九。

<sup>193</sup> 同上，页三七九。

事宜，李鸿章「谕以利害动以理势使之必从」，<sup>194</sup>何如璋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金允植也认为「我国素昧交际若无清国勦助则必随事失误」。<sup>195</sup>

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朝鲜开始与美国商议订约事宜。美国在此之前让日本两次牵线与朝鲜朝廷沟通，<sup>196</sup>但是均被朝鲜拒绝，所以当薛斐尔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欣然答应前往天津商议具体事宜。李鸿章派遣道员马建忠和水师统帅提督丁汝昌会见美国全权大臣薛斐尔并东渡朝鲜。美国使者在拟好的约稿上没有写明朝鲜为中国属邦，李鸿章要求删改，薛斐尔不同意。后来经过商议，允许增加「属邦」字样，但是内政外交仍要让朝鲜自主。五月《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订立完成，「美使薛斐尔，朝鲜议约官申櫨、金宏集盟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sup>197</sup>朝美条约签订后天津海关道周馥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于一八八二年六月与朝鲜官吏鱼允中会谈，期间周馥劝朝鲜在和平时期尽快在中国的主持下与欧洲其他国家结约，「较安南独与法约。琉球独与美约。其情形大不相侔」，<sup>198</sup>这样才有利于保

---

<sup>194</sup>（清）何如璋，〈上李伯相论主持朝鲜与各国通商书〉，《何少詹文钞》卷三，页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九。

<sup>195</sup>《云养集》卷之十四，杂著（四）：〈天津奉使缘起（壬辰）〉。收录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集部，第三十五册，页三七九～三八〇。

<sup>196</sup>日本政府意识到其最近邻居的战略重要性，一再通知巴夏礼在东京的代理人 R.J.Kennedy，表示日本将欢迎其他西方大国与朝鲜签订条约，以表面上抵御可能的俄罗斯侵略。（引自 Gordon Daniels, *Sir Harry Parkes: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Japan 1865-1883*, p.182.）

<sup>197</sup>《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60。

<sup>198</sup>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页601。

障朝鲜的安全以避免重蹈越南和琉球的覆辙。朝鲜遂在同年六月通过马建忠与英国、德国缔约。

### 3.3 开化思潮影响下的朝鲜官员

清政府已经开始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和事务介入，自《江华条约》签订到朝鲜与西方国家缔约通商，随着朝鲜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加，朝鲜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发展，因此开化思想在朝鲜社会逐渐蔓延。朝鲜开化派主要分为主张向中国学习的稳健开化派和主张向日本学习的激进开化派，激进开化派想要让朝鲜对外脱离宗藩关系实现国家独立，对内建立君主立宪式的政治体制。<sup>199</sup>朝鲜在签订《江华条约》后仅二十天便派出修信使前往日本，至 1882 年李朝政府先后四次（分别为 1876 年、1880 年、1881 年和 1882 年）向日本派遣修信使。<sup>200</sup>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不用以往「通信使」的名号而改用「修信使」。<sup>201</sup>使团主官金绮秀出使日本时见识到了日本从西方引进的新器物和新技术，例如：轮船、火车、蒸汽船、水雷炮等，甚至还参观了日军操演。他更为关注新的政治体制和高效的行政与司法，<sup>202</sup>认为朝鲜应该借鉴新

---

<sup>199</sup> (韩)姜万吉 著，贺剑城、周四川等 译，《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页 181。

<sup>200</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前言页 19。

<sup>201</sup> 「修信者，讲旧修好，敦申信义。」引自（朝）金绮绣，《日东记游》，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册 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 337。

<sup>202</sup> 段志强，〈《日东记游》解题〉，收录于同上，页 333。

的制度。日本外务省大丞宫本小一告诉金绮秀日本因为四面受敌，为求自保不得已而改革习洋制。权大丞森山茂对金绮秀说：「苟欲效之而习之，吾辈当竭力以贡一得之先也。」<sup>203</sup>金绮秀将日本与朝鲜对比，也将日本与中国对比。他甚至通过对北京和日本城市的市容而得出日本街道比北京干净缘于日本政府「体制创新」的结论。<sup>204</sup>不过，日本现身说法规劝朝鲜推行西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想让朝鲜通过社会转型脱离中朝宗藩关系而实现独立，从而为日本逐渐控制朝鲜提供便利，1884年朝鲜激进开化派中的金玉均等人发起的甲申政变正是由日本暗中策划支持。

朝鲜的第二任修信使金宏集多次出使日本，他通过实地考察感受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飞速发展。他开始对朝鲜固有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并进行反思：「朝鲜的锁国政策既然已经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交往。然而，由于列强的利害未必一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sup>205</sup>开化思潮的倡导者大多为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官员，他们认为当时的朝鲜不能再因循守旧，不得不进行大的改革，他们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来挽救朝鲜的民族危亡。<sup>206</sup>

---

<sup>203</sup>（朝）金绮秀，《日东记游》，收录于同上，页 369-370。

<sup>204</sup> 段志强，〈看见现代国家——1876年朝鲜修信使的日本之行〉，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 54-55。

<sup>205</sup>（日）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东京：宗高书房，1972），页 744-745。（转引自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页 134。）

<sup>206</sup> 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页 133。

### 3.4 李鸿章与其他官员之属国观

李鸿章、何如璋、黄遵宪、沈葆楨、总理衙门官员奕訢等和朝鲜国王李熙（闵氏控制）以及支持李熙的开化政策的官员们，例如朴珪寿、金允植等对于朝鲜通商一事是认可的，只是每个人意识到通商必要性的时间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李鸿章的建议虽然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地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但是他对此事的介入得到了朝鲜国王及支持向中国学习的开化派官员们的认可。李鸿章对于朝鲜开化的介入是被朝鲜最高统治者接受的，因为符合朝鲜最高统治阶层的利益，但不可避免的是朝鲜仍旧存在像李裕元这样的保守派官员和大量的在野儒者反对朝鲜开化。

李鸿章、何如璋及黄遵宪对于实现朝鲜开化付出了颇多的努力，不过他们的属国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别。李鸿章主张在宗藩体系下对朝鲜实行控制并介入朝鲜事务而不打算「将朝鲜转化成近代国家法下的『属国』」。<sup>207</sup>但何如璋表示「泰西属国皆主其政治」，惟有亚洲的「贡献之国许令自主」，西人每谓贡献之国不以属土论」。<sup>208</sup>何如璋认为「趁朝鲜有事举而郡县之改良其政治整饬其武备是为上策」。<sup>209</sup>然而，在 1881 年 1 月 1 日，何如璋收到总署来电，否决代为主

---

<sup>207</sup>（日）茂木敏夫，〈李鴻章の属国支配観〉，《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2 号（1987 年）。（转引自（日）平野健一郎、張啟雄，〈近代初头在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三种文化交错：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页 24。）

<sup>208</sup>（清）何如璋，〈再上李伯相论朝鲜通商书〉，《何少詹文钞》卷三，页四～五，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九～一三〇。

<sup>209</sup>（清）温廷敬，〈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何少詹文钞》何传，页二，载于同上，页一〇九。

持朝鲜外交的意见，只准「密为维持调护」。<sup>210</sup>李鸿章所实施的对朝策略则是何如璋认为的下策：「听朝鲜自与外国通商但于约端声明奉大清国命云云备有事时干预之地步是为下策」<sup>211</sup>由此可见，何如璋更倾向于将朝鲜变为近代国际意义上的属国而不是东亚秩序下所理解的属国。

此外，通过何如璋、黄遵宪与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笔谈可以发现，黄遵宪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何如璋的近代属国观。<sup>212</sup>尽管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中劝说朝鲜自强，但是仅涉及结约、通商、富国、练兵这一层面而不是劝说其独立自主。曾任第二任驻日公使参赞的姚文栋也认为「废其自主之权，一切听吾措置」为上策，而「使人万国公会开埠，与太西通商」为下策，而且「朝鲜与欧洲隔远，俄欲取，英美之力未必能争。且既入公会，即虑其有自立之意，故此为下策，然逾于亡国。」<sup>213</sup>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实也证明了朝鲜在与欧美通商后开化思想蔓延并且部分官员接受了外国使者给他们传输的独立国家的思想，因此独立于中国建立独立国家的思潮开始在朝鲜出现。不过，主张向中国学习的朝鲜官员金宏集、金允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仍旧秉持着传统的属国观，即李鸿章所主张的东亚秩序

---

<sup>210</sup> 俞政，〈何如璋简谱〉，收入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梅州文史 第六辑：何如璋专辑》，页 204。

<sup>211</sup> (清)温廷敬，〈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何少詹文钞》何传，页二，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〇九。

<sup>212</sup> 1880年8月21日，在何如璋、黄遵宪与金宏集笔谈期间，黄遵宪说：「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情伪。有所疑难，望一切与商。我两国如同一家，阁下必能鉴此。」金宏集回答：「仆来此，大小事专仰钦使指导。」（引自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页 703。）

<sup>213</sup> (清)姚文栋，《上黎星使书》，收录于《海外奇书室杂著》。（转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下册）》，页 532。）

下的传统属国观念。他们并没有打算让中国完全为朝鲜主政，而是一切如旧，即「自主」管理朝鲜内政。他们同样主张朝鲜开化，希望改革朝鲜内政而自强，进而与中国更好地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

## 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朝鲜策略的变化

1882 年壬午兵变的发生导致清政府对朝策略的进一步转变，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介入，平乱后仍派兵驻扎朝鲜。1884 年紧随而来的甲申政变更是让清政府意识到错综复杂的朝鲜内部政治利益争夺将会导致朝鲜前途的不确定性，要想继续维持中朝宗藩关系中国必须看紧朝鲜。清廷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发生后命李鸿章相机筹划，所以此时清政府的对朝事务处理态度与方法基本上就是李鸿章的态度与策略。清政府在壬午兵变中对大院君的拘捕导致了朝鲜保守派势力的倒台，这相当于扶持了闵氏外戚集团。然而朝鲜民众对于闵氏家族在朝鲜的腐败统治积怨已深，清廷此举造成了朝鲜民心的转向，想要脱离中朝宗藩关系而走向自立的想法在朝鲜逐渐蔓延。

1884 年的甲申政变正是在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时日本扶持下的朝鲜开化派发动的一场政变，直接对闵氏集团的势力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开化派的政变由于清廷派兵镇压而迅速失败，政变失败的成员有的被杀，有的逃到了日本并在海外继续筹划推翻闵氏政权使得朝鲜自立。清廷在甲申政变中的军事行动保全了国王李熙的政权，政变后闵氏集团继续把持朝政，但随后清廷释放大院君回朝一事牵动着闵氏集团，为此闵氏集团试图通过投靠俄国以维持其腐败统治。在此种情

势下，李鸿章在 1885 年派袁世凯赴朝鲜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一职，从而达到全方位干预朝鲜内政外交以维护传统宗藩体系的目的。但是，袁世凯在朝鲜嚣张跋扈的行径使得朝鲜统治阶层对清廷颇为不满，从而导致朝鲜内部欲脱离宗藩体制的离心力不断增强。

### （一）李鸿章针对壬午兵变的策略

1882 年正值「法越构衅之事。筹办尚无善策。」之时，<sup>214</sup> 同年七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动军队将日本使馆包围放火焚烧并冲入王宫。李昰应是朝鲜国王的生父，把持朝政十年。癸酉政变后国王李熙亲政，王妃闵氏重用亲信，使得李昰应的权力被分割，李昰应对其怨恨。<sup>215</sup> 1882 年 6 月由于闵谦镐克扣军饷，面对军人的抗议，闵谦镐囚禁了军卒五人将依军法处置。军人将此事告知李昰应，在李昰应的「引导」下发生了军乱。闵谦镐、金辅紘、李最应等被杀，乱军甚至杀害了朝鲜王妃（实际上，闵妃扮成宫女出逃）。之后，「李昰应入阙晓谕诸军，自称『国太公』，揽国权」。<sup>216</sup>

李鸿章因丁母忧还乡，署理李鸿章职务的张树声将朝鲜兵变一事汇报给朝廷并请朝廷出兵平乱。清廷派遣海军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率兵舰东渡朝鲜，马

---

<sup>214</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四十八，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5 번째 기사 1882 년。

<sup>215</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3-4、31-32。

<sup>216</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 14602。

建忠到达仁川时，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经乘日本金刚舰提前到达。马建忠上书张树声请求援军：「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sup>217</sup>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也认为「若倭兵先期到达朝鲜，必先虏朝鲜王而盘踞首都，重演琉球（事件）之一幕」。<sup>218</sup>皇上特召李鸿章赴天津筹划，部署水陆各军，李鸿章命令吴长庆率领三艘兵舰前往朝鲜平乱。跟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且为吴长庆出谋划策的张謇在代吴长庆写给张树声的信函中表示此次行动需抓住时机且要迅速谨慎：「此举申威定乱，自是堂堂正正之师，迅速持重，皆须因机揽要，而非明正其最，不足正钟鼓曰伐之名，破胁从无知之惑。」<sup>219</sup>张謇认为要抓住祸首李昱应才可以平定此乱并杜绝日本要挟的可能，在李昱应「势孤力竭之时，当易得手」，<sup>220</sup>然后将其囚于中国且五六年内不能释放其归国，这样才能消除祸乱。李鸿章也对此想法表示赞同：「傅相二十一日来书中亦有昱应当在中国安置之语。似与长庆所筹不相枘凿。」<sup>221</sup>随后马建忠制定了诱捕动乱祸首的策略，和吴长庆、丁汝昌等候朝鲜大院君李昱应。等到李昱应前来拜谒时马建忠抓住李昱应，让丁汝昌护送至天津。之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鳌在朝鲜城东枉寻里擒获一百五十余人，吴长庆在泰利里

---

<sup>217</sup> 同上，页 14601。

<sup>218</sup> 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 176-180。（转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下册）》，页 534。）

<sup>219</sup> （清）张謇，〈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七件函·第二函〉，收录于（清）张謇著，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 2 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页 5。

<sup>220</sup> （清）张謇，〈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七件函·第四函〉，收录于（清）张謇著，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 1 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页 6-7。

<sup>221</sup> （清）张謇，〈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七件函·第七函〉，收录于同上，页 10。

捕获二十余人，壬午兵变被清廷军队迅速平息，「使四海知中国非徒事敷衍，而日人亦无置喙之地」。<sup>222</sup>

因为清廷的迅速反应和赴朝平乱军队的及时行动，「旬日之间。该国乱党悉平。局势大定。」<sup>223</sup>日本「初欲藉故多所要挟，见事已定，气为之沮。」<sup>224</sup>但是「朝鲜大难虽平。人心未定。尚须大兵震慑。吴长庆所部六营。即著暂留朝鲜」。<sup>225</sup>不过，壬午兵变后「清议」张佩纶提出〈朝鲜善后六策〉，他认为吴长庆一军暂留镇抚「殆权宜之一策非经久之宏图」，<sup>226</sup>「陆军久驻王都恐朝鲜苦倭兵之扰亦必兼苦我」，<sup>227</sup>所以「陆军护王都不如水军护海口应饬下部臣迅拨巨款先造快船两三艘由北洋选派将领召募中国滨海壮丁以为兵士驻守」。<sup>228</sup>他还认为吴长庆「久驻朝鲜。必不能锐然自任。请饬妥筹别选贤能。」<sup>229</sup>朝廷遂命李鸿章悉心察看「吴长庆久驻朝鲜。能否得力。」<sup>230</sup>李鸿章认为吴长庆驻扎在朝鲜的部队「并

---

<sup>222</sup> (清)张謇，〈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七件函·第一函〉，收录于同上，页4-5。

<sup>223</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五十一，光绪八年九月一日，3 번째기사1882년。

<sup>224</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十六，列传二百三，吴长庆，页12090。

<sup>225</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六十，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 번째기사1883년。

<sup>226</sup> (清)张佩纶，〈条陈朝鲜善后六事摺(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涧于集》20卷，奏议卷二，民国十五年涧于草堂刻本，页269。

<sup>227</sup> 同上，页270。

<sup>228</sup> 同上，页270。

<sup>229</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六十四，光绪九年六月十五日，1 번째기사1883년。

<sup>230</sup> 同上。此后，清廷多次提起让李鸿章察看吴长庆是否得力以及是否应该撤兵一事。

无不得力不相宜之处。自应令其留扎防护。」<sup>231</sup>编修朱一新上奏称「朝鲜之东莱仁川。首当冲要。我军驻扎汉城。似不如驻扎仁川以扼门户。现在统兵者资望较浅。朝鲜地瘠民贫。军士苦累已甚。饥溃堪虞。弗如征回内地。而令该国王为自固之谋。」<sup>232</sup>朝廷的回应是「为固圉保藩之计。应如何通盘筹画。经久可行。该编修所奏各节。有无可採。著李鸿章悉心体察。妥议具奏。」<sup>233</sup>之后的结果是吴长庆留在汉城镇守两年，袁世凯作为吴长庆的随员辅佐营务。

清廷担心朝鲜重蹈琉球的覆辙，迅速派兵平乱并抓捕大院君。这一举动已经直接干预了朝鲜的内政，改变了传统的宗藩关系。清政府成功镇压起义，拘捕了大院君，帮助闵氏集团铲除了异己。不过，张謇观察到朝鲜「虽倡乱者一二人，附和者数千百无知之辈」「大约恶见外人十居八九。原其心迹，亦惟恐国家受人挟制，愤愤不平」。<sup>234</sup>可见朝鲜民众普遍思想保守，没有机会与外界接触以致于对外界惘然无知，多数普通民众支持大院君。清廷的平乱之举使闵氏集团得以继续把持朝鲜朝政，对日妥协且统治腐败的闵氏集团在朝鲜已经不得民心，所以清廷的平乱势必会失去朝鲜民心。此外，在乱平之后日本使者与朝鲜议条约时，日方要求过分，从而使得朝鲜民众痛恨日本。<sup>235</sup>在商讨捉拿祸首一事时，吴长庆

---

<sup>231</sup> 同上。

<sup>232</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三，光绪十年九月五日，4 번째 기사 1884년。

<sup>233</sup> 同上。

<sup>234</sup> （清）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 <http://zhangjianyanju.org>

<sup>235</sup> （清）周家祿，〈大院君〉，《寿恺堂集》十，页九，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六二）》，页八五。

和张謇认为「此事自在朝鲜主持，未便顿然为之办理，以失众心，以乖待以自主之约」，<sup>236</sup>可见其担心中方迅速抓捕大院君之举将违背中国不干涉朝鲜内政的约定以致让朝鲜生心。

朝鲜的亲日开化党希望依靠日本的扶持改革朝鲜政治以实现独立，开化党在甲申政变中试图推翻闵氏集团的统治，而中方对壬午军乱的迅速平定显然扶持了闵氏集团的统治。所以，壬午兵变发生后清廷的对朝策略直接为两年后的甲申政变埋下了伏笔。壬午兵变被平息后，日使花房义质借日本使馆被焚烧之事要挟朝鲜。李裕元作为全权大臣，金宏集作为全权副官，前往仁川商议。因为日本和朝鲜已经多年有约中国不便直接干涉朝鲜与日本的交涉，不过道员马建忠已经「将其可许不可许各条豫为指示。」<sup>237</sup>但是，根据之后张佩纶对马建忠「擅预倭约」请求查办的上奏内容来看，马建忠对朝日条约「不但预其谋并且主其事」，对于条约中的「兵费五十万元及兵驻王城」两条，马建忠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认为朝鲜为中国属国，「吾属当由中国偿费谢罪经花房义质拒绝则告金宏集以赔偿兵费乃中外交涉正办朝鲜无资可由中国商局代借。」<sup>238</sup>最终，朝鲜同意赔偿日本五十万元，李裕元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日本以保护公使的名义获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力。张佩纶认为马建忠难辞其咎：「道员马建忠身在王都去仁川不及百里听两国私歃窃和事先绝无闻见事后复不争持谓之形同聋

---

<sup>236</sup>（清）张謇，〈代吴长庆拟致张树声七件函·第六函〉，收录于（清）张謇著，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页9。

<sup>237</sup>（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四十四，页1351。

<sup>238</sup>（清）张佩纶，《涧于集》20卷，奏议卷二，页271。

警坐失机宜实亦百喙难辞」。<sup>239</sup>中国在海陆两军驻扎汉城和仁川的情况下，居然对日本在朝鲜拥有驻兵权没有提出异议。根据李鸿章的奏稿，李鸿章认为「日本于中国勘办朝鲜内乱始终未敢僭越尚属恪遵公法」，<sup>240</sup>还表示「约款八条尚属无甚流弊」，只是日本借焚烧使馆一事让朝鲜赔偿五十万元较多。基于朝鲜的内忧外患，朝鲜国王希望迅速了事可以让日本不再挑衅。李鸿章还庆幸「中国水陆各军声较盛日本隐有所惮未遽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朝鲜以必从」。<sup>241</sup>然而，签订条约后的九月（1882年9月14日）在张謇的陪同下吴长庆接见花房义质，张謇在看到日军后认为「日兵甚弱，行不成列」。<sup>242</sup>

至此，李鸿章的对日妥协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在清军驻扎朝鲜且兵力较盛的情况下，对于日本提出的在朝鲜的驻兵权竟不予反对再议而是庆幸日本没有强迫朝鲜割地开矿，陆路通商。马建忠作为属下，更是欲通过帮助朝鲜偿费的方式显示宗主国的权威。壬午兵变后，日本兵船陆军没有撤出朝鲜，李鸿章认为在日方没有先撤军时「我军应暂留坐镇」，遂留下吴长庆「统率各营续捕乱党」。<sup>243</sup>此举实际是变相干预朝鲜内政，落日本以口实。然而张謇在1882年代吴长庆撰写〈中日战局疏〉时就提到：「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

---

<sup>239</sup> 同上。

<sup>240</sup>（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四十四，页1350。

<sup>241</sup>（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四十四，页1351。

<sup>242</sup> 倪友春，〈张謇与日本〉，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 <http://zhangjiyananjiu.org>

<sup>243</sup>（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四十四，页1351。

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此在稍识时务者即能辨之」。<sup>244</sup> 显然，李鸿章没有将吴长庆和张謇在一线处理军乱后得到的共识付诸行动。

威妥玛认为中国对俄国和日本侵占朝鲜的意图的恐惧长期存在，但是他在1882年5月写道他认为法国在越南东京的行动是当时让中国更为担忧的一个事实。<sup>245</sup> 而且法国对于朝鲜也暗自存在企图，法国还考虑到了俄国的特殊利益，并有意把法国处于能对俄国有利的地位。<sup>246</sup> 1882年5月之前李鸿章曾向威妥玛建议英国应该同越南缔结一个条约以制止法国的行动，但是威妥玛认为法国人的地位已经很稳固，要加以制止是办不到的，<sup>247</sup> 李鸿章对于法国有可能即将发动进攻表示担心。与此同时，李鸿章对于日本和其他国家有可能联合的情况也一直非常在意。所以，为了避免日本和他国联合，李鸿章在与他国商讨时总是被其他国家抓住软肋，予取予求。<sup>248</sup> 在1882年2月何如璋即将离任回国之际，宫岛诚一郎关于清政府是否会对琉球问题使用武力解决一事询问何如璋，何的回答是「两国绝不因此小事开大争端，我政府亦是此意。」<sup>249</sup> 此外，在1882年5月，李鸿章

---

<sup>244</sup> (清)张謇，〈代吴武壮公拟陈中日战局疏（清光绪八年壬午）〉，〈张季子九录（一）〉卷一政治类，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第三编 94 综合类)》(上海：上海书店, 1991)，页 5-6。

<sup>245</sup> 威妥玛文一八，密件，1882年5月12日，文 17.895 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82。）

<sup>246</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84。

<sup>247</sup> 同上，页 91。

<sup>248</sup> 同上，页 82-83。

<sup>249</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页 594-595。

曾向威妥玛隐隐地提到了缅甸有可能被英国并吞一事。<sup>250</sup> 可见，在越南出现问题时，李鸿章更加害怕其他地区再次出现争端，所以他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壬午兵变发生前的半年（1882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事件和李鸿章的应对策略似乎都暗示了朝、日《济物浦条约》不会有利于朝鲜和中国。

中国派出军队使朝鲜的秩序得以恢复从而避免让日本人镇压军乱，日本原本的企图失败。此时，明治政府在对清关系上存在协调论和对决论两个派别，<sup>251</sup> 不过协调论的支持者们最担心的不是中国的武力威胁而是俄国对朝鲜的威胁，而且协调论者也坚持朝鲜是独立国家的立场。在李鸿章看来若是日本没有从条约中得到一些好处的话，日本很有可能会挑起战争甚至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国。一旦如此，将会有更多的之前持观望态度的西方国家加入分羹的行列，朝鲜很可能灭亡进而危及中国。与此同时，清廷内部东征日本的论调高涨，认为应该趁着镇压成功之机东征从而解决琉球问题，但李鸿章认为不应该为琉球问题与日本构兵。基于上文的分析，李鸿章需要在同一时期应对不同国家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在他看来东征日本显然是不现实的，李鸿章甚至向美国书记官何天爵提出促使琉球独立并使其成为日清两国共同保护国的方案，<sup>252</sup> 他希望通过美国的仲裁避免与日本开战。至此，可以看出李鸿章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爆发，因为他相信战争一旦爆发，其他国家将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将会更加危险。

---

<sup>250</sup> 威妥玛文二〇，密件，1882年5月12日，文17.895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83。）

<sup>251</sup>（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日琉关系史研究（下册）》，页538。

<sup>252</sup>《冲绳县史》15，页359-360。（转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日琉关系史研究（下册）》，页540。）

在缔结《济物浦条约》的翌日（1882年8月31日），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他认为「日本事事与中国为难。显存凌轹之意……恐将来不驯至于失和打仗不止」，所以黎提议「若能仿英人处印度之例。直废其王而郡县之。则以后事事应手」。<sup>253</sup> 上文提到在壬午兵变发生前姚文栋就已经认为废朝鲜自主之权为处理朝鲜问题的上策，此外张謇也认为应该废朝鲜为郡县，但当吴长庆将张謇的策略「言于北洋北洋则悍然斥之」。<sup>254</sup> 不过，到了1883年黎庶昌的对朝策略发生改变，他认为既然中国已经允许朝鲜自主，那么中国对朝鲜的管辖之权已经少了一半，朝鲜人内部又产生分歧，「中日骑墙党早立」，所以中国对朝鲜一半的管辖权则又分为两半。将来到朝鲜的欧美人和外出的朝鲜人越来越多，到时候中国对朝鲜的管辖之权大概会剩无几。与其这样，不如改朝鲜为中立国。<sup>255</sup> 黎庶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朝策略是受到1883年中法之间关于越南问题的影响。而且，中法之间的矛盾激化很有可能导致日本与法国结盟。日本表面上表态不会联合法国，支持中日友好，但事实上日本为法国提供过劳工、兵船、士兵的支援。黎庶昌始终与李鸿章保持联系，李鸿章自然在处理对朝问题时会考虑到法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何况法国同俄国的友好

---

<sup>253</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页836。

<sup>254</sup> (清)张謇，〈为韩乱事致驻防吴提督孝亭函（清光绪十年甲申）〉，〈张季子九录（一）〉卷一政治类，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 第三编 94 综合类》，页8。

<sup>255</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三，页1199-1200。

将会给中国的领土完整带来更多的威胁。<sup>256</sup> 所以，李鸿章不支持将朝鲜废国而后郡县制是基于他对国际情势的考量。

不过，张佩纶在〈朝鲜善后六事〉中提到「当由中朝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的策略在 1885 年成为现实，<sup>257</sup> 李鸿章在 1885 年将袁世凯派遣至朝鲜参与朝鲜的内政外交。可见，李鸿章倾向于通过全面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的方式控制朝鲜，他仍旧打算维持原有的中朝宗藩关系体制而不欲采取更为直接的手段，因为在李鸿章看来直接废国设郡县对于中国来说存在更大的风险。李鸿章在绝大多数事件中的应对态度都是避战求和，因此其不大可能冒着其他国家联合对抗中国的风险对朝鲜采取更为激进的管理方式。

## （二）李鸿章针对甲申政变的策略

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壬午兵变之前就提出了「东洋盟主论」以为日本侵略他国的行径寻找合理性。甲申政变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的民权派曾希望日本可以联合邻邦中国与朝鲜一同对抗西洋国家，而日本的国权派主张政府使用强硬的武力手段对付邻国。对于朝鲜大院君李昰应在壬午兵变中被清政府拘捕一事，国权派主张借此事与中国开战以「帮助」朝鲜走上独立道路。国权派的主张在日本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且在甲申政变后日本

---

<sup>256</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89。

<sup>257</sup> （清）张佩纶，〈条陈朝鲜善后六事摺（光绪八年九月十六日）〉，《涧于集》20 卷，奏议卷二，页 269。

民权派的民主思想式微。<sup>258</sup>此外，日本在壬午兵变后加大了国家财政对于军备的投入，不断优化武器装备以为其「大陆政策」做充分的军事准备。<sup>259</sup>壬午兵变后朝鲜一直大局不定，民心不稳。日本看准此时中法正在交战，清政府将精力集中在越南和中国福建、台湾，无暇全力顾及朝鲜。日本趁机挑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在 1884 年挑起争端，发动政变。

## 2.1 甲申政变的发生与李鸿章的应对之策

朝鲜自从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旧政府为『守旧党』」两者水火不容。<sup>260</sup>维新党（开化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常去日本，倚靠日本人为外援。一八八四年十月中国商务总办和各国公使与朝鲜官员在朝鲜邮署饮宴。驻朝日兵运送枪支弹药进入日本使馆。待宾客到齐酒过三巡后，忽然起火，开化党成员闯入并杀害朝鲜官员数人，朝鲜禁卫大将军闵泳翊受伤。夜半，日本士兵进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接进入寝殿挟持国王，谎称中国军队到达，让日本军队进入保卫。第二日，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被杀害。

---

<sup>258</sup> 日本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只是国内政见分歧，在对外扩张问题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郎维成，〈再论日本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169。）

<sup>259</sup> 王金林，〈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理念及其明治时代的对华政策〉，收录于同上，页 10。

<sup>260</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 14604。

开化党人自署官职「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sup>261</sup> 朝鲜国王李熙请求清廷派兵平乱，金允植等至清军驻地求援。吴长庆责令日本使者撤兵，但是到晚上都没有答复。于是吴长庆率领的军队与日军在宫门外开战，清军斩杀洪英植及其部下七人，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逃往日本。日本使者自焚日本使馆，然后从济物浦逃走。

「据黎庶昌电称倭备兵数千。在熊本雇船十二号待发等语。现赴朝鲜官军。甚为单薄。」清廷指示「李鸿章于就近队伍。刻即调派。分起进发。庆军两营。可否调往以资得力。」<sup>262</sup>虽然清政府也在筹备兵力，但是清政府从根本上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一方面因为清政府一直以来的避战态度，朝廷强调要与日本「和衷商办」朝鲜之乱，要「妥速了结」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sup>263</sup>另一方面由于同期

---

<sup>261</sup> 同上。

<sup>262</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七，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二日，1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63</sup> 清廷在短时间内多次表示不要轻易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

1. 此次朝鲜致乱之由。尚未得有确信。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倭人生衅。（引自《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六，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八日，3 번째기사1884년。）

2. 总之目下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驻朝委员等所禀请兵救援。此事本未与日国开衅。何援之有。所禀殊未可尽信。（引自同上，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 번째기사1884년。）

3. 朝鲜之事。必须审慎筹办。不宜轻开兵衅。（引自《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七，光绪十年十一月一日，2 번째기사1884년。）

4. 吴大澂由津启程日期一摺。所陈以查办朝鲜乱党为名。立意不与日人开衅。深合机宜。即著该大臣等随时妥为筹办……速定朝鲜变乱。（引自同上，光绪十年十一月五日，6 번째기사1884년。）

进行的中法战争占用了部分兵力，客观上使得清政府无法全力对抗日本，这也是清政府避战的一部分原因。张謇在 1884 年写给统带驻汉城三营庆军的记名提督吴兆有的信函中就提出「日与法通日之扰衅必有为法牵制吾军之谋」。<sup>264</sup>

根据朝鲜国王和吴兆有的叙述，「是此次朝鲜之事。系由该国乱党勾结日人。致有此变。日本心怀叵测。其为伺隙生衅。以图狡逞。」<sup>265</sup> 张謇还在给吴兆有的信中分析到日本定会向朝鲜索赔兵费，朝鲜不能重蹈《济物浦条约》覆辙给日本赔款，且「此事似不必待日本向我说我即先须向日本理论曲直」。<sup>266</sup> 袁世凯也在甲申政变平息后的 1884 年 12 月 15 日提出了对付日本的方法：「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sup>267</sup>但是清廷和李鸿章并没有打算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交涉。

清廷派遣吴大澂、续昌赴朝查办。日本派遣全权大臣井上馨带领六艘载有陆军的军舰赴朝鲜，从济物浦登陆。日本要求朝鲜谢罪赔偿并提出在王京戍兵的要求。日本曾请求总理衙门任命一位全权大臣，但是李鸿章和清廷都坚决拒绝任命吴大澂为全权大臣，也没有赋予其他官员具有赴朝与日本谈判的权力。所以吴大

---

<sup>264</sup> (清)张謇,〈为韩乱事致驻防吴提督孝亭函(清光绪十年甲申)〉,〈张季子九录(一)〉卷一政治类,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 第三编 94 综合类》,页 8。

<sup>265</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七,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二日,1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66</sup> (清)张謇,〈为韩乱事致驻防吴提督孝亭函(清光绪十年甲申)〉,〈张季子九录(一)〉卷一政治类,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 第三编 94 综合类》,页 9。

<sup>267</sup> 附件一:〈驻防朝鲜提督吴兆有等来禀〉,收于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之卷六(九年至十年),卷六(二七六)(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页二十。

澂赴朝后没有权力与井上馨交涉，也无法干预日本和朝鲜的谈判。<sup>268</sup> 吴大澂在 1885 年 1 月 8 日闯入大堂，打断了日本全权大臣井上馨与朝鲜全权大臣金宏集的第二轮会谈并警告金宏集：如果草率与日本达成协议，将会激起朝鲜国民对他的愤恨。<sup>269</sup> 然而，吴大澂的警告并没有什么效果，朝、日在当天下午达成协议并于翌日签署。最终，朝鲜与日本签订《汉城条约》，朝鲜同意给日本赔款。

之后，日本以朝鲜动乱时日本军队进入朝鲜保护使馆为名，又以中国士兵枪伤日本士兵为借口，于 1885 年派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到天津与清政府议事。被光绪帝命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了几轮谈判，伊藤博文自拟五条，李鸿章最终将五条改为三条。李鸿章上奏时表示：

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sup>270</sup>

---

<sup>268</sup> 原武道，〈清军调遣与「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之对韩外交策略〉，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207。

<sup>269</sup> 同上，页 205。

<sup>270</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 14605-14606。

伊藤博文自拟五条：一，议定将来中、日两国永不派兵驻朝；二，前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亦不在前条之例；三，将来在朝鲜如有中、日两国交涉，或一国与朝鲜交涉，两国各派员商办；四，朝鲜教练兵士，宜由朝鲜选他国武弁一员或数员教练；五，两国驻朝兵，于画押盖

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最终于四月立约画押。日方认为即使日本撤兵，也可以根据《济物浦条约》以保护公使馆的名义向朝鲜派兵。李鸿章认为「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sup>271</sup> 所以，在李鸿章看来这些条款对中国是有利的且无碍于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但此项条约实际上变相承认了日本与中国都有权出兵朝鲜，这为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1894年日本借朝鲜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党起义）以及此条约出兵朝鲜，在农民军与朝鲜政府全州议和后日本仍不撤兵并强行「帮助」朝鲜改革内政，紧接着又挑起了一系列战役，中日甲午战争随之爆发。

李鸿章始终采用传统宗藩体系内宗主国的管理方法与朝鲜开展外交。壬午兵变后清廷没有派代表直接参与朝、日间的谈判，而是在谈判前对朝鲜进行了指导。此外，马建忠认为中国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有代朝鲜给日本赔偿兵费的责任。兵变平息后，由于日本没有撤军，中方则将军队暂驻朝鲜以保护藩属。甲申政变后对于日本请求总理衙门任命一位全权大臣时，李鸿章并未同意，派去朝鲜查办的吴大澂没有权力与日方交涉。以上体现了东亚秩序中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内政并有保护藩属的义务的内在逻辑。李鸿章的种种举措意在维护中朝之间的传统宗藩关

---

印后四个月限尽撤。（引自同上，卷一百五十八，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 4628-4629。）

<sup>271</sup>〈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与日使换约事竣摺（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八，页八（三七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 0153。

系，他并不想将中朝关系置于近代国际秩序中。但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国力和国际关系决定了清廷无法只奉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而不受到近代国际秩序的任何影响。同时，日本作为一个在短时间内急速学习西方的国家，自然会用近代国际秩序评判中国对朝鲜的一系列举措。所以，那些在东亚秩序中合理的举措在近代国家秩序下反而使得清廷落人以柄。

## 2.2 李鸿章对日妥协的原因

主和的李鸿章对于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局势以「定乱」为主，并不想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在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前驻日公使徐承祖曾来函告知日本调集广岛和熊本两镇的兵力为战争做准备，伊藤博文来华时带了很多水路将领以侦查沿途的情况，<sup>272</sup> 日本的这一行动极有可能导致「主和」的李鸿章为避免战争在与日本谈判时出让权利。李鸿章认为与日方接触应该「迎机利导。不可轻与挑衅。」<sup>273</sup> 毕竟在他看来日本是贪图小利之国：「日本最贪小利同治十三年台湾生番之役优给卹银略示宽大此次乘中法交讷之会借朝鲜兵争之事寻衅而来冀收渔人之利其愿望未尝不奢。」<sup>274</sup> 予「小利」以惠之当是最令李鸿章满意的解决方法。然而，日本的野心不仅限于「小利」，张謇在 1885 年认为「日本力不逮俄而

---

<sup>272</sup>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五十三，页1589。

<sup>273</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六，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八日，3번째기사1884년。

<sup>274</sup>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五十三，页1589。

较俄为近既攘中国之流虬为已有得陇望蜀益思图我朝鲜其君臣上下处心积虑亦非一年」。<sup>275</sup> 福泽谕吉在 1885 年发表了《脱亚论》，鼓吹日本脱亚入欧。据被福泽谕吉指派参加甲申政变的井上角五郎的透露，福泽不仅是政变「剧本的作者，而且亲自挑选演员、导演，提供道具，指挥一切」。<sup>276</sup> 在甲申政变失败后福泽在《时事新报》上鼓吹对华开战并建议日本与法国联合对抗中国。<sup>277</sup> 同年吉田松阴在长州藩的野山狱中写下《狱是帖》，他认为：「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信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sup>278</sup> 也就是说要通过侵占中、朝两国土地来弥补日本在西方国家的损失。

李鸿章在甲申政变后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国际因素是从甲申政变发生到次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始终伴随着中法战争。法国不断扩大其在越南的势力，<sup>279</sup> 1884 年上半年法军已经开始将战场推进至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法

---

<sup>275</sup> (清)张謇，〈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清光绪十一年乙酉)〉，〈张季子九录(一)〉卷一政治类，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 第三编 94 综合类》，页 14。

<sup>276</sup> (日)远山茂树，《福泽谕吉——思想与政治的关联》(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页 248。(转引自宋成有，《东北亚史研究导论》，页 254。)

<sup>277</sup>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 10 卷(岩波书店：1960)，页 178。(转引自宋成有，《东北亚史研究导论》，页 254。)

<sup>278</sup>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页 7；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页 7。(转引自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7。)

<sup>279</sup> 1883 年 8 月 25 日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宣布越南为法国的「被保护国」。1883 年 12 月清军和黑旗军被法军击败，随后丧失了战略要地北宁。1884 年 5 月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协议。失去中国援助的阮氏政府也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正式承认法国成为其唯一的保护国。(引自(日)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页 68。)

国提督。带兵船八只过厦门。向北开驶……彼以兵船来华。恫喝要求。自在意中沿海各处。」<sup>280</sup> 甲申政变发生于当年农历十月，那时法军主攻台湾基隆和淡水。甲申政变刚发生时，清政府认为朝鲜的事变不至于产生大的波澜，「台防紧要。极须援济。」<sup>281</sup>所以决定「北洋快船二号。自可毋庸调回。仍饬式百龄统带。同南洋开济南瑞南琛三船赴闽。」<sup>282</sup> 朝廷派南洋五船援闽，并让曾国荃与其他官员们妥善筹划援台策略。<sup>283</sup>然而，两天后又收到了朝鲜「土人焚日馆。竹使回国请兵之信。」<sup>284</sup> 李鸿章提议分遣七艘前去抗法的兵船赴朝鲜，不过朝廷只批准北洋舰队的两艘兵船驶往朝鲜，所以「北洋二船。调赴朝鲜。未经赴闽」，<sup>285</sup> 清政府认为不能将全部兵力放在朝鲜，仍旧要派军援闽援台以牵制法国，否则将顾此失彼。虽然日本并没有开战的合理借口，但是 1884 年 12 月英国驻华公使、兼管朝鲜事务的巴夏礼去总理衙门劝告中国不要对抗日本，以免日本与法国联合。此外，英方接到日本正在进行军事准备并且井上馨已经去朝鲜调查的消息后，巴夏礼据此指出如果日本被触怒而与法国联合，那么俄国也会参与进来。<sup>286</sup> 此外，在 1884

---

<sup>280</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八十，光绪十年三月二十六日，3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81</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六，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7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82</sup> 同上，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七日，2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83</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六，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7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84</sup> 同上，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八日，3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85</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二百，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4 번째기사1884년。

<sup>286</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164。

年 8 月的中法马江之战中中国战败，之后关于日法同盟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此种说法无疑会使得巴夏礼的劝说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进而促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对日持妥协避战的态度。

### 2.3 英国的干预与李鸿章的抉择

甲申政变发生后清廷增加在汉城的兵力至二千人，清军保持在数量上超逾日本一至两倍。<sup>287</sup> 此外，清廷还派出了军舰，巴夏礼表示中国的军舰「比日本拥有的任何军舰都大」。<sup>288</sup> 榎本武扬在 1885 年初机密地读给巴夏礼一份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大意说日本希望和平，<sup>289</sup> 而且在 1885 年 1 月 2 日俄国代表也表示强烈愿望这场争执不致引向战争。<sup>290</sup> 可是巴夏礼并未把日本和俄国政府方面也希望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向传达给中方，而是直到当年 3 月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前还要求总理衙门适可而止。

英方的考虑是：1879-1881 年的第二次英阿战争中，在俄军的援助和阿富汗人民的顽强抵抗下，英国放弃侵占阿富汗并从阿富汗撤军，没有获得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从北非到印度的势力范围带建立失败。此外，1885 年 3 月英俄因为在

---

<sup>287</sup> 原武道，〈清军调遣与「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之对韩外交策略〉，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206。

<sup>288</sup> 巴夏礼文三，密件，1885 年 1 月 4 日，文 17.977 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165。）

<sup>289</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165。

<sup>290</sup> 阿苏顿文，1885 年 1 月 2 日，附入巴夏礼文三〇，1885 年 1 月 24 日，文 17.977 号。（转引自同上。）

阿富汗的划界问题又发生冲突，战争一触即发。如果此时中国态度强硬使得日本挑起战争，俄国很有可能会乘虚而入以延伸其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一旦俄国吞并朝鲜，其在远东的势力将增强，进而危及中国，这将严重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以及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分布。此外，日本很有可能与法国联合，那么日本将从此脱离英国的影响，而不再是英国对付俄国的同盟。<sup>291</sup>基于此，英方要尽一切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与日本和议自然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解决方案，所以英方一直劝说中国并不断强调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与此同时，英方也提醒日本，中国因为与法国交战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国，尽管中国不愿与日本发生冲突，但因为成功地抵制了法国的要求，所以中国不会在日本的威胁下屈服。<sup>292</sup>由此可见英国为确保自身在东北亚的利益而在中日两方之间周旋。

基于一贯的妥协态度以及国际局势的复杂情况，以及指望英国在国际纠纷中帮助中国调停，在困难时刻与英国结盟等一系列影响因素，李鸿章倾向于相信英国分析的合理性而尽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在利益上向日本妥协。然而，英国的一切举措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不可能完全站在中国的利益角度考量。1885年4月初，中、法签署停战协定后日本感到了威胁，因为中法停战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充足的兵力与日本对抗。不过，为避免任何开战的可能性，李鸿章并不打算利用此事在中日谈判中给日本施压，而是在1885年4月18日签订了有利于日方的《天津会议专条》。此专条的签订让日本有了插手朝鲜事务的合理借口，日本也进一步了解了清廷对于藩属国的态度，朝鲜通过此条规也意识到清廷

---

<sup>291</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169。

<sup>292</sup> 同上，页166。

的妥协态度，此后中朝宗藩关系掺杂了更多的变数。不过，李鸿章仍旧不打算在名义上进一步控制朝鲜，只打算在实际行动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在他看来，这样可以在法理上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而不致于落他国以把柄而引发战争，所以他仍旧试图用传统的、与近代世界秩序不能相融的东亚宗藩体系保全朝鲜、保全中国。但是他的此种策略也逐渐地让开国后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朝鲜统治阶层主动地脱离宗藩体系。

### （三）八十年代后半期李鸿章的对朝策略

朝鲜开国后陆续与西方各国订立通商条约，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利益占比愈来愈大，进而其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则愈来愈强。为了抢占利益和势力范围，英、俄两国在甲申政变后在朝鲜开展了进一步的争夺。1884 年底朝鲜与俄国进行了第一次密约，英国得知消息后随即开始其在东亚的军事部署。1885 年 4 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其理由是因为阿富汗危机，英国需要牵制俄国势力南下，所以需要暂时占领巨文岛以遏制俄国。然而，在 1885 年 9 月英、俄双方签署条约，阿富汗危机化解后，英方仍旧不打算从巨文岛撤兵。

为应对英、俄势力给自身带来的影响，日本开始加强军备，转变其图谋东亚的具体策略。俄国也借巨文岛一事扬言要占领朝鲜另一处岛屿（永兴湾）。在清廷释放朝鲜大院君回朝而导致中、朝关系恶化之际，朝鲜与俄国进行了第二次密约。在此期间，李鸿章需要同时应对一系列相互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而不是单独处理某个独立的事件。他在此过程中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平衡各方势力

以保全朝鲜，进而达到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目的。同时，李鸿章紧密关注朝鲜闵氏集团的斥华自主思想并严防朝鲜开化党再生波澜。

### 3.1 巨文岛事件的发生与李鸿章的应对之策

英国一直紧密关注俄国在东亚的行动。俄国通过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将原属中国的海参崴占为己有，但是海参崴一年有四个月的封冻期，所以俄国需要物色一个不冻港以促进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开发和领土占领，而且国际间早就传说俄国对朝鲜永兴湾怀有野心，<sup>293</sup> 1884 年 12 月巴夏礼又风闻俄国有占领朝鲜巨文岛的图谋。<sup>294</sup> 1885 年英、俄在阿富汗出现危机时中、日双方从朝鲜撤兵一事即将成为现实，<sup>295</sup> 英方相信中、日双方谈判后若是决定从朝鲜撤兵，朝鲜将出现军事真空，必然再次发生内乱，俄国便可趁此时控制朝鲜。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将其势力延伸到中国长江流域，俄国若是经过朝鲜海峡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将会极大地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此外，朝鲜拥有许多可以停泊大型船舰的港湾，

---

<sup>293</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59。

<sup>294</sup> 1. 克里记录，1884 年 9 月 11 日，文 27.2712 号；巴夏礼文三二〇，1884 年 12 月 13 日，文 27.2719 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193。）于是英国在 12 月间经常派船到巨文岛观察动静，（同上。）

2. 1884 年朝鲜与俄国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朝俄修好通商续约》，朝俄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俄国的势力也随之进入朝鲜。

<sup>295</sup> 1. 1885 年俄国与已经在 1878 年被迫成为英国保护国的阿富汗开战，阿富汗战败，俄军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至此，英俄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2. 巴夏礼在 1885 年 3 月病逝前，多次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与榎本武扬交谈。巴夏礼一直在向日方确认其是否会从朝鲜撤兵，当他得知日本谈判团在 1885 年 2 月底将启程前往中国以及李鸿章有同意撤兵的意向后，便向日方表示英国将根据朝鲜的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

还有许多未开采的自然资源，俄国若是占领朝鲜不仅会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更有可能影响英国在太平洋全域的通商贸易。<sup>296</sup>而且，朝鲜和俄国在 1884 年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这将有利于俄国与朝鲜之间的贸易。所以，巴夏礼认为俄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威胁远要比中、日在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形成的威胁大，1885 年 4 月 3 日中、日双方在天津展开谈判，于是英国政府在 4 月初下决心占领巨文岛作为海军基地以取得对俄优势。<sup>297</sup>当 1885 年 4 月 10 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达成中日双方从朝鲜撤兵的协议后，英国在 4 月 15 日，<sup>298</sup>也就是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约的前三天占领了巨文岛。

### 3.1.1 李鸿章的对英态度

巨文岛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济州海峡的要冲且靠近对马海峡，大中小三岛环绕而成，内中水深可供停泊巨型船舰。英国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关注过巨文岛，在 1882 年 6 月与朝鲜签订《英朝修好通商条约》期间英方曾向金允植和马建忠表示想在巨文岛开港以及合法租借，但是被拒绝。英国占据此岛既可以扼守俄国南下西太平洋的要道，一旦阿富汗危机引发战争，英国据此可以阻止俄国军队的南下增援且随时可向海参崴发动进攻，又可以阻止俄国的势力向朝鲜和中国

---

<sup>296</sup>（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二九一。

<sup>297</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191。

<sup>298</sup> 对于占领的具体时间，史学界有多种说法，张礼恒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一书中归纳为三种说法，即 1885 年 4 月 7 日、4 月 15 日和 4 月 23 日。（详见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页 203。）

东北扩张，还可以扼守朝鲜与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以形成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从而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英方占领巨文岛后英国外交部密咨曾纪泽，表示英国无意侵占巨文岛，只是防范俄国之举：「英廷本欲先时此事告知中国。缘见别国有占据此岛之意。英廷不得不急于下手。英廷并不欲行有损中国声望之事。是以甚愿与中国相商立约。不致于该段等处或有损于中国之权利也。」<sup>299</sup>4月24日，英国署任驻华公使欧格讷在英国占岛十天后照会了朝鲜政府。从英方照会的顺序和英方愿与中国相商立约的举动来看，英国从事件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立场，即认可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忽视英、朝之间的修好关系。这也意味着如若中国不能帮助藩属国处理好岛屿占领问题的话，朝鲜将会倾向于俄国。当然，英国此举也说明英方认为在这个时候中国对朝鲜的威胁最小，即只将朝鲜作为保卫中国东部的屏障而不贪图朝鲜的土地与利益。中国的对朝策略对英国在东亚的利益获取最为有利，而俄国和日本都是英国防范和牵制的对象。

清政府和李鸿章由于不敢开罪于英国，所以不愿意直接干预此事。李鸿章认为以中国的实力不可能战胜英国，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例如日本、俄国等对中国和朝鲜也是虎视眈眈，再加上英方也表示占领巨文岛是为了对付俄国，所以李鸿章认为不如让英国参与其中以平衡各方势力，从而达到让各国互相牵制的效果。李鸿章让欧格讷放心，暂时的占领不会受到反对，因为如果这两个岛屿落入俄国之手，就再也收不回了。<sup>300</sup>李鸿章在4月12日时还曾致电总署，他认为：「英暂

---

<sup>299</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页1856。

<sup>300</sup> 欧格讷文一八〇，密件，1885年4月21日，文17.980号。（转引自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194。）

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sup>301</sup>但对于「暂时」占领一事，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与李鸿章有着不同的看法。井上馨在接到英方的照会并确认了英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后表示，英国所说的「暂时占据」意味含混，「九十九年也可以说是暂时的，因此使用此文句的目的不得不认为是在掩人耳目」，若英国久据巨文岛，那么俄国必占领朝鲜元山或釜山，再依最惠国条款，其他国家也一定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因此朝鲜将被分割，成为各国竞争场所，日本近海亦将变成争乱纠纷的中心，同时东亚的和平也必无法维持」。<sup>302</sup>

由此看来，李鸿章仅仅将目光停留在以夷制夷的方针上，他认为英国的占岛行为意欲牵制俄国，「实非觊觎朝鲜，亦非窥伺北洋」。他日若俄国和日本欲分占，「我仍可暗啖英以合力谋拒之」，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的效果。<sup>303</sup>他还曾向英国驻天津代理领事璧利南提议中英结盟，<sup>304</sup>之后李鸿章与英方还在天津就此提议进行了谈判。不过与英国立约一事没有实现，欧格讷认为结盟只是李鸿章的想法，清政府为避免落其他国家以口实而「极其谨慎」。<sup>305</sup>李鸿章忽略了若英国长久地占领巨文岛，太平洋地区将产生更大的纷争，这样就会变成制夷不成

---

<sup>301</sup>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1卷：电报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504。

<sup>302</sup>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八，页六〇一至六〇二 文书番号三三五。（转引自（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二九三。）

<sup>303</sup> 李鸿章，〈复总署 论花鸟山电线〉（光绪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卷：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498。

<sup>304</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61。

<sup>305</sup> 欧格讷文三五七，密件，1885年7月18日，文17.983号。（转引自（英）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205。）

反被夷制。此外，李鸿章过于相信英方的口头承诺，要知道即使是书面公文都有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变为废纸，更何况是各国利益角逐下的口头承诺。在 1885 年 7 月日本公使榎本武扬与李鸿章的会谈中，榎本建议中日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英国据岛不还，李鸿章问榎本：要是伦敦方面答应永不利用巨文岛作为对付日本的基地，日本是否能满足，榎本回答：「这样的承诺就像他手中正拿着的葡萄酒杯一样容易破碎」。<sup>306</sup> 榎本武扬向李鸿章提议若俄国侵略朝鲜或者英国不退出巨文岛，中、日两国就采取联合行动时，李鸿章答复若是那样中国将「力予抵抗」，但中国不会为巨文岛而找碴。<sup>307</sup> 试想英国若是将暂时占岛变为永久占岛，以清廷的军备实力「力予抵抗」能否产生效果以及清廷是否有实力帮助朝鲜应对其他相继而来的国家的占领要求是一件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如果抵抗失败，朝鲜将被瓜分，成为东亚列强角逐的利益场。所以，李鸿章对暂时占岛的认可是将朝鲜的存亡作为赌注，已经开国的朝鲜此时对于西方国家的实力已经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朝鲜的统治阶层必然会对朝鲜的前途感到担忧，因此李鸿章此举加剧了朝鲜的斥华心理。

---

<sup>306</sup> 欧格讷文三五九，1885 年 7 月 20 日，文 17.983 号。（转引自同上，页 206。）

<sup>307</sup> 欧格讷文三五—，密件，1885 年 7 月 15 日，文 17.983 号。（转引自同上，页 206。）

### 3.1.2 英国占据巨文岛的图谋

李鸿章打算让朝鲜自行解决巨文岛一事，他认为「朝虽弱小，谅不能无故允许，即允亦当疏报中朝，届时仍可诘责，较为名正言顺。」<sup>308</sup>李鸿章派遣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朝鲜查看巨文岛的形势并指导朝鲜如何应对。但丁汝昌赴朝并未使英国撤兵，这实际上是李鸿章做的表面文章。<sup>309</sup>赴朝查看形势既表明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且不会让日俄有借机占领朝鲜它处的理由，又没有开罪于英国，还可以让英国继续驻扎从而牵制日、俄：「得英船横梗于其间，亦未始非朝鲜之屏蔽」。<sup>310</sup>不过，李鸿章提醒朝鲜国王：英国「借驻兵船定期退出或可酌予通融」，但是如果英国长期占领不还岛并要求租赁或者购买，一定不能轻易允许，且要坚持己见不能被英国给予的大量金钱和花言巧语迷惑。因为「如贵国借债与英必为倭人所诘责俄即不兴问罪之师亦必就近割据别岛贵国将何以难之是揖盗入门而复开罪于近邻」。<sup>311</sup>显然，李鸿章认为日、俄才是朝鲜的最大威胁，他想要利用英国的参与来平衡各方势力以保全朝鲜。

但事实上英国占据巨文岛是为了达到其多重目的，英国是否只是「暂时据岛」取决于其对自身利益的不断权衡，而不取决于英国是否具有信守诺言的美德。英

---

<sup>308</sup>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酉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1卷：电报一）》，页523。

<sup>309</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64。

<sup>310</sup> 李鸿章，〈复总署 论花鸟山电线〉（光绪十一年四月十六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卷：信函五）》，页498。

<sup>311</sup> 附件二：〈李鸿章致朝鲜国王书〉，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八，页十八（三七七），页0158。

国以阿富汗危机防俄为理由占领巨文岛，但是英国此时已经着手经营缅甸，而且日、法关系因为中法战争而日渐亲密，十九世纪在欧洲政治学界颇具名望的史坦恩教授认为「英国因顾虑日本落入法国手中，而欲占领日本海之关门—巨文岛，以于东洋发挥其威势」。<sup>312</sup> 可见英国占领巨文岛的动因远非防俄那么简单，「并不是单纯地以帝俄为其假想敌国」，<sup>313</sup> 法国也是其中之一。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通过中法战争得到进一步扩张，法国在柬埔寨渗透了自己的势力，缅甸国王在 1883 年派遣使团赴法，希望通过与法国缔约通商达到牵制英国的目的。这一切都让英国感到自己在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受到威胁，进而也将影响其在华利益。

314

1885 年 5 月英俄之间的阿富汗危机由英俄之间达成了阿富汗西北边界划分的协议而暂时得到了缓和，但是英国并未还岛。同年 9 月，英、俄双方在伦敦签订《俄阿边界议定书》，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冲突告一段落，但是英国仍旧占领巨文岛。1885 年 11 月英国发动了第三次侵缅战争。半个多月后，英军进入缅甸首都曼德勒灭亡了缅甸贡榜王朝，控制了上缅甸。<sup>315</sup> 清政府虽然深知英国完全侵

---

<sup>312</sup> 伊藤博文 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上卷（昭和十一年），页六九〇～七一二所载 Von Stein 教授之「天津条约」。（转引自（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二九三。）

<sup>313</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二九三。

<sup>314</sup> 英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就不断地探寻从缅甸和越南进入云南的道路。1875 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和为解决此事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英烟台条约》进一步显露出英国想要通过侵占缅甸以进入中国攫取利益的目的。

<sup>315</sup> 英国在 1824 年和 1852 年与缅甸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争，第一次战争英国取得了沿海的阿拉干和丹那沙林，第二次战争英国占领了下缅甸。

占缅甸后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威胁，但是在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清政府选择缔约。<sup>316</sup>

1886年6月，中、英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劻与英国公使欧格讷签订《中英会议缅甸条款》，清廷承认英国对缅甸的主权，所以「缅甸全境亦归英辖」、「英人之在亚洲又多缅甸北方一半之国矣」。<sup>317</sup> 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后，云南和英属印度之间失去了缓冲地带，英国将其势力逐渐渗透进中国西南，<sup>318</sup>这使得云南的传统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综上，英国为与法国争夺中南半岛以及中国西南的利益而逐渐占领了缅甸全境，最后将其变为英国的殖民地。那么，英国也同样有可能为与俄国、法国争夺太平洋区域的利益而长久地占据巨文岛甚至侵略整个朝鲜半岛。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就认为英国借口占岛牵制俄国，其所谓的「应防不测」和「暂时占领」这类言论不得不认为其有对「东亚全体」及「九十九个年」的野心。<sup>319</sup>

---

<sup>316</sup> 英使來议印度、西藏通商。谕丁宝楨、色楞額等开导藏番毋生事。（引自《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二十三，本纪二十三，德宗 载湉 一，光绪十一年，页 885。）

<sup>317</sup> 《泰西新史揽要》24 卷 卷十二英国 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广学会刻本，页 165。

<sup>318</sup> 以英人灭缅甸，严四川边备。（引自《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二十三，本纪二十三，德宗 载湉 一，光绪十一年，页 885。）

<sup>319</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二九四。

## 3.2 化解俄国威胁的朝鲜策略

### 3.2.1 日本的朝鲜策略

1885年5月20日朝鲜统属要求英国迅速从巨文岛撤兵，致电欧格讷，致书英国副领事贾礼士，指出英国的占岛行为违背了万国公法，同一天还致书中国驻朝鲜商务总办陈树棠和各国驻朝公使，通报了欧格讷4月24日照会朝鲜的内容，请各国公议。<sup>320</sup> 对于朝鲜的抗议，庆王奕劻向欧格讷保证，这个抗议只是一种形式，其目的在抚慰俄国。<sup>321</sup> 可见，清政府此时并不打算帮助朝鲜与英国对抗收回巨文岛。欧格讷甚至认为中国政府准备抵抗俄国对中国本土的任何侵略行动，但是否要为属国的利益这样做，却使它踌躇不决。<sup>322</sup>

在接到朝鲜的通报后，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铎回信称对于英国的占岛行为，「断无可准之理」。他建议朝鲜告知各国朝鲜反对英国的占岛行为，而不致于让各国误解朝鲜同意英国的占岛行为。<sup>323</sup> 1885年5月下旬，近藤真铎向日本外相井上馨密报朝俄密约。5月阿富汗危机暂缓后并未还岛的英国继续安抚朝鲜，表示占领只是暂时之举而不提及何时归还。于是俄国敦促中国对英交涉令其还岛，俄国驻华公使表示：「若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占领巨文岛，则俄国认为有占领其他

---

<sup>320</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65。

<sup>321</sup> 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206。

<sup>322</sup> 欧格讷文三六〇，1885年7月22日，文17.983号。（转引自同上，页207。）

<sup>323</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1841。

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sup>324</sup>1885年6月俄国甚至扬言要占领离巨文岛不远的对马岛时，日本朝野十分紧张，此事促使日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sup>325</sup>

当时日本的军备实力不足以对抗俄国，所以日本政府决定暂时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让中国出面解决问题。1885年6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在日本外务省与井上馨会面，井上馨向徐承祖出示了近藤真锄给其的两份密报。<sup>326</sup>在会谈中井上馨承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劝中方加强对属国内政的控制：「中国向于属国之用人行政不大与闻。我早知之。惟此时事势不同。宜稍为变通为是。缘朝鲜弄坏。于我两国均有所损。」<sup>327</sup>井上提议由李鸿章选择一美国人代替朝鲜政府外务兼总税务司穆麟德，此外另派一员代替陈树棠从而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对于朝鲜的「用人及大政。均嘱其请命中朝。方准黜陟更改」。<sup>328</sup>1885年7月井上馨命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到天津与李鸿章商议，期间榎本给李鸿章递交了井上馨提出的《朝鲜政治改革案》（又名《朝鲜外务办法八条》），紧接着商谈了巨文岛事件的交涉、朝俄密约、中朝宗藩关系及日本的态度，最后谈到了释放大院君回朝鲜。<sup>329</sup>对于《朝鲜外务办法八条》，李鸿章答复榎本武扬，认为「井上

---

<sup>324</sup>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页294。

<sup>325</sup> 日本根据形势判断，英国占据巨文岛，俄国也一定会占据一处「负隅相抗」。日本则立刻采取了军事行动，在「在朝日之间。孤悬海中。离釜山甚近。与巨文岛亦不远」的对马岛「兴筑礮台。停泊师船。征兵设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1919。）

<sup>326</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71。

<sup>327</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1846。

<sup>328</sup> 同上，页1846-1847。

<sup>329</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73。

馨持论甚正」，李鸿章在给总署写信时也认同井上馨的多个提议「尚中肯綮」，「顾其立意，似欲护持朝鲜勿被俄人吞并，洵与中、日两国大局有裨」，<sup>330</sup>虽然之后李鸿章意识到井上馨的朝鲜办法别有用心，紧接着井上馨在 8 月 15 日撤销了他提出的朝鲜办法八条，<sup>331</sup>但是，井上馨的很多提议李鸿章之后都付诸实践。

日本希望中国出面遏制俄国的势力扩张，从而避免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方劝中国释放大院君回朝鲜，这样既可以让向来不和的大院君与闵妃矛盾升级，又可以阻止闵氏集团的亲俄行动。此外，大院君的释回还会造成闵氏集团对清廷的不满，从而实现从朝鲜内部离间中朝宗藩关系的目的，加速朝鲜内部脱离清廷控制的步伐。日本对于暂时承认中朝宗藩关系有一定的把握，日本政府虽然知晓中国正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但日方认为清政府因体制问题做事反复拖沓、安于现状，即使强军，中国几年后也不会对日本产生威胁，日本之后仍旧可以控制朝鲜。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均表示不用对此担心，井上馨甚至说：「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烦多论」。<sup>332</sup>

---

<sup>330</sup> 李鸿章，〈复总署 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页 504。

<sup>331</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74。

<sup>332</sup> 附件二：〈日人朝比奈密探各事清册〉，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页三（四五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 0185。

### 3.2.2 李鸿章应对俄国威胁之策

甲申政变前李鸿章已经有了释放大院君回朝鲜的策略，甲申政变后他更认为大院君回朝有利于压制朝鲜开化派和闵氏集团的势力。<sup>333</sup>当闵氏集团听说清廷有释放大院君回朝的打算后，投俄倾向愈发明显。<sup>334</sup>王午兵变后，朝鲜国王李熙多次派遣使节赴保定慰问大院君。但是国王性格软弱，掌握实权的闵妃对大院君可谓是深恶痛绝。<sup>335</sup>王午兵变平息后盛传中国将释回大院君并派遣监国驻朝，闵氏集团非常恐慌。他们当时误认为李鸿章反对释放大院君，因此想要依靠李鸿章，但是当时李鸿章因为外交问题屡受弹劾，闵氏遂决定另谋出路，闵氏求助于日本，但遭到拒绝。<sup>336</sup>

1884年甲申易枢后醇亲王当政，清廷并未释放大院君，期间大院君派遣李益瑞向清廷请求恩赦，但被拒绝。1884年底亲日开化党在甲申政变过程中拟「革新令」，其中第一条就提到「大院君不日陪还事」，<sup>337</sup>开化党企图利用大院君来压制闵氏集团的势力。政变后日本民间对中国开战的舆论高涨，朝方许多官员认为一旦开战，根据宗藩关系朝鲜不得不加入清政府的行列，但是这样做的话将即刻受到日军的进攻而无法避免战争的惨祸。因此王妃、戚臣、内官及穆麟德之间早

---

<sup>333</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一一六～一一七。

<sup>334</sup> 同上，页一一七。

<sup>335</sup> 闵妃对大院君深恶痛绝，光绪初年和王午年闵妃的义兄和弟弟被杀害，两案都是大院君幕后唆使，而且闵妃在王午兵变中也险被杀害。（引自同上，页一一五。）

<sup>336</sup> 同上，页一一六。

<sup>337</sup> 同上，页一一六。

就对这个问题加以细密的议论。<sup>338</sup> 朝鲜官员分析中法战争使得中国无法分出兵力，可以趁此时机「引强援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朝鲜国王对想法似乎已经「深信不移」。<sup>339</sup>至此，朝鲜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都指向了朝鲜亟需寻找靠山。英国在巨文岛事件中已经表明站在中国一方而忽视英、朝关系，朝鲜成功求助英国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暗中支持朝鲜开化党且时常觊觎朝鲜土地，日本自然也不会是朝鲜的首选。至于俄国，从李鸿章与李裕元在七十年代的私下书信往来中即提及俄国对于朝鲜的威胁，之后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中亦强调了俄国的野心以及防范俄国的必要性。朝鲜与西方国家通商后，也从美、英、德等国对于俄国的态度中了解到俄国的侵略野心。<sup>340</sup> 但是，在1884年《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俄使韦贝的为人和言行举止机敏而恭顺，让朝方直观地感到俄国没有那么可怕。<sup>341</sup> 此外，穆麟德在此时怂恿朝鲜国王向俄国寻求保护，国王采纳其建议，让穆麟德试探俄国的意向并且避开了政府和外务衙门，派亲军四人赴俄请求俄国的保护，1884年12月俄国和朝鲜开展第一次密约。<sup>342</sup>

综上所述，大院君回朝前朝鲜与俄国第一次密谋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认为清政府不能完全保朝鲜周全遂自谋出路，随着巨文岛迟迟未还以及中方希望朝鲜主

---

<sup>338</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〇一。

<sup>339</sup> 〈密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收入骆宝善、刘路生 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页32-33。

<sup>340</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二九〇。

<sup>341</sup> 同上，页二九〇~二九一。

<sup>342</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53-154。

动与英国交涉的态度让朝鲜进一步地意识到清廷已经没有绝对的力量保全朝鲜，李鸿章「且闻朝鲜君臣趋向不定，时时探询越事，似观望以为向背者。」<sup>343</sup>大院君在 1885 年初又派遣李益瑞恳请清廷将其释回，但仍被拒绝。几个月后再度请求，清廷仍旧没有应允。清廷担心大院君回朝后会和闵氏集团相互倾轧，而且国王李熙性格软弱无法压制，那么壬午兵变将会重演。<sup>344</sup> 而且，此时日本仍旧在朝鲜有军队，清廷担心大院君回朝会引起日方的行动。不过，甲申政变后李鸿章就重新考虑了释放大院君回朝一事。甲申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884 年 12 月 5 日)，袁世凯认为中国应该释放大院君回朝以稳定朝鲜亲日派造成的乱局，他致函时任旅顺营务处道员的三叔袁保龄，袁保龄赞同其想法，并将「以父临子」的建议转达给李鸿章。于是李鸿章致函负责李昞应生活起居和安保工作的候补道员沈能虎，让其告知李昞应甲申政变的经过并提出了四个问题，李昞应回答到朝鲜的乱局是由闵氏集团的腐败统治造成的，还表示会坚定地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并抵抗日本对朝鲜的染指。李鸿章认为甲申政变「一切皆日人主持，朝臣皆日党用事，恐有挟王叛华之意」，<sup>345</sup> 大院君的释回可以打压亲日派和闵氏集团对朝鲜国王的控制。李鸿章遂于 1884 年 12 月中旬向总理衙门提议释放大院君回朝，但清廷最终没有同意。

---

<sup>343</sup> 李鸿章，〈复吴筱轩军门〉（光绪九年九月初三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页 278。

<sup>344</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九一一七。

<sup>345</sup>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午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21 卷：电报一）》，页 364。

到了 1885 年 5 月初俄朝密约一事彻底暴露，朝鲜国王对此矢口否认表示不知情。<sup>346</sup>此时，李鸿章打算调整对朝政策，进行更为有力的干预。7 月份井上馨的八条建议更是起到了怂恿李鸿章实施对朝强硬干涉政策的作用。考虑到俄国对朝鲜的威胁，清政府不再犹豫，令李鸿章酌情办理。闵氏集团为了阻止大院君回朝鲜，派遣闵泳翊赴天津向李鸿章陈情，李鸿章本打算劝说闵泳翊在大院君回朝后王妃和戚臣不要再与其反目进行斗争。但是闵泳翊强烈反对大院君回朝，最后不告而别去了香港，此举表明了大院君与王妃为中心的戚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的希望。<sup>347</sup>金明奎还向李鸿章提出折衷的办法：延后数年再释放，或流放到边疆地方，但是被拒绝。<sup>348</sup>李鸿章于 7 月邀大院君晤谈，大院君表示回朝鲜后将不闻国政，且要阻止闵妃干政等。李鸿章设法让朝鲜国王派遣专使「疏慰」，但是朝鲜派遣陈奏使的时间以各种借口一再延宕，<sup>349</sup>亦可见朝鲜政府对于大院君回朝的态度。1885 年 9 月 21 日清廷正式同意大院君回朝，这让戚族官员们感到非常恐慌和愤怒，大院君回朝当天负责迎接的朝鲜官员因畏惧闵氏集团的势力而不敢迎接，

---

<sup>346</sup>1. 穆麟德与徐相雨访问日本时，个人非正式地常与驻日俄国公使接触，就练军教官问题进行了多次密谈。（（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〇六。）

2. 密约的推进，实因王妃、少数的戚臣及内官之包围，此事在理论上，朝鲜高宗的责任及失策应占其多数。（转引自同上，页三〇四。）

<sup>347</sup> 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下册，页廿七～廿八。（转引自（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一〇～三一—。）

<sup>348</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一一八。

<sup>349</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一一七～一一八。

闵氏集团还对与大院君及壬午兵变相关的官员进行迫害，共铲除大院君的左右共三十余人。同时，大院君回朝后也被控制起居，相当于被软禁。

在大院君抵返汉城的第二天（1885年10月6日），俄国使节韦贝抵达汉城与朝鲜交换朝俄通商条约。在韦贝提交给朝鲜的俄国照会中有「嗣后韦公使当与贵国政府相商边界事宜并另有事务此数层应立新约画押」一语，<sup>350</sup>其中「另有事务」便暗示了朝俄未来将展开进一步的联系。九月初八日朝鲜国王在与韦贝的谈话中表示：「立约以后彼此不相疑诸事商于贵国政府一切仰仗事甚多」。<sup>351</sup>国王还询问了俄国军舰何时可来，是否可以常驻仁川，韦贝表示等他与俄国政府商定后即可办到。<sup>352</sup>自此以后，闵氏集团开始进一步谋求朝鲜自主，朝鲜内部的离心力不断加强，中朝宗藩关系不断地恶化。

俄朝第一次密约的暴露，朝鲜对于释回大院君的阻挠使清廷的一部分官员对朝鲜持强硬态度。1885年11月任职国子监祭酒的皇亲盛昱认为李鸿章软弱的外交态度使俄朝密约和巨文岛事件相继发生，且认为朝鲜国王昏庸，想要获得独立自主，被闵氏挟制而求助于日、俄。盛昱建议应该选择忠正明达且有威望的大臣督师赴朝「镇抚其国明降谕旨废斥闵党以释其国人之怨以布中国之威德」。<sup>353</sup>但

---

<sup>350</sup> 附件六：〈俄罗斯换约文件〉，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一～十二（四〇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0176。

<sup>351</sup> 附件六：〈俄罗斯换约文件〉，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二（四〇九），页0176。

<sup>352</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83。

<sup>353</sup> 〈国子监祭酒盛昱奏朝鲜事不堪再误谨陈措置管见摺（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八（四一七），页0179。

是李鸿章并未打算用武力解决朝鲜的斥华自主行为，而是默认袁世凯在朝鲜的干预政策，并且让袁不断地向其汇报朝鲜的情况以观其变。

朝鲜统治者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只想在大国的庇护下过安宁日子而没有趁着各国均势的时机以图自强。这个大国在以前是中国，但是甲申政变后，国内的各种思想开始涌动，朝鲜对于大国的选择也就不仅仅是中国。但是朝鲜统治阶层对中国的事大态度依然存在，一方面因为朝鲜已经习惯于宗藩体制且中国对于朝鲜没有经济利益和领土的要求，只是打算让朝鲜一直作中国东方的藩屏。另一方面因为中方在甲申政变中保住了朝鲜统治者的王位，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利益。但是随着李鸿章策划大院君回朝一事的展开，被闵氏集团把持的朝鲜政府的事大心理不断消减。回朝之事成为现实之时，即是朝鲜内部欲脱离宗藩关系的新一阶段。中国释放大院君的行为给闵氏集团传递的信号是：清廷对于闵氏集团的势力将进行限制，并且随时会撤回对闵氏政权的支持而转向与其对立的大院君。那样的话闵氏集团的势力必然遭受沉重打击，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都将遭受巨大损失，因此闵氏集团需要寻找另一个大国保全其利益。事实上，「事大」与实践操作中以自我为主、利益至上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在宗藩原则下，藩国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也收获实利。<sup>354</sup> 当朝鲜统治者认为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且这种损失的制造者为中国时，朝鲜统治者则开始寻找新的大国作为依靠。

此外，朝鲜统治者是短视的，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他们没有想过一旦让扩张欲极强的俄国染指朝鲜，朝鲜有可能不复存在，而是短视地认为

---

<sup>354</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页 43。

只要给予俄国些许好处，即俄朝密约时穆麟德曾允诺将朝鲜永兴湾让与俄国，便可以得到大国庇护，过上安宁日子。朝鲜统治者没打算通过自己将朝鲜变得强大和独立，其认为朝鲜可以在强大政权的保护下维持稳定和独立，<sup>355</sup>而这个强大政权之前是中国，在俄朝密约事件中变成了俄国。李鸿章同时处理多项外交事务，他应该考虑到了巨文岛一事的影响才更加坚定地释大院君回朝以平衡闵氏集团的势力。1885年5月阿富汗危机暂时得到了缓和，但是英方以穆麟德仍旧在任为由没有从巨文岛撤兵，于是俄国除了恐吓清政府表示要占领朝鲜他处领土外，还利用朝鲜国内的反英情绪促使朝鲜亲俄。大院君回朝若是可以压制朝鲜朝廷的亲俄倾向，对于清廷来说确是有利的。在释放大院君之前，李鸿章曾与其晤谈，大院君表示支持联美，这恰巧可以应和李鸿章常用的以夷制夷之策，即大院君的亲美态度可以与闵氏集团的亲俄态度相互制衡。

### 3.3 李鸿章强化对朝干预之策

决定释放大院君回朝后，李鸿章加强了对朝鲜内政外交的控制。为防止朝鲜私下继续与俄国联系以及井上馨的建议的促进作用，李鸿章决定换掉能力不足的陈树棠。陈树棠的「总办朝鲜商务委员」职衔在1884年10月就已经变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交涉」二字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清廷希望陈树棠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朝鲜内政外交事务中，但是陈树棠在处理俄朝密约一事时的迟钝

---

<sup>355</sup> Yur-Bok Lee, "A Korean 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10," in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34.

反应让清廷错过了迅速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sup>356</sup>给忙于中法谈判和处理巨文岛问题的清廷雪上加霜，也让英国有更充足的理由占领巨文岛迟迟不还。面对天津谈判、巨文岛事件和朝俄密约一系列复杂的外交难题陈树棠在处理时也自感力不从心，<sup>357</sup>所以李鸿章决定替换驻朝大员。

当朝鲜国王将朝俄密约的全部责任推到穆麟德一人身上后，清廷要求朝鲜将穆麟德解聘，朝鲜为取得清廷的谅解，国王李熙派遣吏曹参判南廷哲和从事官朴齐纯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密议。<sup>358</sup>李鸿章收到南廷哲交予其的朝鲜国王亲函后，于 1885 年 7 月给朝鲜国王回信要求其罢免穆麟德，启用美国人继任并要求朝鲜国王重用金宏集、金允植和鱼允中等官员。<sup>359</sup>朝鲜国王于 7 月 27 日罢免穆麟德外务协办一职，8 月 25 日罢免其海关总税务司一职。<sup>360</sup>李鸿章将穆麟德原先的职位一分为二以避免洋人权力过大，由中国海关总署的美籍副税务司墨贤里任总税务司，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德尼为外交顾问，此二人皆为美国人，李鸿章此举是为了疏远朝、俄关系。墨贤里虽赴朝鲜但仍听命于中国，为中国海关官员，

---

<sup>356</sup> 清廷不久就听说了朝俄密约一事，陈树棠致函朝鲜国王询问此事，但是被国王派遣赴俄的官员金镛元等不承认密约一事，穆麟德仍旧借赴日的机会与俄国驻日本接洽。直到 1885 年 2 月 14 日，朝俄双方在东京秘密签订《朝俄密约》一事不胫而走，清政府要求陈树棠彻查。

<sup>357</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一二四。

<sup>358</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〇六~三〇七。

<sup>359</sup> 附件二：〈李鸿章与朝鲜往复函件〉，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八，页二十九（三九〇），页 0164。

<sup>360</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76。

他的职位不同于穆麟德的职位，不是由朝鲜政府委任。此外，墨贤里赴朝的任务是实现「朝中海关的联合」。<sup>361</sup>

朝鲜民生凋敝，时常发生农民暴动，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朝鲜国王担忧朝鲜军事真空后国内发生内乱而惶恐不安。光绪十一年八月中旬（1885年9月26日），朝鲜国王在咨文中表示朝鲜自中国撤兵以后，情况危急，鉴于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约束，中国不便再派兵驻扎朝鲜。朝鲜国王认为袁世凯驻扎朝鲜三年，熟悉朝鲜的国俗和时务，深受官员和百姓的信赖，甲申政变时又以身试险，救援国王于危难之中。所以，请清廷派遣袁世凯赴朝鲜谋划商议重大事情。李鸿章随后致函朝鲜国王同意其请求。不过，李鸿章认为朝鲜国王「外虽感德，内则趋向不专，阴有择强自庇之意。」当时的情况是「倭兵甫撤，俄使旋来」，亟需像袁世凯这样「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之人。<sup>362</sup>李鸿章决定趁着朝鲜国王主动邀请袁世凯之机，派遣袁世凯赴朝。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正式被任命赴朝鲜任「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一职，李鸿章随之便致函朝鲜国王，其中强调：「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sup>363</sup>李鸿章希望袁世凯不仅管理朝鲜的商务还可以干预朝鲜外交：「交涉」两字，端在「优其事权……

---

<sup>361</sup> 同上，页 177。

<sup>362</sup> 附件一：〈李鸿章奏袁世凯出使朝鲜请隆其位望藉资坐镇片〉，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三（四一〇），页 0177。

<sup>363</sup> 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页 569。

略示与闻外交之意。」<sup>364</sup> 袁世凯自上任以来一直积极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以监视、威压引俄拒清之闵妃及戚族，从而牵制朝鲜和俄国的接近。<sup>365</sup>

与此同时，巨文岛一事并未得到解决。1885年9月英、俄之间关于阿富汗划界的条约并没有促使英国还岛。俄国催促中国政府尽快与英方交涉还岛，若是中方承认英方的占岛行为，那么俄国也要占领一地。在中、朝两国的反对和俄国的催促下，英国政府企图通过租借巨文岛来达到长期合法占有的目的，并且强要与朝鲜政府直接谈判，或交涉以五千英镑收买巨文岛，但朝鲜政府没有即时答复。<sup>366</sup> 由此，李鸿章加紧了对还岛一事的交涉。1885年10月11日，朝鲜国王向袁世凯表示「巨文岛虽是英人遮俄之路云本是敝邦地方则不可因循抛置」。<sup>367</sup> 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清廷应该加紧要求英国还岛，不可以显露出任何同意其租借巨文岛的意思，如果双方坚持不下，中方再通过调停同意租借巨文岛，这样可以得到一个高价。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建议表示赞同，也认为应该先要求英国还岛，实在不行的话再讨论租借事宜。李鸿章与欧格讷会晤时首先要求英国从巨文岛撤兵，但是欧格讷并没有给予让李满意的答复。李鸿章表示如果朝鲜同意英国的租金，那么很快俄国将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李鸿章建议英国留一艘军舰在仁川，在有必要

---

<sup>364</sup> 〈李鸿章奏派同知袁世凯接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宜摺（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三（四一〇），页 0177。

袁世凯职衔的英文名称是「Director-General Resident in Korea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sup>365</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一六。

<sup>366</sup> 同上，页二九七。

<sup>367</sup>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四〇九）附件五：〈袁世凯摘奸论〉。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 0175。

时重新占领。<sup>368</sup>11 月份朝鲜再次向英国提出抗议，而李鸿章建议英国借给财政拮据的朝鲜政府一百万两，将巨文岛作为抵押。<sup>369</sup> 但是，袁世凯却在任职后向朝鲜国王表示「巨文岛自不可尺寸予人」。<sup>370</sup>

1885 年底，总理衙门再一次向英方提到巨文岛，欧格讷反问，如果英国离开巨文岛，中国是否保证没有旁人会加以占领。中国方面迟疑不决，表示巨文岛为朝鲜领土，不由中国保证。<sup>371</sup>所以，巨文岛问题在 1885 年终究没有解决。中方对于巨文岛一事的解决态度加剧了朝鲜的离心力，朝鲜得知中方能力有限，甚至认为清廷无意于尽全力帮助朝鲜收回巨文岛，因此朝鲜斥华自主的心理愈发强烈。由于朝鲜能力有限，如若斥华自主，必然需要外援，那么朝鲜只能继续与俄国保持联系。

### 3.4 李鸿章与袁世凯应对俄朝二次密约之策

闵氏戚族中除了闵泳翊认为引俄拒清对朝鲜不利表示反对，其余皆主张由俄国保护朝鲜，排斥中国。戚族官员鼓动国王说引俄保护后，其他国家将不敢欺侮

---

<sup>368</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208。

欧格讷文四五七，1885 年 11 月 17 日，文 17.986 号。（转引自同上，页 208。）

<sup>369</sup> 欧格讷文四五七，1885 年 11 月 17 日，文 17.986 号。（转引自同上，页 208。）

<sup>370</sup> 附件五：〈袁世凯摘奸论〉，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四〇九），页 0175。

<sup>371</sup> 欧格讷文四七九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209。）

朝鲜，国家自主后国王可以自称皇帝，不再受制于人。被免职后在朝鲜戚族庇护下仍担任典圜局协办的穆麟德也趁机撺掇国王求助于俄，这样就可以压制大院君的势力。<sup>372</sup>朝鲜国王本就缺乏主见，在如此具有诱惑力的条件下，很难不同意引俄斥华的方案。1885 年底，金玉均与日本民间旧自由党系之不平政客暗结计划从江华岛登入进犯汉城的传闻四起，闵氏集团对此十分惊恐，认为一旦事态恶化，清政府是靠不住的，那么就只能依附俄国。<sup>373</sup>流言出自朝鲜左营大将闵应植，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山五郎认为闵应植作为当时朝鲜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宰臣，大院君的归国让他的疑惧心日甚一日，<sup>374</sup>所以他让情报流出以顺势引俄拒清。

袁世凯对于传闻给社会造成的恐慌十分愤怒，他先是在 10 月 8 日与金允植见面，让其坚定信心，不要惧怕俄国的恐吓欺诈，俄国正与英国有衅，断无引兵东向之理。<sup>375</sup>之后，于 10 月 10 日作《摘奸论》提交给朝鲜统署及外交团。其中痛斥俄国欲借保护朝鲜之名而企图吞并朝鲜之实并表示中国具备保护朝鲜的实力，还斥责关于金玉均的传闻「煽惑人心，激变生事」。<sup>376</sup>此文发表后的次日，朝鲜国王即请见袁世凯笔谈，袁世凯再三开导朝鲜国王，不能被俄国欺骗。袁世凯与朝鲜国王当晚便商定，如果俄国使节挟令保护，即再由中国派兵入韩。<sup>377</sup>不

---

<sup>372</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83。

<sup>373</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一九。

<sup>374</sup> 同上，页三一九。

<sup>375</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84。

<sup>376</sup> 附件五：〈袁世凯摘奸论〉，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十，（四〇九），页 0175。

<sup>377</sup>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页 162。

过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朝鲜的情况时表示朝鲜只是表面上顺从中国，而实际上自有打算，「汉城内外日落道阻恐中国查知其隐而粉饰弥缝疑忌百出又欲尽除廷臣及华党……孤行己意毫无忌惮天语不遵宪诰不懍凯反复劝导亦面从心违极不愿中国干涉其事」，<sup>378</sup>朝鲜国王「貌似感激。心实猜疑。此等昏庸。断难与之为善」。<sup>379</sup>通过此次晋见朝鲜国王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当晚便革除了穆麟德典圜局的职务，之后袁世凯不断给穆麟德施压，穆麟德遂于 1885 年底离开朝鲜，回到中国海关任职。

穆麟德的离开并没有使朝鲜停止引俄斥华的行动，袁世凯的积极干涉反而加速了闵氏集团的联俄行动。穆麟德离开朝鲜后，朝鲜官员在闵妃和戚臣的授意下与俄国公使韦贝往来，其中有竹山府使赵存斗，内务部主事金嘉镇、金鹤羽、金良默及俄语通译蔡贤植等。<sup>380</sup>他们请求俄国保护朝鲜并帮助朝鲜摆脱清廷的干预，如若中国不同意，请俄国派军舰赴朝保护。韦贝「表示愿意」集中俄国军舰于仁川，以「保护」朝鲜国王，朝鲜国王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sup>381</sup>欧格纳认为朝鲜国王的反应说明中国故意伤害朝鲜国王的感情。<sup>382</sup>由于韦贝要求朝鲜方面作书面说

---

<sup>378</sup> 〈北洋大臣来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到 电报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二十五，（四四七），页 0183。

<sup>379</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 2099。

<sup>380</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二一。

<sup>381</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208。

朝鲜文二五，密件，1885 年 11 月 8 日，文 17.985 号。（转引自同上，页 208。）

<sup>382</sup> 朝鲜文二五，密件，1885 年 11 月 8 日，文 17.985 号。（转引自同上，页 208。）

明，戚臣们在总理大臣沈舜泽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总理内务府的名义作成书面说明并钤国王印信及沈舜泽的印章送给俄方。至此，第二次俄朝密约开始。

到了 1886 年朝鲜的亲俄行动逐渐公开化，韦贝的夫人时常出入朝鲜宫廷且与闵妃有密切的往来。到了春夏之交，朝鲜国王还让因赴海参崴与俄国订约而被发配的申郁先、金光训与韦贝联络。<sup>383</sup> 朝鲜「谬欲自主。时派小人唆使各国讪谤中国」，袁世凯借朝鲜国王的近臣「痛言时弊。劝其依中国。收人心。简贤良。节财用」，但是朝鲜国王「貌似感激。心实猜疑」。<sup>384</sup> 袁世凯在朝鲜积极扶持金允植、鱼允中等事大党官员，而闵氏集团则「欲尽除廷臣及华党」，<sup>385</sup>1886 年金允植在向闵泳翊表示应让大院君监视国政后便被流配。<sup>386</sup> 闵泳翊虽然是戚族中唯一反对引俄的官员，但是闵泳翊也断不会推翻闵氏戚族的专政。闵氏集团为了除掉事大党，在此期间也将鱼允中免职。对于金、鱼二人的免职，李鸿章在 1886 年 5 月指示袁世凯对此二人「须极力保护，留此忠良以持大局。」<sup>387</sup> 袁世凯因此向朝鲜国王施压，并在给李鸿章的电稿中表示朝鲜「斥华、自主之议决」，「恐将

---

<sup>383</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84。

<sup>384</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 2099。

<sup>385</sup> 〈北洋大臣来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到 电报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页二十五，（四四七），页 0183。

<sup>386</sup> 金允植的自述：「……宫中势力，非宗戚莫可挽回，宜辅云岷（指大院君——笔者注），监视国政，更有慰廷劝助，庶有持危扶颠之道，芸楣（闵泳翊）色变，唯唯而罢，数日后，余被流配之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编，金允植 著，《续阴晴史》下卷（韩国史料丛书十一），页五八二。（转引自（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二九。）

<sup>387</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 2114。

难制」，建议「乞早筹之」。<sup>388</sup>而此时李鸿章仍打算维持现状，他认为朝鲜想除去金允植可能是因为袁世凯和金允植走得太近，朝鲜希望通过将金允植革职而达到抑制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目的。此外，李鸿章认为朝鲜虽有自主之意，但是「究无实在形迹，未可轻于一发」，认为袁世凯应该慎重处理。<sup>389</sup>朝鲜最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恢复了金允植的外务督办的职务，但是朝鲜朝廷中对于清廷的干预政策表示极其不满。

1886年6月底，闵泳翊向袁世凯密告朝鲜时常派人到韦贝那里寻求俄国的保护，同时也为巨文岛一事求俄国派船帮助朝鲜防英。<sup>390</sup>袁世凯将此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令德尼调查此事，德尼表示袁世凯的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而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英国人为对抗俄国而散布的谣言。<sup>391</sup>不过，袁世凯认为自从朝鲜将金允植革职，便意味着朝鲜「引俄议遂决」。<sup>392</sup>袁世凯从闵泳翊处得知，国王打算斥华自主，将向俄国请求派兵保护，韦贝对于朝鲜的请求表示需要考虑。<sup>393</sup>因此，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废除朝鲜国王另立新主：「韩易新君，或可息事……」

---

<sup>388</sup> 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未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61。

<sup>389</sup> 李鸿章，〈寄朝鲜袁道〉（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七日申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62。

<sup>390</sup> 袁世凯，〈附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亥刻到），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72。

<sup>391</sup>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8。

<sup>392</sup> 袁世凯，〈附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巳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77。

<sup>393</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86。

如明降谕旨，再由宪授谕李昱应相助，三五日可定，尚不难办。」<sup>394</sup>不过，李鸿章不打算立即废国王，而是派船舰赴朝鲜以防止不测。闵泳翊在6月底说韦贝要求朝鲜出具书面文书，他分析朝鲜「将有保护文凭予俄」。<sup>395</sup>7月中旬，袁世凯从闵泳翊处得到了密函的抄本，其中写道：朝鲜「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深望贵大臣稟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据闵泳翊说「年月上有韩国宝」，沈舜泽名字上有图章。<sup>396</sup>

袁世凯将情况汇报给李鸿章，他认为「如华出其不意，先发速办，则事易了结。」<sup>397</sup>不过，李鸿章没有立即派兵，也没有立即废国王，而是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让其调查具体情况并与俄国政府交涉，如果朝鲜的求助文书送达俄国，请拒绝接受朝鲜的请求。同时，李鸿章也写信给醇亲王奕譞请求代为上奏其中要旨，信中提到「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sup>398</sup>但若中国立刻派兵赴朝将落其他国家以口实，所以应先派遣朝鲜电报管理陈允颐以查看电线的名义赴朝鲜与袁世凯和大院君筹划。李鸿章认为如果李昱应有诛除乱党的能力，「即属其一

---

<sup>394</sup> 袁世凯，〈附 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巳刻），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77。

<sup>395</sup> 袁世凯，〈附 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亥刻到），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73。

<sup>396</sup> 袁世凯，〈附 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酉刻到），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81。

<sup>397</sup> 袁世凯，〈附 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酉刻到），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82。

<sup>398</sup> 李鸿章，〈致醇邸筹朝鲜私叛〉（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卷：信函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57。

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之后再派兵震慑，彼时再根据情况决定废立国王之事。<sup>399</sup>清廷方面也认为：目前朝鲜情势未定，应该做好防俄的军事准备，等陈允颐和刘瑞芬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再进行下一步行动。<sup>400</sup>李鸿章随即进行军事部署，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出动海军赴朝，同时也准备运送陆军至朝鲜。

袁世凯得知李鸿章和清廷的态度后，在自己的宅邸宴请朝鲜官员时，拿出一伪造电报，称中国已经出兵朝鲜，不久将会到达。<sup>401</sup>朝鲜官员当晚便报告国王，国王大为惊恐，命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署诸臣接踵向袁世凯表明国王和政府对此事不知情，一定是小人捏造。<sup>402</sup>之后，沈舜泽和外署督办徐相雨再次向袁世凯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袁世凯坚持要求朝鲜与俄国公使馆交涉以追回发给俄国的密函，袁世凯逼迫朝鲜多次向俄方索要密函，俄使表示「事出虚妄，盘核无所」。<sup>403</sup>袁世凯不断向朝鲜国王施压，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金养默这些朝鲜亲俄官员被革职发配。韦贝不理睬朝鲜的交涉，他自始至终否认这种事实，他还在照会中表示朝鲜官员的发配是受到他国的干涉。<sup>404</sup>袁世凯同时还听说了朝鲜请求俄国速派军舰援助并且朝鲜国王将送密函的蔡贤植

---

<sup>399</sup> 同上，页 57。

<sup>400</sup>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懿旨（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电寄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页六，（四六六），页 0186。

<sup>401</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87。

<sup>402</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88。

<sup>403</sup> 〈附 朝鲜照会〉（光绪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4 卷：信函六）》，页 60。

<sup>404</sup> （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二五～三二六。

暗中杀害的传闻，再次致电李鸿章，强调废朝鲜国王的必要，袁认为「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解津候讯。」<sup>405</sup>

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态度始终较袁世凯更为谨慎。关于闵泳翊向袁世凯密告朝王向俄国寻求保护一事，朝鲜官员都说是小人伪作，朝政府沈舜泽、外署徐相雨等为此事递交印文辩诬。驻俄大使刘瑞芬当面向俄国外交部长询问此事，俄外长表示并未收到有关朝鲜向俄国寻求保护的信件，还表示「倘有朝鲜伪文函来可作废纸」，李鸿章判断「俄暂不至有变」。<sup>406</sup>此外，闵泳翊「不肯显作证据似此事无从查办」。根据汉城的情况，赴朝查办的陈允颐认为「李昉应势力已孤，不敢多事」。所以，李鸿章认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并且大院君也没有势力发动政变的情况下「似宜镇定勿扰以静待动」。<sup>407</sup>

1886年8月，朝鲜方面由金允植向各国公使照会，因为朝鲜国内有不纯份子虚造谣言，伪作文书并摹榻国王印信欺骗外国人，所以今后外国人与朝鲜人立约，无论公私，如果没有官方的印章，即视为私人约定。9月中旬朝鲜又派遣外务协办徐相雨及典圜局帮办李应俊前往天津、北京，拜访北洋衙门、礼部、总理衙门，持朝鲜国王咨文向清廷辨明密约一事。<sup>408</sup>咨文中表示：如若有小人捏造，将永作

---

<sup>405</sup>袁世凯，〈附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亥刻到），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页88。

<sup>406</sup>〈北洋大臣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到 电报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页七，（四六八），页0187。

<sup>407</sup>同上，页0187。

<sup>408</sup>（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页三二七。

废纸，并且会继续查核奸细。<sup>409</sup> 9月底，清廷认为既然朝鲜已经解释清楚并且做出承诺，那么就不必再一味追究。至此，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结束。

通过此次风波可以见得在大院君回朝后闵氏集团为了稳固政权愈发地想要脱离中朝宗藩关系，希望通过俄国的「帮助」实现独立自主。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根本目的一致，袁世凯是李鸿章在朝鲜实行干预政策的执行者，只是李鸿章在面对危情时更加谨慎，袁世凯则更为激进。李鸿章对于袁世凯在朝鲜的嚣张态度的默认使袁世凯不断给朝鲜国王和闵氏集团施压，中方越是强硬地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闵氏集团对宗藩关系的反抗就愈是强烈。事实证明，大院君回朝表面上限制了闵氏集团的势力，强化了中朝宗藩关系，实则催化朝鲜脱离宗藩关系。此次风波过后闵氏集团进行了多次的倒袁运动，朝鲜朝廷请求清廷更换驻朝人选，但是被李鸿章阻止，李鸿章仍旧认为袁世凯是在驻扎朝鲜的合适人选，因此袁世凯的地位并没有因为闵氏集团的反对而被动摇。李鸿章碍于国家形势，不欲直接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显然他认为他与袁世凯的内外呼应当是最合适的对朝管理策略。

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官员再次提出废朝鲜国设郡县或者监国的主张，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主张朝鲜中立化。黄遵宪早在在光绪六年（1880年）就上书译署提议将朝鲜废国改为中国的郡县以绝后患，但他的提议未被采纳，之后黄遵宪「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sup>410</sup> 到了俄朝密约发生时此主张不断出现，但是李鸿章却不赞同此法。袁世凯曾致函李鸿章：「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又有异谋。则

---

<sup>409</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90。

<sup>410</sup> （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11卷，卷七，页53。

中国尤难防御……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帅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sup>411</sup> 李鸿章在致总署的〈筹议赦还李昞应〉一信函便提出不可监国：「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欲治反乱，事势恐有难行」，<sup>412</sup> 所以李鸿章派遣袁世凯赴朝的职衔并没有直接表明监国而行干预之实。

到了 1886 年事态愈发复杂，李鸿章援引元朝的先例：「曾屡派员往监国政，卒酿祸变而止」。他认为元朝时的形势远不如当时的形势复杂，因为元朝时还未涉及与各国通商的问题。而且日本「一防俄掠地侵逼，一利韩贫弱，为他日并吞地步，意极狠恶」，如果派遣官员监国朝鲜，无论朝鲜国王同意与否，日本必定阻挠并且会与他国联合起来一起阻止。此外监国也很难做到妥善管理，一旦管理不善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李鸿章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须先自治而后治人」，并且他分析因为有俄国的势力威胁日本，日本暂时不会突然生事。所以中国「未便轻举妄动，以致一发难收」。<sup>413</sup>

光绪十二年（1886 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写信给李鸿章，他认为朝鲜毗邻中国东三省，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朝鲜开化党饮鸩止渴，朝鲜的局面已经难以扭转。如果中国将朝鲜收为行省则是上策。其次是英、美、俄国共同保护朝鲜，不准许他国侵占朝鲜，朝鲜也可存。然而李鸿章对郡县朝鲜的主张仍旧持反对态度：「鸿章韪之。」

---

<sup>411</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三，页 1541-1542。

<sup>412</sup> 李鸿章，〈致总署 筹议赦还李昞应〉（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页 524。

<sup>413</sup> 李鸿章，〈致总署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4 卷：信函六）》，页 80。

上之总署，不可，议遂寝。」<sup>414</sup>清政府认为「无论郡县监国。本不欲办。亦办不到……得具文一时之虚名。失全韩日后之通局……法之于越。英之于緬。倭之于球。皆自彼发难。中国多事之秋。兴灭继绝。力有未逮。」<sup>415</sup> 不过，李鸿章没有反对朝鲜中立化的主张，但清政府认为朝鲜为中国藩属国，与邻国共同保护于体制不合，遂不赞成朝鲜中立化。不过，自此以后仍旧有官员倡议此主张。1889年12月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报告了朝鲜官员金嘉镇担心袁世凯废除朝鲜国王一事，黎庶昌为其分析并告知其不必担心，他还提醒朝鲜「西洋人之言亦不可尽听」。<sup>416</sup>1890年6月黎庶昌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提出了共同保护朝鲜的方案，他认为清政府可借此摆脱「半服半反、急于谋求自主之朝鲜」。<sup>417</sup>

可见，李鸿章和清廷基于中国自身实力的考量，都不欲图「监国」「郡县」之虚名，而希望通过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的方式得控制朝鲜之实。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对于朝鲜多次提出的更换驻朝官员的请求予以拒绝，甚至当李鸿章派去朝鲜的德尼也向其表示希望将袁世凯撤回中国时，李鸿章一如既往地支持袁世凯驻朝，并使其连任三届。此外李鸿章还通过书信在精神上对朝鲜国王施压，李鸿章给朝鲜国王李熙的信中说到：「中

---

<sup>414</sup> 《清史稿外二卷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607。

<sup>415</sup> 《清实录（第五五册）德宗实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光绪十二年九月），页一三七。

<sup>416</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页2688。

<sup>417</sup> 《清季外交档。各国交涉杂项（琉球档）》所收。（转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日琉球关系史研究（下册）》，页552-553。）

朝之于贵国，事同一家……自去冬以来，音书久阙，引领东望，时为忧危……勿惑异说，勿持两端，因此忧惊，借加悚惕，择贤自辅，去邪勿疑……鸿章忝握兵符，受国重寄，东藩咫尺，责任所归，休戚相关，不容不告……」<sup>418</sup> 显然李鸿章在劝诫国王远离宫妃戚臣，应听取忠良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告诉国王自己手握兵权，暗示朝鲜国王如若首鼠两端，那么中国有可能要对朝鲜施用武力。

### 3.5 巨文岛事件的解决及影响

1885 年底，英国开始重新考虑巨文岛的占领问题，前文提到欧格讷询问中方能否保证巨文岛不被其他国家占领，当时中方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英国在 1886 年初重新估计了巨文岛的价值，英国的海军指挥官表示除非高价修建此岛，不然的话此岛毫无价值，<sup>419</sup> 英国贸易委员会也认为巨文岛的价值没有之前估计的那么高而不值得保留。与此同时，俄国担心因为俄朝密约一事将中国完全推向英国一方，遂再次要求中国与英方交涉从而一面达到笼络中国的目的，一面减少英国占岛对俄国造成的威胁。因为俄方表示如果英国不还岛俄国也要占领朝鲜一地取得补偿，

---

<sup>418</sup> 李鸿章，〈致朝鲜国王〉（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三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4 卷：信函六）》，页 94。

<sup>419</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209。

在此压力下英国于 1886 年 4 月照会曾纪泽，表示如果中国与俄国、日本订立条约，承诺不谋取朝鲜的土地，英国便立即从巨文岛撤兵。<sup>420</sup>

之后，清政府趁着俄朝密约一事进入胶着状态开始与俄国展开交涉，俄国担心过于强硬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中国、日本和英国联合对抗俄国，所以同意就巨文岛一事展开谈判。在 1886 年 9 月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理公使拉德仁在天津展开会谈。拉德仁否认了俄朝密约一事并表示俄国政府担保俄国并无占领巨文岛以及朝鲜其他地方的意图。<sup>421</sup> 10 月拉德仁将修改好的书面照会给李鸿章，李鸿章表示认可。但是清廷要求加入「韩属华，保全周至，苟非干名犯义，断不别有措置；俄与韩通商修睦，亦断无侵扰之心」等语，<sup>422</sup> 遭到拉德仁的拒绝。不过李鸿章仍旧据俄国未按照清廷要求修改的照会要求英国退出巨文岛，英方考虑到俄方已经做出承诺并且评估了巨文岛的商业价值不高，此外俄朝密约失败，中国对朝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于是在当年 12 月底英国公使华尔身照会总理衙门，表示英国政府同意退出巨文岛。照会后还附有拟致金允植的文稿，此文稿系华尔身与总理衙门事先商定。<sup>423</sup> 照会中表示：「查此事现经中国公行担保……中国亦可担保别国不取巨文岛及贵国他处土地之语。是本国

---

<sup>420</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67。

<sup>421</sup> 同上，页 167。

<sup>422</sup>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九，页 14-15。（转引自同上，页 168。）

<sup>423</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 169。

退出巨文岛之意藉以益固。」<sup>424</sup> 英国最终在 1887 年 2 月 27 日从巨文岛撤军解除占领。英国在离开巨文岛之际出于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只与清政府进行单方面交涉而不与朝鲜交涉，交还巨文岛时英国只让少数的朝鲜官员参加交还仪式且将巨文岛直接交还给中国而不是朝鲜，英国在整个过程中承认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国，支持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

此后，袁世凯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这便与日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日本虽然在巨文岛一事上与中国站在同一立场并暂时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侵朝策略的改变，日本的大陆政策决定了日本仍旧会按计划先侵占朝鲜，再将其势力延伸至中国。日本认为俄国在了解到朝鲜统治者因循守旧不愿改变现状的情况后，以保护朝鲜的名义让朝鲜的统治者对其充满感激，并且维持朝鲜政治现状以利于俄国对朝鲜进行控制。<sup>425</sup> 因为当时日本的实力有限，直接对抗将对日本不利，此外甲申政变后朝鲜对日本的仇恨加深且短时间内无法消除，所以日本调整了具体的对外策略，但这并不影响其最终目的。因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袁世凯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干涉愈来愈强，清廷还在 1885 年 7 月和 1886 年 4 月与朝鲜先后签署了《中国代办朝鲜陆路电线条款合同》和《中韩釜山电信条约》，进而控制了朝鲜的通讯并避免了日本对朝鲜电报通讯的控制。因此，日本将政治上的进取暂时搁置，转为对朝鲜经济侵略并

---

<sup>424</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页 2180。

<sup>425</sup> （清）谭嗣同，《仁学》，日本国闻报社本，页 50。

向朝鲜大量移民，袁世凯发现日本「惟派和平柔儒之士如高平、近藤者充当使员，周旋期间，以弭衅端，而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屣中国，其处心积虑固不徒为今日计也。」<sup>426</sup>

关于日本对朝鲜的威胁，李鸿章在 1886 年 9 月致醇亲王的信函中表示日本最初与中国立约时便在明知朝鲜是中国属国的情况下坚持认定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日本此举是为其将来侵占朝鲜做准备。李鸿章认为中国应该联俄使日本无法侵占朝鲜，鉴于俄国的势力，日本必然会收敛。然而，当李鸿章还打算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时，日本已经开始加速强化军备实力以防止俄国的势力妨碍其在朝鲜和中国的利益获取。实际上，早在 1873 年日本天皇就颁布敕令决定要加快日本海防建设的速度，自甲申政变起日本意识到其若要成为一个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势必会与中国在朝鲜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所以进一步加快整饬军备为与中国一战做准备。<sup>427</sup>

1879 年底宫岛诚一郎与何如璋笔谈时就提到：「现海军士官多因海舟鼓舞也」。<sup>428</sup> 何如璋认为日本废琉球图谋朝鲜之举意味着中国的修备筒器造船诚绝不可缓慢进行。何如璋曾在〈与总署因俄事论练兵筹饷书〉中强调了中国当下亟需养兵的重要性，他认为应该增加军费而改变「自互市以来无日不言自强轔蹶经

---

<sup>426</sup> 高平领事致大隈外务大臣函（明治二十一年五月十七日），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一页三三四（机密第九号）（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九九。）

<sup>427</sup> 徐静波，〈译者前言〉，收入（日）陆奥宗光著，徐静波译，《蹇蹇录：甲午战争秘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 5。

<sup>428</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页 508。

营而未能遽有起色」的现状同时还强调了大变营制、选用有能力者的重要性，何如璋调查后发现当时「日本岁需一千一百万」，中国则「每岁所需至少亦须三千万两」才足以自立陆军和海军。<sup>429</sup> 在〈再与总署论练兵筹饷书〉中何如璋再次强调「今日欲谋自保非练兵不可」，<sup>430</sup>又说道「西人有恒言谓国之有兵犹人之有手足……兵弱饷匱则不能为国」。<sup>431</sup>由此可见中、日政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扩张军备的态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1887年日本陆军大佐小川又次（甲午战争时担任第一军的参谋长）到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后写成了《清国征讨策案》以建议日本政府对华作战。<sup>432</sup> 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也就是说必须要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sup>433</sup> 总之，日本的一系列举措为中日甲午战争和朝鲜独立埋下了伏笔。

美国为了在朝鲜开辟更广阔的市场也一直鼓励朝鲜争取独立自主，因此日本与美国通过相互提携来动摇中朝宗藩关系。德尼因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与袁世凯发生矛盾，其在1886年8月到天津请李鸿章将袁世

---

<sup>429</sup> （清）何如璋，〈与总署因俄事论练兵筹饷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十六，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五。

<sup>430</sup> （清）何如璋，〈再与总署论练兵筹饷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十九，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七。

<sup>431</sup> 同上，页十八，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页一二六。

<sup>432</sup> 徐静波，〈译者前言〉，收入（日）陆奥宗光著，徐静波译，《蹇蹇录：甲午战争秘录》，页5。

<sup>433</sup> 同上，页6。

凯撤回。因为李鸿章没有同意，此后德尼便处处反对袁世凯在朝鲜的举措，鼓吹朝鲜为自主之国，应与美国联合从而争取独立。<sup>434</sup> 1887年朝鲜外务协办卞元圭被流放，金允植被以监管不严的理由连带处分，金允植被革职后直到甲午战前，朝鲜政坛不再有其位置。<sup>435</sup> 此外，袁世凯因为废国王立新君事件与闵泳翊反目，所以朝鲜朝廷中亲华的大臣愈来愈少，袁世凯遂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并计划推翻闵氏集团在朝鲜的统治。袁世凯在朝鲜嚣张跋扈的态度引得朝鲜政界对其怨声载道，朝鲜朝廷在袁世凯的高压控制下虚与委蛇，斥华自主的心理与日俱增，<sup>436</sup> 朝鲜政府先是派闵泳骏为出使日本使节，待其到日本后才报告清政府，从而试探清政府对朝鲜先派后咨的态度，进而在1887年8月又发生了朴

---

<sup>434</sup>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页177。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除了维持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地位外，美国政府保持了一种被动的姿态。而且，美国国务卿多次提醒美国在朝鲜的代表保持绝对的中立并且在「阴谋的中心」不要拥护任何政权。（引自 Jongsuk Chay, *Diplomacy of asymmetry: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to 1910*, p. 78.）

<sup>435</sup>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一五〇。

<sup>436</sup> 同上，页一五三。

定阳赴美事件。<sup>437</sup>这表明朝鲜开始积极地寻求独立自主，中朝宗藩关系愈来愈脆弱。<sup>438</sup>

1887 年俄国将注意力东转并制定了新的远东防卫政策，俄国将防卫的重心放在陆军上。<sup>439</sup>1887 年俄国着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此铁路的修筑一方面可以限制日本极速发展的军备力量，俄国可以将军队和物资在一个半至两个月运送至远东（修筑铁路前为一年半到两年），<sup>440</sup>另一方面可以将朝鲜变为俄国的市场，朝鲜的港湾对俄国的商业将大有裨益。<sup>441</sup>如此，俄国将实现其对远东领土的两个战略愿景，即将这一偏远地区与其欧洲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以及在欧亚大陆的东

---

<sup>437</sup> 关于「朴定阳事件」已经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论述其经过，所以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1.有学者认为朝鲜高宗早在 1874 年清廷给朝鲜密信建议其与法、美建交时就已经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参见 Yur-Bok Lee, *West goes East :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 pp.18-19.）

2.1876 年《江华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高宗的支持。李鸿章给李裕元多次致信说服其令朝鲜开国的举措影响了高宗，最为重要的是黄遵宪的《朝鲜策略》让高宗对美国建立了良好的印象，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工业强大且反帝国主义的政权，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国家，建立在经常支持弱国对抗强势压迫者的基督教的基础上。此外，美国与朝鲜相隔甚远，高宗认为不会有邪恶的或者不明的动机……高宗很信任美国因为它不像英、法在亚洲有许多的殖民地，而只是向朝鲜表现出商业上的兴趣。（参见 Yur-Bok Lee,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 ", pp. 13-14.）

<sup>438</sup> 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朝鲜统治者喜欢使用「老大哥（elder brother）」这个词，这让人想起了中国宗主权传统的守护关系。（参见 Fred Harvey Harrington, "An American 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05, " in Yur-Bok Lee and Wayne Patterson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 60.)高宗希望美国可以像之前中国对朝鲜那样去保证朝鲜的独立和解决国际危机，成为朝鲜新的老大哥。（参见 Yur-Bok Lee,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 ", p. 40.）

<sup>439</sup>（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Andrew Malozemoff）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页 38。

<sup>440</sup> 同上，页 30。

<sup>441</sup> 日本对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观点：俄国西比利亚之铁路成则东西洋之商旅皆将出于其途俄之厚隣之薄也（引自（清）谭嗣同，《仁学》，日本国闻报社本，页 51。）

端获得不冻港，这将增加俄国在与其欧洲对手进行全球竞争时的胜算。<sup>442</sup>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增强了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因此英国对日本的侵朝政策不再一味地遏制。1893年英国与日本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解除，1894年英、日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宣告结束，日本的国际地位因此得到提升，这也意味着英国正式放弃联合中国牵制俄国的念头。<sup>443</sup>

综上所述，甲申政变后一系列事件的解决并非因为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略的成功，而是各方利益分配和外交策略变化所致。英、俄、日各国分别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了具体策略的调整而间接使清廷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这并不改变他们的最终目的。而在此期间，由于袁世凯强硬的干预手段以及俄国、日本、美国的私下撺掇，使得朝鲜从内部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不断加强。在俄朝密约的背景下，李鸿章居然还寄希望于联俄制日，而日本则在此期间扩张军备强化自身实力。李鸿章误以为以夷制夷策略总可以不战而屈人，继续将这种方法运用于九十年代的外交中，袁世凯对朝鲜的高压管理也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

### 3.6 俄国因素的对华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俄两国的势力在列强中最为突出。同时英、俄两国也在世界的多个区域进行争霸。英、俄在近东的争霸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逐渐东

---

<sup>442</sup> Nianshen Song,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New Delhi, Singap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7.

<sup>443</sup> 汪晖，《世纪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页25。

移，它们将目光投向了中亚和东亚地区。而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其相较于英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对中亚和东亚地区的侵占更为猛烈。所以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俄国的行动就已经开始影响中国。而由于中国对俄国有限的了解以及俄国对中国的猛烈攻势，让中国官员从五十年代起就对俄国产生了过度的恐惧，以致于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事件。直到李鸿章开始全面掌管清廷的外交事务的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其对朝的外交策略也始终要考虑到俄国的影响。

李鸿章在私函中劝说朝鲜开国时就强调了若朝鲜与美国订立通商条约，则可以牵制日、俄在朝鲜的势力扩张。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公使参赞黄遵宪在劝说朝鲜开国时也多次强调了俄国的实力与野心。清廷在与日本签订多项条约时，李鸿章都考虑到了俄国的影响，他始终担心日俄联合，或者俄国在中日胶着之际趁虚而入。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也考虑到了法俄联合。至于对朝鲜的内政外交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也考虑到了俄国的影响以及俄国势力在朝鲜的渗透。综上，李鸿章的多项外交决策都考虑到了俄国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李鸿章对俄罗斯的认识是全面的，对其行动的判断是准确的。因为彼时清廷统治者对于俄国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以致于过分高估了俄国的实力，进而过分加深了对俄国的恐惧感。这种不全面的认识往往造成了对当时形势的误判。

### 3.6.1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

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处于落后的状态，进而导致清廷的官员们对于俄罗斯的了解非常有限。彼时关于俄罗斯的书籍大多数是基于十九世纪中叶

之前对俄罗斯的认识所写成的。清廷刑部主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已经算是众多书籍中相当全面完备的，但是此书中最可靠的知识还是关于恰克图体系之下的中俄文化、经济交往内容。<sup>444</sup> 此书中关于《尼布楚条约》的相关内容和恰克图体系相关知识以外的内容都表现出零散性和矛盾性，错误也多。<sup>445</sup>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固步自封就逐渐显露了。而日本著名学者山村昌永早在 1806 年所著《华夷一览图说》就已经意识到俄罗斯为「强国」。<sup>446</sup>

1856 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巴黎会议上与英、法、土耳其诸国签订了《巴黎和约》。此会议议定的条约规定了俄国割地以及黑海的中立化，即各国商船都可通行，但禁止各国军舰出入。黑海的中立化是谋土耳其帝国脱离俄国威胁的特别规定。此外，俄土两国都不得在黑海岸上设立或维持任何海陆兵工厂。这种禁止，对于一个大国是一个很大的阻碍。<sup>447</sup>俄国从欧洲霸权顶峰跌落，沙皇

---

<sup>444</sup> 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俄罗斯研究》，期 2（2021 年 4 月），页 126。

恰克图体系：自 1727 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以来，形成了中俄两国间以恰克图贸易为主的商业往来模式、枢密院和理藩院对等的外交模式，以及俄国东正教布道团派驻北京的人员往来模式等为代表的基本交往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恰克图体系」。（引自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页 118。）

<sup>445</sup> 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页 127。

<sup>446</sup> 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页 123。

<sup>447</sup> R.B. Mowat 著，王时造 译，《近代欧洲外交史 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一八五～页一八六。

亚历山大二世立即采取向东发展的策略。<sup>448</sup> 十九世纪后半叶清政府对于俄国在东亚极端的军事扩张显得措手不及，在沙俄的恐吓和胁迫下清廷官员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割让中国大片领土和出让利权的不平等条约。

彼时的日本也同样受到了俄国的威胁：俄国人曾经从堪察加半岛进据千岛，到达北海道。到了 1858 年中俄签订《璦琿条约》后，俄国人占有黑龙江流域北部之地，东至库页岛。与日本居留在岛上的人们时常发生冲突。俄国沙皇要求与日本划定疆界，被日本幕府拒绝。<sup>449</sup> 1857-1860 年俄罗斯从中国割取了满洲北部，1861 年一艘俄罗斯巡航舰不顾当地大名的抗议出现在日本的对马岛上并在岸上建立了据点。<sup>450</sup> 对马岛为往来朝鲜必经之地，俄国此举将有久驻之意。俄国给出的借口是防止英、法两国夺日。俄舰在英国兵舰逼迫后退去，之后美国多次帮助日、俄协调未果。最终在 1875 年，日、俄协议决定千岛归日，库页岛归俄，两国之疆界始定。<sup>451</sup> 日本也存在过对俄国恐惧的时期，这一恐惧感甚至超过对待英法。但是这种恐惧在 1871 年出国考察的日本岩仓使节团进入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后就逐渐减弱了。使团成员发现俄国的贵族专制程度超乎想象，由此对其国力的发展产生疑问。他们反省了那时为止对俄罗斯抱有的过度恐惧，深感排除先人

---

<sup>448</sup>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页 178。

<sup>449</sup> 陈恭禄，《日本简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页 157。

<sup>450</sup> （英）朱利安·S·科贝特 著，邢天宁 译，《日俄海战 1904-1905 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北京：台海出版社，2019），页 7-8。

<sup>451</sup> 陈恭禄，《日本简史》，页 158。

为主的观念，以清醒的头脑去看待历史的必要性。<sup>452</sup> 但是，这种清醒、客观地看待俄国的意识始终没有出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清廷大多数官员的脑海中，对俄国的恐惧似乎已经印在了潜意识中。

### 3.6.2 清廷官员对俄罗斯长期恐惧的原因

当满清官员们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与英国争霸角逐的国家不甚了解时，他们自然就会对俄罗斯产生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往往会被过分放大。在满清官员遇到俄罗斯军队压境或是强硬闯入时，这种对俄罗斯的恐惧思想就会有利于俄罗斯。在俄罗斯用武力胁迫时，满清官员则选择放弃抵抗。在第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第二个第三个就会接连出现并且相对容易得多。俄罗斯的野心也会不断增长，中国对俄罗斯的恐惧也会不断加深，进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清廷与俄罗斯在早期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和《恰克图条约》（1728）均为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部的边界以及俄国对华贸易合法化，《恰克图条约》进一步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sup>453</sup> 然而，俄国对于《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并不满足，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认为占领黑龙江入海

---

<sup>452</sup>（日）田中彰 著，张晶、马小兵 译，《明治维新》（北京：新星出版社，2020），页 110。

<sup>453</sup>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页 5。

口是俄国将势力扩展至太平洋的必达目标。<sup>454</sup> 但清廷官员在十九世纪中期还在用抚慰夷狄的观念开展对俄外交。

1849 年俄罗斯「遣使至伊犁，请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廷同意了两地，「惟喀什噶尔不许」。1855 年「俄罗斯以分界为名，欲得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遣舰入精奇里江，建屋于霍尔托库、图勒密、布雅里。奕山疏陈阳抚阴防之策」。<sup>455</sup>可见此时清廷还在用抚慰夷狄的方式对俄外交。而事实上，此时的俄国已经成为了泰西之一强国，对于土地的占领有着极大的欲望，其要求并不是抚夷之策可以满足的。1853 年俄国探险家穆拉维约夫分析到东亚海岸正在受到英国威胁，俄国即使不能占据东亚，至少也要统治东洋的整个海岸。1854 年初，尼古拉一世同意穆拉维约夫武力通航黑龙江。<sup>456</sup>1854-1857 年，俄军一共入侵黑龙江四次。

1858 年英、法、美、俄四国联合进犯天津，其他三国想要在中国谋取商业利益，而俄国有领土要求，于是「俄使木里斐岳幅至爱琿，坚请画界」。俄国官员了解清廷代表奕山「昧于地势，驻兵黑龙江口，复索绥芬河、乌苏里江地，奕山慑其兵威，勿能抗」。在俄方的威胁恐吓下奕山被迫同意「额尔古纳河口循黑龙

---

<sup>454</sup>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页 159。

<sup>455</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三百七十三，列传一百六十，宗室奕山隆文，页 11539-11540。

<sup>456</sup>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页 167-169。

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尽属之俄」。<sup>457</sup> 此即 1858 年签订的中俄《璦琿条约》。

《璦琿条约》使俄罗斯在亚洲的疆界沿太平洋岸向南延伸到朝鲜边境。<sup>458</sup>

《璦琿条约》签订后俄国又迫使中国相继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罗斯借此扩张本国领土，发展对华跨边界贸易且不让欧美商人在此贸易中分羹。<sup>459</sup> 俄军已基本上占领伊犁、塔尔巴哈台常设卡伦以外边境地区，<sup>460</sup> 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势力拓展至与朝鲜接壤的图们江口。<sup>461</sup> 1862 年陕、甘发生回变后，新疆地区也叛乱蜂起，俄罗斯又在 1864 年趁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该约完全推翻了平定准噶尔后清朝确定的西北边界。<sup>462</sup> 俄国还试图蒙蔽英国，用巧妙的说辞将自身和英国对中亚的侵略美化成一种文明拯救野蛮的行动。与此同时，英国的「精明无为」政策决定了英国暂时不会参与其中，进而俄国进军中亚的行动更加猛烈，<sup>463</sup> 1871 年俄国侵占了伊犁。1873 年俄国在海参崴修建了

---

<sup>457</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三百七十三，列传一百六十，宗室奕山隆文，页 11539-11540。

<sup>458</sup> G.F.赫德森，〈远东〉，收录于（英）J.P.T.伯里（J. P. T. Bury）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0 卷，欧洲势力的顶峰：1830-1870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页 747。

<sup>459</sup>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著，黄忠宪译，《天国之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页 186。

<sup>460</sup>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页 211。

<sup>461</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页 215。

<sup>462</sup>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页 253。

<sup>463</sup> （英）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著，张望、岸青译，《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页 334。

军港，俄国舰队驻扎在此。至此，俄罗斯打通了太平洋出海口，开辟了进击太平洋的基地。<sup>464</sup>

从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看，俄国的方法往往是先武力占领中国领土，然后用武力胁迫的方式恐吓清政府，最终达成让清政府承认既定事实的目的。在条约签约期间，俄军驻扎边境，从而以战争威胁清政府签约。<sup>465</sup> 从 1858 年到 1864 年，俄国迅速地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将其势力蔓延至新疆和东亚海岸。清政府的官员已然了解俄罗斯是一个强国，但是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具体有多么的强悍，恐怕当时的清廷官员们不得而知。道光年间，「海疆事起，时以英吉利最强为忧」，而彼时林则徐认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sup>466</sup> 曾国藩在没有接触过洋人的情况下就认为俄罗斯人强于英、法两国人。由于俄罗斯人经常与英国人兵戎相向，因此他认为英国人怕俄国人。<sup>467</sup> 这些满清高官的判断当然不无道理，但是这也反映出了满清官员们对于俄罗斯实力的过分高估以及相应所产生的过分恐惧。尤其是那些被俄罗斯威胁的满清官员，他们所认为的俄罗斯应该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帝国，以至于俄国每当以武力相威胁时他们就妥协签约。不过，左宗棠在 1876-1878 年赴新疆与俄国开战后取胜说明了俄国的实力也并非强大到不可战胜。正如日本岩仓使节团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也同样需要以清醒的头脑看待俄国而不是陷入一种过度的恐惧之中。

---

<sup>464</sup> 郭文深，《清代中国人的俄国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页 25。

<sup>465</sup> 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1547-1917）》（上海：知识出版社，1983），页 230。

<sup>466</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三百六十九，列传一百五十六，林则徐，页 11494。

<sup>467</sup>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著，黄忠宪译，《天国之忧》，页 187-188。

试想如若伊犁一战没有发生而是妥协签约，清廷是否又要将西部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如果这样的话，英、俄在中亚的争夺很大程度上就是俄国胜出。那么，俄国的下一步是否很有可能就是朝鲜半岛呢？李鸿章在琉球问题上对日本的让步考虑到了俄国因素，在江华岛事件的处理态度上也是担心与日本开战，进而他国趁乱分羹。在左宗棠赴新疆前与其进行了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争论中李鸿章对于新疆的态度无异于放弃。仅凭一再的让步就可以保护东部的海疆吗？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威胁会因为新疆的割让变得更小吗？李鸿章对俄国的恐惧始终影响着他的决策，使他对于中国与俄国、日本对抗以取得胜利绝无信心。1878年《柏林条约》的签订让俄国独占巴尔干半岛的计划失败，俄国在近东侵略的企图化为泡影，进而俄国加紧了对远东的侵略。<sup>468</sup> 然而，即使在此背景之下曾纪泽仍旧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收回了新疆的绝大部分领土。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应该清醒客观的看待俄国的实力而不是陷入巨大的恐惧中。

### 3.6.3 由对俄恐惧引出的几个问题

李鸿章对于西方的技术秉持着接受和学习的态度，<sup>469</sup> 从器物层面来看，李鸿章对俄国的恐惧源于中国轮船铁路建造事业的落后。李鸿章了解制造轮船和修筑铁路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五十年间「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皆因「有

---

<sup>468</sup> 何汉文，《俄国史（下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页三三三。

<sup>469</sup>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页65。

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sup>470</sup>他了解到欧美各国拥有众多兵船，1872年其上书朝廷不可裁撤轮船制造，否则将「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他得知「英国兵船三百六十余只，在诸国为最多」，「俄国兵船三百余只，内铁甲船二十余只」。<sup>471</sup>光绪年间，俄国在「旅顺筑海军港，屯驻铁舰，迥殊曩制。」<sup>472</sup>俄国从欧洲开始修筑铁路，逐渐接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欲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如果早修筑几条铁路，「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sup>473</sup>

器物层面上落后于俄国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李鸿章对俄国的恐惧。所以，他认为需要通过外交手段来避免开战。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对方谈判或者拉拢第三方绝非「均势」之举。不过，李鸿章还是宁可在谈判桌上让步也不愿意开战。李鸿章利用外交谈判来降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是不可以，但是需要外交手腕，这样才能在谈判桌上不被予取予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菲茨杰拉德认为曾纪泽之所以能在《圣彼得堡条约》中从俄国方面争到比较有利的条款，实

---

<sup>470</sup> 〈妥议铁路事宜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卷：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254。

<sup>471</sup> 〈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卷：奏议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107。

<sup>472</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水师，东三省，页3999-4000。

<sup>473</sup> 〈妥议铁路事宜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卷：奏议九）》，页254。

际上是由于这位专使熟练的外交手腕。<sup>474</sup>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以外的疆界和主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的实现没有在主要大国之间引起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危险。这说明外交活动在欧洲以外同样产生作用。<sup>475</sup>这种外交指的是欧洲式的国际公法外交，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礼部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国际法服务的都是殖民帝国体系。<sup>476</sup>李鸿章在这样的外交活动中往往并不能实现均势，反而以出让中国利权、丧失藩属国收场。

在朝鲜与美国建交一事中，李鸿章便建议朝鲜使用均势之法。在其私信朝鲜相国李裕元劝其开国时就强调了俄国的险恶以及与美国缔约的重要性：「至俄国所据之库页岛、绥芬河、图们江等处，皆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sup>477</sup>「法、美志在通商，并无用兵强逼之意，而俄人则窥伺甚急；朝鲜东北海口与俄接界，防御太疏。」<sup>478</sup>「兹欲杜俄、日之隐谋，惟有与泰西各国一律通商，尚可互相牵制，孑然常存。」<sup>479</sup>

---

<sup>474</sup> C. P. 菲茨杰拉德 著，〈中国〉，收录入(英)F. H. 欣斯利 (F. H. Hinsley)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页 486。

<sup>475</sup> F. H. 欣斯利 著，〈导言〉，收录入(英)F. H. 欣斯利 (F. H. Hinsley)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1870-1898 年》，页 35。

<sup>476</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页 217-218。

<sup>477</sup> 〈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光绪五年），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7 卷：诗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 61。

<sup>478</sup> 〈朝鲜通商西国片〉（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9 卷：奏议九）》，页 190。

<sup>479</sup> 同上，页 191。

至此正好可以回应晚清帝国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中国是否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用的帝国主义手段应用于中朝关系之中呢？笔者认为并没有。李鸿章的朝鲜策略始终是以传统的东亚宗藩关系为前提的，即使为了均衡列强的势力对朝鲜的宗主权有所强化，也仍旧没有打算将朝鲜变为欧洲国际公法下的属国以谋取利益。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利用此条约明确了中国的宗主权，在朝鲜看来中国不是要将其变为殖民地而是强化宗藩关系以让其更长久地作为中国的东藩屏障，<sup>480</sup>两国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肯定的关系，<sup>481</sup> 朝鲜的稳健开化派了解这是中国试图与列强势力均衡的手段。<sup>482</sup>只是在强大的殖民压力下，这种调和的努力并不成功。<sup>483</sup> 此外，还有一具争议的事例，即中国在朝鲜铺设电线。朝鲜毗邻俄、日边境，1885年李鸿章认为「必须及时接设电线，以通信息而便调拨。」<sup>484</sup>因为日本已经在釜山一口铺设了电线，中国要在日本开展其它行动前铺设电线，否则「水、陆线索尽落他人之手，中、高气脉不能灵通。」<sup>485</sup> 李鸿章知道中国代办容易引起猜忌，所以打算「由中国电报总局代朝鲜政府筹借公款银十万两，分限二十年」并且免除利息。<sup>486</sup> 帝国主义国家的属国与宗藩体系下属国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前者需要从属国获取经济利益，后者对属国没有经济利益

---

<sup>480</sup> (韩)赵景达 著，李濯凡 译，《近代朝鲜与日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页 73-74。

<sup>481</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页 218。

<sup>482</sup> (韩)赵景达 著，李濯凡 译，《近代朝鲜与日本》，页 75。

<sup>483</sup> 宋念申，《发现东亚》，页 218。

<sup>484</sup> 〈议展朝鲜电线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11 卷：奏议十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页 107。

<sup>485</sup> 同上，页 108

<sup>486</sup> 同上，页 108

的要求，反而还会赏赐给属国大量礼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自身的经济因为大量的赔款本就入不敷出，但是清政府仍旧免息借给朝鲜银十万两且分为二十年还清。这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属国的利益攫取可谓是截然相反。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李鸿章在国际外交中的退让态度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的礼治主义思想的影响呢？李鸿章师从曾国藩，曾国藩忠实地信奉孔孟之道，他视孔、孟的遗教为民族至宝。曾国藩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sup>487</sup>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自然会受到曾国藩思想的影响。但是，笔者不认为可以把李鸿章在国际外交中的退让态度归因于他的策略受到了礼治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李鸿章的对外事务处理态度始终是避战的，无论是与日本还是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交涉。对待藩属国越南和缅甸时，他也没有表现出在传统的宗藩关系下宗主国所应该承担的保护小国的责任。他认为越南、缅甸地处偏远，中国在与它们的交往中也没有获得实利，它们也就是仅有虚名的藩属国。在中国的边疆出现危机时，应该舍弃这些虚名。李鸿章很大程度上以利益为衡量标准而非儒家之道德标准。在对待藩属国朝鲜时，在他与中国和朝鲜的统治者们的书信往来中，他数次强调朝鲜为东藩屏障，中国若失去朝鲜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将受到威胁。但在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清廷的态度是让朝鲜自行与日本交涉，因此朝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在传统的宗藩体制下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应该是相互帮助、安全共享的关系，但是在朝鲜需要帮助之时，清廷为避免战争让朝鲜独自面对日本。综上，李鸿章虽然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处事时自然会受到儒家思

---

<sup>487</sup>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页 46-47。

想的影响，但是在十九世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的避战态度很大程度上不应归因于儒家礼治主义的影响。在与藩属国的交往中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李鸿章「弃藩邦，保疆土」的思想更为明显。<sup>488</sup>

### 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李鸿章朝鲜策略的连锁反应

朝鲜税赋沉重，百姓生活困苦，1894年朝鲜东学党人借此发动起义。朝鲜军队赴全州镇压，农民军大败朝鲜军队并且缴获了朝鲜军队的枪支，在全州「以匡君救民为名，扬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sup>489</sup>朝鲜遂请求清廷派兵支援，之后农民军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达成了全州和议。然而，日本在清兵入朝之时也派兵登陆朝鲜。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表示：「本国向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今照日朝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sup>490</sup>朝鲜乱局平息后，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仍率领四百人进入朝鲜王京，之后从仁川登陆八千多人前往朝鲜王京。清廷表示既然动乱已平息中日应同时撤兵。但是日本约同中国一起为朝鲜改革内政不予撤兵。<sup>491</sup>光绪帝认为如若日本要求与中国共同商议以保朝鲜的提议「无碍中朝体制无损朝鲜权力」，可以为保全大

---

<sup>488</sup> 刘晓辉，〈认知视野下李鸿章对日决策研究（1870-1895）〉（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16。

<sup>489</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612。

<sup>490</sup> 同上，页14612。

<sup>491</sup> 引自《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列传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页4630。

局考虑适当通融。<sup>492</sup>但是与日本商议撤兵一事久久没有达成共识，日方表示即使中国不帮助朝鲜改革内政，日本军队绝不撤回，将留在朝鲜直至帮助朝鲜完成内政改革。

日军在朝鲜王京要害驻扎，中国虽屯兵于牙山但是人数不多。袁世凯屡次请兵，而李鸿章始终想要依据条约要求日本撤兵，他担心日本将清军派兵众多作为增兵的借口。<sup>493</sup>李鸿章还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调停，他认为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让其互相牵制进而在中、日之间调停。光绪帝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sup>494</sup>几天后的上谕中光绪帝强调了外国调停的不可靠性，光绪帝认为「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当下应该迅速备战：「我守备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sup>495</sup>李鸿章于次日上奏朝廷表示：「倭至无可收场。必须豫筹战备。」<sup>496</sup>可见李鸿章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宜开战。

---

<sup>492</sup>〈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 洋务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四，页二十二（一一三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 0270。

<sup>493</sup>《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 14613。

<sup>494</sup>《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一，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2 번째기사 1894년。

<sup>495</sup>〈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洋务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三，页二十九～三十（一〇五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 0258。

<sup>496</sup>《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一，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3 번째기사 1894년。

巨文岛事件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李鸿章用「以夷制夷」的方法解决争端的信心，「盖英最忌俄。恐中倭开衅。俄将从中取利也此时大兵既与相持。」所以在调停中「英人尤为著力」。<sup>497</sup>在英、俄各国使臣调停无果后，李鸿章仍旧想方设法地避战，进一步让中方处于被动地位。他甚至想要以赔款的方式求和，但日本「索银三百万两，朝论大哗，于是和战无定计」，<sup>498</sup>在六月中光绪帝又多次强调了迅速备战的重要性。<sup>499</sup>六月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进入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让大院君李昱应主理国事，凡是不亲附的大臣全部驱逐。<sup>500</sup>到了七月初一朝廷认为日本「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遂「著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sup>501</sup>七月中旬，对于「俄有动兵逐倭之意」光绪帝表示虽然中方不能阻止，但是不可

---

<sup>497</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二，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1 번째기사1894년。

<sup>498</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613。

<sup>499</sup> 「倭情叵测议之成否尚难逆料若事至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朝廷命李鸿章预先筹划，待到「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引自〈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 洋务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四，页二十二，（一一三一），页0270。）

2. 「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谕李鸿章先事预筹」（〈军机处密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 洋务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四，页二十七，（一一四七），页0273。）

<sup>500</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列传三百十三，属国一，朝鲜，页14613~14614。

<sup>501</sup> 〈上谕（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 洋务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六，页二（一二八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页0301。

联合俄国以避免日后俄方借此要挟索要，需要依靠「我兵攻剿得胜」，「著李鸿章饬催水陆诸将奋迅图功慎勿虚盼强援」。<sup>502</sup>

清廷中大臣多主战，对于李鸿章的「主和」深感不满。翁同龢认为「倭兵驻韩日久。和议未成。自当速筹战事。」<sup>503</sup>「吴大澂自请率湘军赴前敌，优诏允之。」<sup>504</sup>礼部侍郎志锐指责李鸿章「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认为李鸿章的妥协态度将造成「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建议清廷应该紧急备战使日军「不敢猝发」。<sup>505</sup>李鸿章对待战争缺乏信心，他一直强调中国的军备力量不足以对抗日本。他认为日本自 1882 年朝鲜壬午兵变后国家财政加大了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军备发展迅速，中国与之相比落后很多。所以，清廷不宜主动宣战：「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sup>506</sup>「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sup>507</sup>自光绪十四年（1888 年）后，「我军未增一船。各船行用日久。愈旧愈缓。前曾奏明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今日海

---

<sup>502</sup>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一（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 电寄档）〉，收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六，页三十九，（一四〇一），页 0320。

<sup>503</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二，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1 번째기사1894년。

<sup>504</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五十，列传二百三十七，吴大澂，页 12553。

<sup>505</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斗（二），页 623-624。（转引自关捷，〈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满族抗日活动述略〉，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216。）

<sup>506</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四，光绪二十年七月七日，1 번째기사1894년。

<sup>507</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李鸿章，页 12020。

军力量。攻人不足自守有余。应遵旨严防威海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sup>508</sup> 尽管当时日本军备通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具备相当的实力，但是 1891 年「英国伦敦武备报载各国战舰比较表」显示「中国第八日本则列第十六」。<sup>509</sup> 据此，如若中日开战从军备上来看中国绝非没有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的赔款避战之策实际上向日本暴露了他的避战心理，在战争开始前就将中国置于被动的地位，从而让日本对战胜更有信心。陆奥宗光表示日本政府虽然从一开始一直处于被动者的地位，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决心采取最后的手段，<sup>510</sup> 这与李鸿章的策略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后的第二天在朝鲜丰岛袭击了中国的「济远」、「广乙」两艘军舰，击沉了中国借英国的运兵船「高升」号。中国与日本兵船在牙山口外开战，提督叶志超、卫汝贵在平壤牙山被日军击溃，左宝贵奋勇抗战不幸阵亡。张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饷械不继，遂致败绩，咎在鸿章。」<sup>511</sup>清军在之后的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辽东之战等战役中相继战败。1895 年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清政府与日本订约十一条，承认作为清属国二百五十八年的朝

---

<sup>508</sup>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六，光绪二十年八月一日，3 번째기사1894년。

<sup>509</sup> （清）周家禄，〈答问海军〉，《寿恺堂集》二十四，页三，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六二）》，页一六〇～一六一。

<sup>510</sup> （日）陆奥宗光著，徐静波译，《蹇蹇录：甲午战争秘录》，页 7。

<sup>511</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四十三，列传二百三十，张百熙，页 12441。

鲜为独立国家，割让辽南地方和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增设通商口岸等。

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而反对李鸿章的主和论，1894年9月慈禧太后令翁同龢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议请俄国调停，翁同龢认为如若当下言和必定引来世人的指责而反对调停。李鸿章赴日谈判前要求朝廷授予割地特权，翁同龢等主张宁可多赔偿也不割地。<sup>512</sup> 翁同龢的学生张謇一直支持其主战的观点，他呼吁加强苏北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以防止日军登陆。甲午战败后，张謇于1894年写下〈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主张弹劾李鸿章。其中指责李鸿章凡是遇到「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都认为李鸿章「主和误国」。<sup>513</sup> 张謇指出李鸿章在收到汪凤藻电复「其时日兵尚不甚多 布置尚不甚密」，「李鸿章以轻忽败之」。<sup>514</sup> 对于日方提出中日共同帮助朝鲜改革内政一事，张謇认为朝鲜内政积弊已深，中国早该帮助其改革，既然日本提出此事，「我何妨令袁世凯与议 折日专惠韩民之计 收我抚字属国之权 因势成务 有何不可」<sup>515</sup> 但由于

---

<sup>512</sup> 关捷，〈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满族抗日活动述略〉，收录于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页228。

<sup>513</sup> （清）张謇，〈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张季子九录（一）〉，《政闻录》卷一，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 第三编 94 综合类》，页十。

<sup>514</sup> 同上，页十一。

<sup>515</sup> （清）张謇，〈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张季子九录（一）〉，《政闻录》卷一，收录于张孝若编，《民国丛书 第三编 94 综合类》，页十一。

李鸿章不同意此做法，让日人有了可趁之机，最终酿成兵端，「此为李鸿章以庸劣而败和局」。<sup>516</sup>

甲午战败的事实表明他国只会在自身有利可图时利用中国为其谋取利益，在无利可图时就会联合起来瓜分利益。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仍旧寄希望于调停，他认为日本长期慑于俄国的势力，如果让俄国调停则可以避免战争。李鸿章在本该备战的时候一心想要依靠调停来解决问题，然而俄国为自身利益计并不打算过早进行调停。陆奥宗光曾总结到：当中、日两国之间的纷争无法解决时，中国缺乏诉诸干戈的决断力。<sup>517</sup> 所以，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之策并未给中国和朝鲜带来和平稳定而是反被夷制，同时也让朝鲜认识到宗主国在西方国家和日本面前如此孱弱，这也回应了为何朝鲜自甲申政变后斥华自主的心理愈加强烈。

#### 四、甲午战败引发的一些思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李鸿章的朝鲜策略始终受到其对国际形势分析的影响，李鸿章通过强化宗主国对藩属国朝鲜的管控以保障中国东部的安全，从而防止西方国家和日本通过朝鲜侵占中国。他始终维护东亚秩序下传统的宗藩关系并在此秩序下处理朝鲜事务，而未曾

---

<sup>516</sup> 同上,页十二。

<sup>517</sup> (日)陆奥宗光著，徐静波译，《蹇蹇录：甲午战争秘录》，页7。

打算将中朝关系放在近代国际秩序下处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不仅置身于东亚秩序中，同时也置身于近代国际秩序中，想要不受到近代国际秩序的影响，即使是时常处理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在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传统中朝宗藩关系中李鸿章主张不图虚名，而得干预之实。所以清廷对外呈现出朝鲜自主内政外交以免落他国以口实，在朝鲜与日本交涉时，李鸿章始终强调「属国自主」，他认为这将避免他国借清廷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一事而挑起事端，进而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但这同时也造成了清廷对日的妥协退让从而让日本了解到清廷的避战态度，进而给日后留下了隐患。

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下开始改变。七十年代后半期李鸿章开始试图通过私人关系引导朝鲜的外交，自此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开始改变，八十年代发生的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再次引起传统中朝宗藩关系的变化。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后李鸿章派员私下指导朝鲜与日本签约，这样仍旧可以宣称清廷始终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即属国内政外交自主。不过，深闭固拒的朝鲜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独自与日本交涉时也让日本得到了许多利益。相比较日本的得利，李鸿章认为让别国没有机会对中朝宗藩关系指手画脚更为重要。李鸿章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的对朝策略让朝鲜闵氏集团感到自身的势力受到威胁与限制，以及巨文岛事件处理过程中清廷的避战态度共同强化了朝鲜内部斥华自主的心理。最终，日本依据日朝《济物浦条约》及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的条款让日本军队顺

理成章地登陆朝鲜进而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廷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延续了五百年的中朝宗藩关系彻底瓦解。

本文就李鸿章对于朝鲜事务的态度与策略的讨论让笔者想到如果李鸿章将朝鲜事务放在国际秩序下处理，不「主和」退让，不避战，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会否改变？笔者将借新疆危机的化解：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纪泽与俄谈判，中法战争前和进行过程中的历史事件进行讨论。

### （一）新疆危机的化解

俄国借安定新疆秩序之名占领伊犁地区，清政府与沙俄进行交涉，但沙俄拒不退兵。清政府于 1875 年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在战场上「跃马横戈」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sup>518</sup>然而在左宗棠赴新疆前，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就海防和塞防产生分歧。李鸿章认为日本借琉球侵犯台湾一事显明了海防的重要性，为了防止日本的再次侵扰应该重视海防的发展而西部边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sup>519</sup>他甚至认为新疆不收复对于中国整体来说不伤及元气，而海疆如果不加以防卫「则腹心之大患愈」。<sup>520</sup>李鸿章表示如果他的提议被朝廷采纳，「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覈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

---

<sup>518</sup>（清）左宗棠，《左文襄公集》7卷，文集卷三，清光绪十八年刻本，页33。

<sup>519</sup>（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二十四，页828。

<sup>520</sup>同上，页828。

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sup>521</sup> 然而，左宗棠认为塞防为了海防而停兵节饷对于边塞和整个国家来说无益有害：「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sup>522</sup> 反之，如果边塞得到了很好的防卫则「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sup>523</sup> 因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sup>524</sup> 除左宗棠外许多官员都认为海防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应以牺牲塞防为代价。因为俄国与中国有共同的国界线，相比日本威胁更甚，俄国既可以从海路也可以从陆路入侵中国。他们认为俄国的侵扰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左宗棠还强调西方国家通常为了商业利益开战，而俄国除此之外还有领土要求。<sup>525</sup> 李鸿章则认为朝廷的财力不足以既顾及海防又顾及塞防。清政府「财政之竭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历次赔款，国库益窘。」<sup>526</sup> 而李鸿章却又常常通过赔款求和，进而国库虚空不能支付军备费用，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左宗棠在新疆的大捷让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对华政策，1879年10月11日宫岛诚一郎在与黄遵宪、沈文荧笔谈时认为「自今以往，诸外国共不瞥视贵国，是即同洲之一大幸事也。」<sup>527</sup> 在此背景下崇厚赴俄国签订了出让中方利权的

---

<sup>521</sup> 同上，页 828。

<sup>522</sup> （清）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10卷，卷七，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页 218。

<sup>523</sup> 同上，页 218。

<sup>524</sup> 同上，页 218。

<sup>525</sup>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页 113。

<sup>526</sup>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全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八九二。

<sup>527</sup>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页 502。

《里瓦几亚条约》，清政府不认可条约内容进而导致中、俄关系恶化。清廷的部分官员主张对俄开战，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而李鸿章再次持相反意见。李鸿章认为崇厚是奉旨全权便宜行事，不可以说是没有立约定议的权力。如果先同意了之后又反悔，那么其曲在我。<sup>528</sup> 清政府将崇厚关押之时，威妥玛再三要求李鸿章给他看《里瓦几亚条约》的确切条款，李鸿章偷偷给其看了复本并表示他主张暂时羁縻，「切望有任何能导致安全的建议」。李鸿章对俄国的增兵感到惴惴不安，同时听说西班牙也在打算趁火打劫，威妥玛提醒李鸿章如果中国既不屈服又不能抵抗，有许多国家将急于向它提出现实的或空想的要求。<sup>529</sup> 威妥玛为了英国的在华利益自然不愿让他国在华获利，那么此番提示便说明了威妥玛认为一旦清廷对俄妥协将引来更多的国家在华分羹。

最终，此次危机通过曾纪泽的谈判化解，中、俄之间也没有开战。在谈判前俄国人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展开谈判而要将谈判地移到北京，但这一次清廷拒绝了俄方的要求，谈判最终在俄国进行。实际上，俄国人内心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sup>530</sup> 在 1880 年 6 月威妥玛与新任法国公使宝海的一次长谈中，刚去过俄国的宝海认为俄国情况很糟，不能打仗。<sup>531</sup> 威妥玛在 1880 年 7 月时怀疑李鸿章

---

<sup>528</sup>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页 115。

<sup>529</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54。

<sup>530</sup> 由于 1876 到 1877 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 1878 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担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引自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 年〉，页 117。）

<sup>531</sup> 威妥玛文八一和文八二，1880 年 6 月 1 日，文 17.831 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57。）

的军队能够抵挡俄国人并预计一旦开战，俄国军队将占领北京。<sup>532</sup> 此外，俄国政府的财政也相当拮据，何如璋曾分析俄国「连年天寒岁荒畜产衰微乱党迭起冬宫之变既七八次彼但以余力扰中国未必能操胜券而欲以全力攻中国要未易言揣其意亦非必欲战事……计今伊犁未还我无遽行索地之言彼亦何能遽行用武不必因要喝之言遂自示弱夫」，此时中国「惟有一面将以委蛇一面持以坚定一面整军经武力求自强」。<sup>533</sup> 曾纪泽在与俄方的谈判中曾表示愿意让出伊犁全境，俄国方面却谈到只要归还部分地方，似乎极迫切地希望得到赔款以贴补军费。<sup>534</sup> 所以，俄国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力量开战，立刻开战似乎不会发生，俄国更想迅速从中国索取利益以缓和俄国财政拮据的局面。如果不是曾纪泽去谈判，李鸿章的暂时羁縻策略就不知是「暂时」羁縻还是「长久」羁縻，抑或是将新疆大片土地拱手让与他人了。如果考虑到俄国的实力，将李鸿章的避战态度理解为从实际出发似乎可以说得通，但是一味退让的话（羁縻《里瓦几亚条约》中提到的除伊犁以外的大片新疆领土），岂不是向对方表明了妥协态度，进而为之后丧失更多的土地和利权埋下隐患？

---

<sup>532</sup> 英国公使威妥玛和英国政府非常关注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的交涉情况，并且在曾纪泽赴圣彼得堡谈判的过程中也在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以及中俄双方的谈判内容，同时给予中国政府建议。

<sup>533</sup> （清）何如璋，〈再与总署论练兵筹饷书〉，《何少詹文钞》卷二，页十七，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页一二六。

<sup>534</sup> 普伦凯特文五二七甲，极密，1880年11月10日，文65.1083号。（转引自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70。）

1878年俄国战败土耳其后，势力遍及巴尔干全境，引起英、奥不满。于是各国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共同分赃，结果俄国仅得部分好处，大为失望。（转引自同上，页69译者注。）

## （二）越南危机的无解

李鸿章对于越南的态度与对朝鲜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为朝鲜为辽沈门户，形势紧要，而在荒远的越南是「奉贡虚文」的属国。1882年12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就越南问题达成媾和协议，其中同意云南开放通商，承认越南东京受法国「保护」，但边界地区除外；法国尊重越南的自主权。<sup>535</sup> 但是1883年2月法国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梅拉库上台后，否决了宝海的协定。<sup>536</sup> 对此，李鸿章的应对之策仍旧是以夷制夷，他向英国的海军提督韦力士表示，如果英方同越南缔结一个商约，他愿让英国在朝鲜实现任何英国想要的条件。<sup>537</sup> 1883年8月法国逼迫越南签署《顺化条约》后，李鸿章在上书总署时表达了越南危机无可挽救，向法国妥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没有干预越南的政事，也没有侵占其土地，《顺化条约》虽是法国逼迫越南签署，但既然越南国王认为可行，各国也没有异议，中国在此时不宜代其改毁。如果改毁约定，那么一定要考虑到兵力、粮饷是否能维持到将河内和西贡的法国人驱逐之时；能否换掉越南国王；能否诛除订约的奸臣陈廷肃、阮文祥等。如果不能办到这三点，法国便不会屈从，《顺化条约》就不能改毁。<sup>538</sup> 李鸿章认为当时的中国兵力和饷力是不能办到的，法国

---

<sup>535</sup> 威妥玛致葛兰斐尔私函，密件，1883年11月22日第1号，文17.943号。（转引自同上，页93。）

<sup>536</sup> 格维讷文五四，绝密，1883年4月12日，文17.923号。（转引自同上，页94。）

<sup>537</sup> 韦力士海军提督文二七四，1883年5月30日，附入海军部致外交部文，1883年7月25日，文17.941号。（转引自同上，页96。）

<sup>538</sup> 李鸿章，〈复总署论越事〉（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卷：信函五）》，页299。

「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sup>539</sup>

如果法军进犯我驻守之地，则不能不与法军开战。如若中国战胜，法国必然会继续增兵再战。但如果中国战败则可退回中国境内，法军必然不会突然深入中国腹地，也还不至于牵动大局，到时候再慢慢商议划分边界一事。<sup>540</sup>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彻底战胜法国没有丝毫的信心，甚至希望通过中国战败来保全他所谓的大局。而事实上，当茹费理政权推翻宝海和李鸿章的协定后，宝海分析法国出兵不一定会取胜，法国如果战败，将会使中国加强对其他各国的反抗。<sup>541</sup>而且，法国驻日公使德理固本以为只要法国同意，就可以结成日法同盟，但事实上日本自有打算，此时日本持观望态度。据此可知法国人自己都不能确保法国可以战胜中国，且在东亚寻找同盟的时候并不顺利，而李鸿章却认为中国不具备战胜的实力进而打算妥协。时任驻英、法大使的曾纪泽则认为，如果清廷在敌人面前因循苟安，萎靡不振，那将会和与法国人开战到底有可能国家灭亡同样危险。<sup>542</sup>曾纪泽在 1883 年底还以书面形式对茹费理提出警告，呼应了总理衙门对法国的照会，即北宁和山西周围有中国军队，它们将对任何进攻加以反击。<sup>543</sup>即使在 1883 年底法国占领越南山西后，曾纪泽仍旧认为「法国正在骑虎难下」

---

<sup>539</sup> 李鸿章，〈复张蕡斋署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页 233。

<sup>540</sup> 李鸿章，〈复总署论越事〉（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收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3 卷：信函五）》，页 300。

<sup>541</sup> 格维讷文五四，绝密，1883 年 4 月 12 日，文 17.923 号。（转引自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年）》，页 94。）

<sup>542</sup> 外交部致巴夏礼文一四丙，1883 年 9 月 13 日，文 17.920 号。（转引自同上，页 99。）

<sup>543</sup> 李焘司电六一，密码，1883 年 11 月 17 日，文 27.2705 号。（转引自同上，页 129。）

且黑旗军打得很好。<sup>544</sup>需要强调的是，法国人在越南需要使用暴力征募伏役，从而使当地百姓对法军深恶痛绝。越南民意、法军对越南地理环境不熟悉等因素着实影响了法军的战斗实力，而李鸿章却时常强调清廷的军事实力不如法国，进而一味地妥协退让。此外，关于越南的得失对朝鲜得失的影响，李鸿章实在欠缺考虑：若越南战事失败，将会让西方国家和日本认为清廷的军事实力不足以保护藩属国，进而将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利益瓜分的行列，这就将朝鲜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上文提到李鸿章把朝鲜当作筹码试图让英国与越南缔结一个商约从而牵制法国，一旦如此这无疑是将朝鲜置于险境，且对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安全也没有好处。这同时也呼应了朝鲜巨文岛在被英军占领后清廷迟迟没有积极地帮助朝鲜收回巨文岛，而是希望利用英国牵制俄国，最终朝鲜朝廷自主之意愿越来越强烈，李鸿章所维护的传统东亚秩序愈发摇摇欲坠。

吴长庆曾请率所部六营赴越南杀敌，他认为「方今中外大局以越南战事为权衡朝鲜防务又以越南战事利钝为权衡」。如果越南战事胜利「则朝鲜表里山海不防自固」，一旦北圻失守法军将越过红河，那样的话「滇粤边疆一时俱震」，法国人得逞后其他国家侵占中国藩属的野心也会被激发「朝鲜将有防不胜防之患」。对于认为中国「枪械不精难操胜算」的说法，吴长庆以刘永福为例：「刘永福为乌合之众其枪械岂但不如法亦并不如中国然刘以钝胜法以利败者何也器不足恃也」，吴长庆认为法国人虽然枪械精但是因为从法国过来需要二三个月，军队将「势缓不济」，有时急需弹药却罄而不得「岂能徒手而御我钝器而谓胜算难操」。

---

<sup>544</sup> 电文，未注日期，附入巴夏礼文六四，1883年12月24日，文17.927。（转引自同上，页132。）

<sup>545</sup>对于军饷不足的说法，吴长庆认为「军兴以来饷项仰给厘税」，中外交战之时商货交易受到阻碍，「饷源之绌」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糜饷「取诸宫中」而不是依赖厘金便可解决军需问题。「收抚准回诸部平定大小金川」时的糜饷是今日的数倍，当时并没有用厘金支付糜饷，所以军饷不能「全恃洋税」。<sup>546</sup>

1884年4月清廷的宫廷政变使对外妥协的一派失势，清廷内部主战的观点此起彼伏，但李鸿章却在当年5月与福禄诺签订《李福协定》（《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这个协定给予法国以福禄诺曾受命所要取得的一切：即中国将撤出东京，默认法国同越南之间的任何条约，容许云南通商。<sup>547</sup>在条约签订的两天前，李鸿章同英国的禧在明有一次谈话，谈话中李鸿章表示甲申易枢后总理衙门的官员不懂得国际形势，中国无法发动攻势，如果法国派出五万军队，中国将被击溃。<sup>548</sup>在广州办理防务的彭玉麟对《李福协定》极为不满，他认为避战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更多的国家前来分羹，要给法国以严厉打击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如果开放云南通商，法国人将在云南进行传教活动，中国必须铲除法国人和天主教会。

---

<sup>545</sup>（清）周家禄，〈为吴军门请赴越南前敌疏〉，《寿恺堂集》十八，页四，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六二）》，页一二七。

<sup>546</sup> 同上，页四～五，载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页一二七。

<sup>547</sup> 季南 著，许步曾 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页138。

<sup>548</sup> 禧在明，1884年5月9日，附入巴夏礼文九六，1884年5月24日，文27.2708号。（转引自同上，页137-138。）

<sup>549</sup> 刘铭传认为「言和者应常思，伊犁和而赔偿兵费，天津和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坐失琉球，越南和而藩服不存。」<sup>550</sup>

李鸿章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会选择开战，但万不得已之时往往是中方最为被动的时候。1884年7月何如璋上奏请求援助，反对「静以待变」。<sup>551</sup> 当福建港口的法国船舰增至七艘并盛传第二日法军便要攻打马尾时，李鸿章却发电报劝张佩纶将船厂作抵，让法军暂时占领。7月下旬，何如璋与张佩纶联名致电请求朝廷派兵船援闽，朝廷虽然多次下令，但是南、北洋设词推托，拒不执行。<sup>552</sup> 7月31日李鸿章再次致电张佩纶劝其腾空船厂让法军暂时占领。到了八月，何如璋和张佩纶建议「塞河先发」，<sup>553</sup>但总署仍旧主张「镇静为主」即使在8月5日法国船舰已经炮轰基隆。直到8月19日李鸿章还致电福建，反对决战。<sup>554</sup>之后仍旧有官员主张「先发」，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与法军对抗，但是直到8月23日清廷才令李鸿章、曾国荃各拨兵船二艘，刻日抵闽，然而当日下午马江之战爆发，扬武等七舰二船均被击毁击沉。

---

<sup>549</sup> 同上，页 138-139。

<sup>550</sup> 1884年5月22日彭玉麟上奏（《彭刚直公奏稿》卷5，页12-15）；1884年6月24日刘铭传上奏（《刘壮肃公奏议》卷2，页1-5。）（转引自（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日琉球关系史研究（下册）》，页545。）

<sup>551</sup> 俞政，〈何如璋简谱〉，收入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梅州文史 第六辑：何如璋专辑》，页206。（原文载于俞政，《何如璋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sup>552</sup> 同上，页207。

<sup>553</sup> 同上，页207。

<sup>554</sup> 同上，页208。

到了1885年初，年近古稀的冯子材带兵在广西镇南关与法军交战，他「奋身陷阵」将士们大为振奋，与敌人殊死战斗。他对将士们说：「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并「指麾诸将使屹立，遇退后者刃之。」<sup>555</sup> 最终冯子材带领军队「克文渊，被赏赉。连复谅城、长庆，擒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sup>556</sup>之后，他率领军队「攻郎甲，分兵袭北宁」。<sup>557</sup> 然而，朝廷的停战诏书下达，冯子材请战不成只能带领军队返还。冯子材大败法军后法军要求议和，李鸿章认为「乘谅山大捷之后皇威震慑法都既有悔祸之诚中土亦可收戢兵之益」。<sup>558</sup> 「慎固封守联络邦交庶可防患于未萌相安于无事耳」。<sup>559</sup> 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于天津与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其中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左宗棠对于条约签订感到十分愤怒，他曾表示李鸿章对于中国的损害远大于十个法国将军。

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态度贯越南战争始终，虽然他的担心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李鸿章一味地强调中国的劣势，认定清政府若是与法国开战必定失败，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战，进而想尽办法避战，错过了一个个有可能扭转局势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没有将越南的得失与朝鲜的得失建立

---

<sup>555</sup>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五十九，列传二百四十六，冯子材 王孝祺 陈嘉 蒋宗汉，页12690。

<sup>556</sup> 同上，页12690。

<sup>557</sup> 同上，页12690。

<sup>558</sup> （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卷三百三十五四裔考五，民国影十通本，页5553。

<sup>559</sup>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五十三，页1592。

必要的联系，认为清政府失去一个仅有供奉虚名的偏远属国远没有失去朝鲜严重，但被他忽略的是：若越南落入法人手中，不但中国的西南边疆将处于危险的境地，而且朝鲜的处境也会更加危险。越南战争的媾和实际上让西方国家和日本了解到清政府惧战的心理，清政府一味想要求和的态度使得觊觎中国和朝鲜的国家对其将来攫取利益的行动更加充满信心。

### （三）反思

李鸿章既然在与左宗棠争论时强调了防卫海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那么为什么他在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时没有提出异议，甲申政变后李鸿章和清廷还拒绝授予赴朝查办的吴大澂与日本谈判的权力呢？这说明了李鸿章认为当时他所施行的策略就是最为妥当的防卫海疆之法。他一面想要维护中朝宗藩关系，一面又惧怕开战。他担心过于明显地介入朝鲜事务有可能引发战争，认为如若开战以清廷的军事实力以及这些事件发生时新疆、越南的情况来看清廷的胜算微乎其微，若战争失败则朝鲜不保，中国的东部也将处于险境。本就不想在新疆和越南开辟战场的李鸿章，更不想与此同时在朝鲜引发战争。所以李鸿章选择强调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国且属国自主，由朝鲜自主与日本交涉，朝鲜与日本的外交实力、军事实力等等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这就给日本提供了通过签订条约在朝鲜攫取利益的机会。至此，作为宗主国清廷不能很好地保护藩属国的利益。紧接着在巨文岛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李鸿章使

用以夷制夷之策时俨然在利用朝鲜，这一系列的举措不断强化着朝鲜从内部想要脱离宗藩关系的意愿。归根到底李鸿章在与左宗棠争论海防与塞防重要性一事时，本质上也是想借强调海防的重要性来避免在内陆边塞开辟战场，自始至终李鸿章的惧战心理一直左右着他的决策。

朝鲜壬午兵变前新疆地区已经收复，为什么胜利不能成为一剂与日本对抗的强心针呢？日本通过《济物浦条约》在朝鲜获得了驻兵权，李鸿章居然认为条约内容「无甚流弊」，还庆幸日本没有逼迫朝鲜割地通商。归结原因仍旧是李鸿章对于战争持躲避心态：李往往在战争没有触发时便开始想办法与对方斡旋媾和，在对方逼迫至万不得已之时，他才打算应战，但这时反而是最被动的时候，马江之战便是一例。李鸿章甚至在中国战役胜利时仍旧持退让态度，因为他惧怕对方之后的反攻，并且预料中国会在对方的反攻中损失惨重，在他看来唯有快速媾和才可以及时止损。冯子材在广西战胜法军后一路攻克至越南，而清廷命其撤兵，之后李鸿章作为代表又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便又是一例。综上，李鸿章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消极的，他始终担心一旦中国与某一国开战，其他国家将趁机瓜分利益，那样的话中国将陷入更大的危机。所以，他认为与其战败后与对方达成协议倒不如通过提前媾和来暂时避免战争。但协议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以军费赔偿、权利让渡、领土割让等作为代价，此外他这样的态度反而会给其他国家提供一个信号，即中国惧怕开战且有利可图。

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尽管在具体事务层面清政府对朝鲜事务的介入越来越多，但是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清政府始终坚称朝鲜「属国自主」，从而维持着传统东亚秩序下宗主国对藩属国的管理准则。不过，日本及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时常不愿承认东亚秩序下的宗藩关系，而利用近代国际秩序的规则强调中国的藩属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晚清政府的实力已经不能确保日本和西方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传统的东亚秩序，日本则时常借近代国际秩序强调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为避免战争，李鸿章时常在朝鲜危难之时强调朝鲜在宗藩关系下「属国自主」，从而让朝鲜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中独自与日本交涉。虽然日本强调的「自主」和李鸿章强调的「自主」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无论是哪一种「自主」，结果都是朝鲜的利益受损。「属国自主」的朝鲜在谈判场上独自面对日本时结果往往只有一个，即朝鲜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受损，随之产生的是朝鲜内部脱离中朝宗藩关系的意愿愈来愈强烈。中国在维持着传统的宗藩秩序时使得藩属国的利益一再受损，当宗主国无力保护藩属国时，藩属国另谋出路的想法自然就会产生，传统东亚秩序的瓦解已经有了先兆。中朝宗藩关系中涉入的他国力量越来越复杂，宗藩关系便越来越脆弱，中国东部的威胁也就越来越明显。正如吴晗所说：「清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应该着重指出，军事上的失败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sup>560</sup>

---

<sup>560</sup> 吴晗，《历史的镜子》（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页118。

日本扶持了朝鲜的开化党，试想若是中国帮助朝鲜开化党进行政治改革会不会另有一番面貌呢？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清政府不可能帮助一个力图争取朝鲜自立的新兴党派去推翻维护朝鲜传统政治体制的当权政党，「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sup>561</sup> 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问题，更不可能帮助朝鲜进行政治改革。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于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sup>562</sup> 甲午战败之后，先是百日维新再就是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了。

---

<sup>561</sup> 钱穆，《国史大纲》，页八九四。

<sup>562</sup> 同上，页九〇〇。

## 结 论

日本通过在台湾的先行试探了清政府对待藩属国琉球的态度，随之吞并琉球，继而打开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缺口，同期朝鲜自行与日本签订的《江华条约》也使日本得到了颇多好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在台湾、琉球和朝鲜初步试探后了解到李鸿章和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时的避战心理和妥协态度，从而增强了日本对其在东亚的侵略计划的信心。《江华条约》签订后，开国的朝鲜从此沦为各国的利益场，此条约也让清政府意识到有必要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事务，但是鉴于「属国自主」的约束，七十年代后半期李鸿章先是通过私人关系引导朝鲜与西方国家订立通商条约，到了订约的实质阶段则通过清政府官员在幕后的指导直接介入朝鲜的外交。而朝鲜方面对于朝鲜开化的态度分为两极：朝鲜的很多官员和大量在野儒生均反对朝鲜开化，但是朝鲜国王和少部分官员则支持开化政策，认为朝鲜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属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国王力排众议，朝鲜实行开化。开化后的朝鲜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不再仅来源于中国的输出，朝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在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和判断。此外，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清廷开始实质性地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这都为朝鲜试图寻找新的强国作为依靠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代初日本加紧了其在朝鲜的势力渗透，日本通过壬午兵变后与朝鲜签订的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在朝鲜获得了驻兵权；通过扶持朝鲜开化党，策动了甲申政变，之后又逼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通过《汉城条约》的铺垫，清政府又与日本就甲申政变时中日间冲突的遗留问题而缔结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专条的内容显明清政府承认中国和日本都有权出兵朝鲜。清廷通过兵变和

政变发生时派兵平乱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在朝鲜与日本签订条约时，李鸿章又持退让态度，《天津会议专条》的签订为甲午战前日本派兵赴朝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李鸿章同时处理多项外交事务，他时常担忧一旦中国与一国开战，其他国家将纷至沓来瓜分利益，这使得他在各项外交事务中皆持避战妥协的态度。

《济物浦条约》签订时李鸿章担忧日本与俄、法联合，《汉城条约》和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时中法战争始终影响着李鸿章的决策。控制朝鲜朝政的闵氏集团在听闻清廷打算释放其敌对势力大院君回朝，甲申政变平息后日本民间主张对中开战而彼时中方正忙于中法战争之时，闵氏集团认为有必要寻找新的大国庇护朝鲜，自此朝鲜统治阶层开始实质性地动摇中朝宗藩关系。

十九世纪后半期，李鸿章对于朝鲜内政外交的干预程度增强。他释回与闵氏集团对立的大院君以压制闵氏的势力，紧接着英国以防俄为理由侵占朝鲜巨文岛，李鸿章再次以「属国自主」为借口欲让朝鲜独自与英方交涉，但实际上李鸿章更希望借英国的占岛行为牵制俄国和日本在东亚的侵略行动，宗主国对于占岛问题的消极处理让朝鲜对于宗藩关系的离心力不断增强。第一次俄朝密约的失败并没有让闵氏集团失去寻找外援的决心，第二次俄朝密约随即展开。被李鸿章派遣赴朝的袁世凯在朝鲜实行了强势的干预政策，尤其在第二次俄朝密约的处理过程中袁世凯对朝鲜统治者的态度十分强硬。这导致了朝鲜统治阶层表面上顺从，实际斥华自主的心理愈来愈强烈，此事之后朝鲜又开展了一系列试探和反抗中朝宗藩关系的外交事件。强硬的干预政策在朝鲜的实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期待的效果，宗藩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牢固反而越来越脆弱，更重要的是这股动摇的力量已经不仅仅来自于外部，同时也来自朝鲜内部。

清廷对朝鲜强硬的干预政策一直持续至甲午战前，在此期间日本加速进行军备建设。虽然东亚秩序以「德治」维系等级秩序，但还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sup>563</sup>一直挑战东亚秩序的日本尤为重视军备扩充，而清廷的军备建设速度则不断放缓以至于停滞：清政府从 1888 年至 1894 年没有增添新的船舰，而日本于 1881 年开始的松方财政改革加大了军备的资金投入，1883 年开始日本每年都会增添船舰。巨文岛的成功归还让李鸿章在之后的外交事务中更积极地使用以夷制夷之策，然而巨文岛的成功归还表面上归因于李鸿章德以夷制夷之策，但实际上成功归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当时各国利益的平衡点恰好在此，英国为了避免与沙俄的冲突以及对巨文岛价值的评估最终将巨文岛归还朝鲜。在自身没有绝对实力的时候，依赖此策略实在是弊大于利，因为以夷制夷的同时至少要让一方有利可图才能达到目的。所谓的有利可图往往伴随着利权的出让，倒不如强化军事实力从而实现自主地维护自身利益。就巨文岛事件而言，清政府消极的处理态度让朝鲜的斥华自主心理越发强烈，朝鲜在此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东亚的局势愈来愈复杂，而日本在几十年间不断增强军事实力，最终在 1894 年找到了图谋朝鲜的契机。日本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最终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被迫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朝鲜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藩属国，它的独立意味着传统东亚秩序下的宗藩体系彻底瓦解。不过，朝鲜的独立也并没有让朝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这种独立也仅仅是成为了日本殖民地的前兆。

---

<sup>563</sup>（日）滨下武志，〈朝贡和条约——谈判时代的海洋性亚洲和条约口岸网络，1800~1900〉，收入（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日）滨下武志，（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编，马援译，《东亚的复兴——以 500 年、150 年和 50 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页 23。

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一部分支持晚清帝国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晚清时期中国对朝鲜的举措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即使这种帝国主义与西方的帝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些区别。但笔者认为直接将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举措与西方殖民体系中的某些特点进行简单对照，进而证明晚清的对朝策略为帝国主义是不合理的。十九世纪之前的东西方社会都有着自我的发展方式、文化传统，利用西方某些帝国的历史发展框架直接为东亚世界的国家间关系下定义实在是失客观。

学者 Kirk W. Larsen 认为清帝国在将多边帝国主义引入朝鲜后仍旧维持传统的与朝鲜的关系模式以及重申旧的政策，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和日本一直在寻找与朝鲜建立关系的新模式，而且清政府利用与朝鲜的传统关系模式在朝鲜实行帝国主义。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已经维系超过千年，而历史上朝鲜与日本本就不睦，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中朝鲜险些被日本灭国，朝鲜在宗主国中国的帮助下最终幸免于难。朝鲜在十八世纪末开始禁止天主教，朝鲜纯祖在 1801 年的辛酉邪狱中全面镇压天主教，打击了西学在朝鲜的传播。1860 年朝鲜东学出现，东学反对东进朝鲜的西学，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众多的教徒。观照历史背景，日朝关系、西方与朝鲜的关系本就与中朝关系大为不同，因此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和西方欲与隐士国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自然需要寻求新的模式，而中国作为朝鲜宗主国自然更倾向于维持传统的中朝关系而不是立刻使用近代世界秩序处理中朝关系，这本身就与日本、西方不同。至于利用中朝传统关系在朝鲜实行帝国主义，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十九世纪前的东西方世界在各个

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直接为东亚国家间关系下定义。

此外，Kirk 认为中国在十九世纪后期与朝鲜的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中朝关系，中国在多边但非正式的帝国体系中享有许多特权，其中涉及到地缘政治和商业等。关于商业，王元崇在《*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有详细的论述，笔者将部分论述内容已经引用在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笔者认为就地缘政治而言，朝鲜政府很清楚朝鲜为中国的东藩屏障，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虽然很少考虑商业因素，但是中朝双方都考虑到了各自的以及对彼此的政治利益。藩属国朝鲜平日「事大」，宗主国中国在藩属国有危难时提供帮助，这种相互的往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Kirk 将这种彼此之间长期的显明的互惠关系定义为中国在以宗藩关系的名义谋取不平等特权，实际上直接绕开了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而强行以西方近代体系作为判断国家间关系的标准。

所以，关于晚清帝国主义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直接用西方近代体系定义的国家间关系评判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是不客观的。但是，笔者并不否认清政府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在宗藩体系之下进行了积极地有限度地介入。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时的中朝关系相较于传统的中朝关系有所调整，但是这种关系仍旧是在宗藩体系下运行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将朝鲜视为东藩屏障而并不打算侵占朝鲜的土地，即使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始终存在郡县朝鲜的声音，但是李鸿章始终不认可此策略，清政府也认为侵占朝鲜土地之策不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先后试图侵占台湾和琉球从而率先动摇了传统的宗藩秩序，

七十年代英、俄在新疆的行动和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的中、俄就新疆事务所签署的条约，以及 1876 年朝日间签订的《江华条约》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在八十年代对于朝鲜这个重要的藩属国的态度与策略。所以 1882 年壬午兵变的发生直接促使清政府调整了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此后清政府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事务开始积极地有限度地介入。关于有限度地介入，笔者认为李鸿章的朝鲜策略并没有全面地介入朝鲜的内政外交，而是在处理具体的朝鲜事务时考虑到日本、俄国对朝鲜的影响、法国在越南东京的行动对朝鲜的影响以及英国在缅甸的行动对朝鲜的影响后对朝鲜事务有限度地介入。因此也让日本通过 1882 年与朝鲜签订的《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获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力。

至于朝鲜在八十年代愈来愈强烈的斥华自主心理，根本上源于清政府无力再提供给朝鲜如同之前的保护。朝鲜在七十年代中期被迫向日本开国以及八十年代同意开化与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这让朝鲜统治者了解了外部的国际环境，鉴于朝鲜长期以来作为藩属国已经习惯于接受大国的保护，朝鲜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大国作为其依靠。经过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清政府对于朝鲜事务的介入逐渐深入，朝鲜统治者对于寻找新的大国作为依靠的行动也越发积极。不过朝鲜了解中国并不打算侵占朝鲜领土，所以朝鲜统治者不打算完全断绝与中国的联系，而是希望中朝间保持一种松散的宗藩关系。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已经不能提供给朝鲜一个背靠大国安逸度日的环境。不图谋朝鲜国土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边疆问题，而日本和俄国则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英国、法国也对朝鲜半岛做了一番打算，在此种情况下朝鲜寻找新的大国求援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截至八十年代初期朝鲜统治者已经知晓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威胁，所以此

时朝鲜希望遥远的美国可以给朝鲜提供保护，但是美国除了持有朝鲜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立场外，对于朝鲜事务保持中立态度。之后朝鲜又先后向日本和俄国求援，这使得清政府不断加强对朝鲜事务的介入程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李鸿章处理朝鲜事务的态度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但有一个趋势是明显的，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李鸿章的朝鲜策略的指引下清政府不断加强对朝鲜事务的介入程度，在此期间 1882 年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点。李鸿章对于朝鲜事务的决策基于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而不仅仅是从中朝宗藩关系的层面进行考虑，但因为李鸿章的惧战心理和避战倾向，他的朝鲜策略往往不能为朝鲜提供充分的保护，从而让日本、英国有了可趁之机。尤其在处理巨文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不愿积极帮助朝鲜与英国进行交涉，而将朝鲜巨文岛作为筹码以实现以夷制夷、不战而胜的目的，即利用英国的占岛行为牵制日本和俄国。这种处理方式让朝鲜对于其宗主国的实力愈来愈失去信心，进而朝鲜则使用更加外显的方式以试图改变清政府对朝鲜事务的介入程度，相应地李鸿章则加强了中国对朝鲜事务的介入程度。朝鲜寻找外援的行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持续至甲午战前，继而朝鲜半岛牵涉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多，朝鲜的走向越发复杂，传统东亚秩序瓦解的先兆愈来愈明显。

李鸿章始终用被动的、消极的态度去应对各国给藩属国带来的危机，他总是试图通过权利让渡，例如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默认日本与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方式避免战争爆发。但是，退让和妥协只会让他国了解到清政府的怯战心理，进而更猖獗地从中国和朝鲜攫取利益。李鸿章对于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他总是试图通过谈判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积极备战迎敌而上，但到了无路可退之时

又不得不应战，而最佳的备战时机已经错过，马江之战、甲午战争皆是如此。从本文提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可以见得李鸿章在担心爆发战争的同时，对方国家不一定真的想要挑起战争，甚至对方的军事实力也不足以轻易开战，大多数情况下双方都在相互试探。所以，一味地退让甚至会加强对方对于战争胜算的把握，同时也会让旁观的国家了解到参与其中将会有利可图。敌对方并不会因为清政府不愿开战就停止进攻，反而会在了解到清政府的惧战心理后发起更具进攻性的攻击。屈辱的妥协换不来长久的和平，并且会为下一次更严重的危机埋下祸根。即使直面战争有时也会面临失败，但是至少向敌对方和它的各方势力表明了不可进犯的坚决态度，此种情况下的失败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不会比直接向敌对方妥协求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多。

牵制平衡、以夷制夷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强大自身实力，在合适的时机对敌对方的攻击进行反击才能保障自身的利益。至此，结合李鸿章针对朝鲜事务的处理态度、一系列的政策以及既定的历史结果来看，笔者想引用吴晗先生的一段话：「和平不可能是祈求得来的……祈求和妥协只能招致屈辱和失败。侵略战争既然强加于人，那么反侵略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团结一致，被侵略者奋起抗战，沉重打击侵略者才能保国卫民，取得胜利。」<sup>564</sup>「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也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保障和平的事业。」<sup>565</sup>

---

<sup>564</sup> 吴晗，《历史的镜子》，页 123-124。

<sup>565</sup> 吴晗，《历史的镜子》，页 124。

## 参考文献

外文研究论著（含中译本）：

- 1.Chay, Jongsuk. *Diplomacy of asymmetry: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to 191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
- 2.Daniels, Gordon. *Sir Harry Parkes: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Japan 1865-1883*. Richmond: Japan Library, 1996.
- 3.Fairbank, John 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4.Harrington, Fred Harvey. "An American 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05, " in Lee, Yur-Bok and Patterson,Wayne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p.46-67.
- 5.Hwang, Kyung Moon. *Beyond brith: social status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Kore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Larsen, Kirk W.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on Korea,1850-191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Lee,Yur-Bok. "A Korean 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1882-1910," in Lee,Yur-Bok. and Patterson, Wayne. e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11-34.

8. Lee, Yur-Bok.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1882-1905," in Lee, Yur-Bok and Patterson, Wayne. ed., *One hundred Years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82-1982*.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6, pp. 12-45.
9. Lee, Yur-Bok. *West goes East :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and great power imperialism in late Yi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10. Patterson, Wayne. and Conroy, Hilary. "Duality and Dominance: An Overview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in Lee, Yur-Bok. and Patterson, Wayne. ed.,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 1-10.
11. Song, Nianshen.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New Delhi, Singap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 Song, Nianshen. "'Tributary' from a Multilateral and Multilayered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April, 2012), pp. 155-182.
13. Wang, Hui. "Okinawa and Two Dramatic Changes to the Regional Order (Zhang, Yongle. Trans.)," in Hutters, Theodore. ed.,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28-263.
14. Wang, Yuancho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15. Wong, Roy Bi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 (英) J.P.T.伯里 (J. P. T. Bur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0 卷, 欧洲势力的顶峰: 1830-1870 年》。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7. (英) 朱利安·S.科贝特 著, 邢天宁 译, 《日俄海战 1904-1905 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9。
18. (美)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 (上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9. (美)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刘广京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 (下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0. (日) 滨下武志, 〈朝贡和条约——谈判时代的海洋性亚洲和条约口岸网络, 1800~1900〉, 收入 (美) 乔万尼·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日) 滨下武志, (美) 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编, 马援译, 《东亚的复兴 以 500年,150年和 50年为视角》。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页 23。
21. (日)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译,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2. (英) F. H. 欣斯利 (F. H. Hinsley)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 物质进步与世界范围的问题: 1870-1898 年》。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23. (英)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著,张望、岸青译,《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 24.(韩)赵景达著,李濯凡译,《近代朝鲜与日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 25.(英)季南(E.V.G. Kiernan)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6.(日)平野健一郎、張啟雄,《近代初头在东亚国际政治上的三种文化交错: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异本校勘及其政治意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组,2002。
- 27.(韩)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28.(韩)姜万吉著,贺剑城、周四川等译,《韩国近代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29.(日)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30.(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31.(英)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 (英)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2.(韩)李瑄根著,林秋山译,《韩国近代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7。

33. (美)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 (Andrew Malozemoff) 著,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俄国的远东政策, 1881-1904 年》。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34. (美) 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宓亨利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著, 姚曾廩等译,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35. R.B. Mowat 著, 王时造 译, 《近代欧洲外交史 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36. (日) 陆奥宗光著, 徐静波译, 《蹇蹇录: 甲午战争秘录》。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37. (日) 西里喜行著, 胡连成等译, 《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 (上册)》。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38. (日) 西里喜行著, 胡连成等译, 《清末中日琉关系史研究 (下册)》。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39. (美) 裴士锋 (Stephen R. Platt) 著, 黄忠宪 译, 《天国之忧》。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40.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中国的现代化》。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41. (日) 佐藤慎一 著、刘岳兵 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42. (日) 竹内好著, 孙歌编, 李冬木等译, 《近代的超克》。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43.(日)田中彰 著,张晶、马小兵 译,《明治维新》(北京:新星出版社,2020),  
页 110。

史料类: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之卷六(九年至十年)。北  
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编,《梅州文史 第六辑:何如璋专辑》。梅州:梅州市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四十。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四十八。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五十一。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五十二。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六十。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六十四。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六十九。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七十。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八十。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三。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六。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一百九十七。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二百。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一。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二。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四。

《德宗景皇帝实录》（北大定稿本）卷之三百四十六。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卷：奏议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卷：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1卷：奏议十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7卷：诗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1卷：电报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2卷：电报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卷：信函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卷：信函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卷：信函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卷：信函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高宗实录》（原本：册17卷13）（韩国国编影印本：册1）。

（清）何如璋著，吴振清、吴裕贤编校，《何如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11卷，卷七，民国铅印本。

（朝）金绮绣，《日东记游》，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册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337。

孔昭明 编，《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八辑（159、160）李文忠公选集（上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十七，民国影金陵原刊本。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二十四，民国影金陵原刊本。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四十四，民国影金陵原刊本。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80卷，卷五十三，民国影金陵原刊本。

（清）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400卷，卷三百三十五，民国影十通本。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清）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10卷，卷七，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刻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三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册，卷十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二十三。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三。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一百五十八。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三百六十九。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三百七十三。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十一。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十六。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四十三。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五十。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四百五十九。

《清史稿》（关外二次本），卷五百二十六。

《清实录（第五五册）德宗实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

日本国志 40 卷，卷六邻交志上三，清光绪刻本。

（清）谭嗣同，《仁学》，日本国闻报社本。

《泰西新史揽要》24 卷，卷十二英国，清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广学会刻本。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集部，第三十五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共 10 册）》（册 10，卷 98）。北京：中华书局，2008。

（清）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 <http://zhangjianyanjiu.org>

（清）张謇著，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 1 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清）张謇著，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 2 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清）张佩纶，《涧于集》20 卷，奏议卷二，民国十五年润于草堂刻本。

张孝若编，《民国丛书(第三编 94 综合类)》。上海：上海书店,199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集》7卷，文集卷三，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中文研究论著：

陈恭禄，《日本简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郭文深，《清代中国人的俄国观》。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何汉文，《俄国史(下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

蒋永敬、梁敏儿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

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修订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全两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宋成有，《东北亚史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 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 吴春秋，《俄国军事史略（1547-1917）》。上海：知识出版社，1983。
-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 吴晗，《历史的镜子》。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 汪晖，《世纪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一九一七年前）》。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谢必震、胡新，《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83。
- 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 年间的中朝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论文：

段志强，〈看见现代国家——1876年朝鲜修信使的日本之行〉，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54-55。

段志强，〈《日东记游》解题〉，收录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册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333。

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俄罗斯研究》，期2，2021年4月，页118-127。

林明德，〈李鸿章对朝鲜的宗藩政策 1882-1894年〉，《韩国研究论丛》（第一辑），1995年3月，页100、118。

刘晓辉，〈认知视野下李鸿章对日决策研究（1870-1895）〉。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倪友春，〈张謇与日本〉，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 <http://zhangjianyanjiu.org>

权赫秀，〈东亚史视角新诠释——读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46期5，2013年10月，页50-51。

权赫秀，〈《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问题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史学集刊》，期4，2007年7月，页20-21。

权赫秀，〈「两截体制」下的朝鲜驻天津督理通商事务衙门——兼谈19世纪后期朝鲜王朝的对华外交及其文化背景〉，《社会科学辑刊》，期1，2015年1月，页121、123、126。

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卷19期4，2009年12月，页72-73。

王如绘，〈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东岳论丛》，卷 32 期 6，2011 年 6 月，页 60。

张礼恒，〈变与不变之间——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的博弈〉，《东疆学刊》，卷 36 期 2，2019 年 4 月，页 91-95。

张礼恒，〈从平行到交叉——「国际公法」与「宗藩体制」的比较研究〉，《东岳论丛》，卷 39 期 9，2018 年 9 月，页 31、33、39-41。

张礼恒，〈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卷 32 期 2，2017 年 3 月，页 97-101。

张礼恒，〈李鸿章主持朝鲜外交事务的原因探析〉，《江苏社会科学》，期 5，2015 年 10 月，页 221。

张礼恒，〈论清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及评价〉，《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一辑），2009 年 8 月，页 241。

张礼恒，〈寻常与超越——评冈本隆司所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当代韩国》，期 3，2013 年 9 月，页 123。